

炎黄春秋



南昌起义前夜的朱德

瓦尔德事件

中美关系首谈对抗

董必武指挥我们占领《商务日报》

改革名臣翁同龢晚年难度

刺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的背后

郭沫若和田汉的友谊与归宿
告诉国人些什么？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谋士——文龙传奇



2
95

四通汉字大字符集字库及排版系统问世 炎黄春秋杂志增刊《炎黄文化研究》出版



①座谈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俱乐部举行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为《炎黄文化研究》的出版和四通汉字大字符集字库及排版系统问世,于年前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应邀出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黑伯理、李宝光、冯征、杜导正,四通集团公司总裁段永基、副总裁刘菊芬和著名学者张岱年、袁晓园、温济泽、李学勤等近百人参加座谈会。



②雷洁琼副委员长为座谈会题词



③张岱年教授(左)与段永基总裁(右)亲切交谈



④主编李学勤向与会者介绍《炎黄文化研究》

本期导读

董必武指挥我们占领《商务日报》

偏安陪都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们，几乎无官不贪，人民大众愤懑之情犹如火山躁动。国民党却开动宣传机器，强奸民意，抓人、封刊……于是，在特务如蚁的报社，中共地下工作者，与之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舆论阵地争夺战。

郭沫若和田汉的友谊与归宿 告诉国人些什么？

郭沫若和田汉，年轻时就结下手足情。抗日救亡宣传，二人更是心心相印。建国后，在如潮般的政治运动冲击下，他俩却各自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一个……慈航渡得余生；一个……英魂殒落秦城。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谋士 ——文龙传奇

他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十七代后裔，蒋介石想借助文家名望，把这位十八岁的娃娃军官放在自己身边，准备培养成反攻大陆的勇士。文龙见国民党已腐朽不可救药，他只身逃往美国，找到尼克松，两人一见成知己，他为尼出谋划策，加速了中美两国领导人握手的进程。

国际主义战士谢唯进的悲壮历程

他是周恩来、朱德的战友，为反法西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国际战争。战场上，他统率的炮兵创造了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业绩，获得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评价。投降主义者出卖了革命，他拖着负伤的双腿走进了集中营，在苦难中回到祖国。

阿Q，中国文坛的哥德巴赫猜想

鲁迅塑造了一个阿Q，中国文坛猜想了几十年，热闹非凡。1956年，中国一位领导人给他划了成份，百家争鸣即刻偃旗息鼓，定于一尊，谁也不敢再为这位“贫下中农”说三道四了。本文沉思了这一政治介入艺术的历史教训。

天地有正气

民谣说：“抽的烟喝的酒是贡的，花的大把票子是送的……”这是千百万人时下对贪赃枉法者，从心底唱出的一支辛辣的歌。人心不可欺，作者颂扬了一个锲而不舍、一身是胆的人，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历尽艰辛，硬是把一群“推磨鬼”拉上了法庭。

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

面对死亡，他处险不惊，押解途中，竟一觉睡到大天明。这位被称颂为“东方哲人”、当过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法庭上他那横眉冷对的伟丈夫气概，让后来人感叹、钦敬。

沈钧儒和他的女婿范长江

抗战时期，年轻英俊的范长江是沈家的常客，邹韬奋将他举荐为沈家女婿，沈钧儒颇为满意，已是共产党员的女儿沈谱，却要看这位名记者的政治背景……直到婚礼前她才知道，周恩来竟是范长江的入党介绍人。

下期要目

- △ 平型关大战决策过程写真
- △ 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上
- △ 捍卫真理 矢志不渝
——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
- △ 追忆毛主席得知张思德牺牲后
- △ 向警予助手陈恒乔夫妇的传奇生涯
- △ 《北伐军歌》作者与蒋介石的师生纠葛
- △ 党外布尔什维克——何万生烈士
- △ 图虚名得实祸——“天下第一田”寻踪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 编 辑: 洪 炉

总 经 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王 恂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木子

责任校对: 秋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政编码: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

春秋笔

⑭⑪ 董必武指挥我们占领《商务日报》

杨培新 金陵客

英杰谱

⑦⑧ 南昌起义前夜的朱德

熊建华 舒 云

殒星篇

④②②④ 郭沫若和田汉的友谊与归宿告诉国人些什么

冯锡刚 陆水明

古镜台

⑦⑧⑧③ 郑板桥当官记

俞小红 竟陵子

目 录

九州景	⑧5 举世罕见的天津大算盘	祁金华
人海浪	⑧4 国民党重庆参政会内幕	陆立之
古今谈	②1 阿Q 中国文坛的哥德巴赫猜想	林勃
赤子心	⑤8 国际主义战士谢唯进的悲壮历程	王梦岩
神州光	⑧6 「本草纲目」在日本	韩进林
求实篇	③8 说真话难 还是应该说真话	杜导正
同心结	⑤4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谋士——文龙传奇	张富 甘远志
	④ 李正道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施宝华
轶闻录	⑧2 李立三和斯特朗	李思慎
	③3 瓦尔德事件——中美关系首次对抗	奎松
时代风	⑦4 一支新奇的「特种兵」	陈淀国
	⑤0 天地有正气——一群「推磨鬼」曝光记	张正隆



李政道 与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施宝华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已六周年了。六年来,科学家们在这个高能加速器上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实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科研成果,特别是我国科学家在这里测出了 τ 粒子质量最新数据后,国际高物理学界为之振奋。如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不仅是中国拥有高科技的象征,而且已成为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重要实验基地,包括美国在内的粒子物理学家,同步辐射专家都纷纷来到这个属于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设施上,从事特定能区的粒子物理研究。

当人们赞赏中国兴建这个高能加速器所取得的杰

出成就,赞扬中国科学家在建造高能加速器和从事粒子物理研究中所展现的聪明才智时,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在这个宏伟的高科技工程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倾注的心血。连李政道教授的老师、台湾科技元老、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也曾是一无所知。1992年,吴大猷来北京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位深谙高科技工作建设复杂困难的物理学家兴致勃勃地、仔仔细细地看了对撞机实验室的全部设施后既激动又感慨:中国能在短短的四年内,依靠自己力量建成这样复杂的高科技工程,真不容易啊!

然而更使老人难以平静的是，他在参观和听取介绍中，才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为这项史无前例的科技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对这项巨大工程的建成和顺利开展实验研究起着关键的作用。可是，与他亲如子弟的李政道却从未向他说起过自己的显赫功绩。在达园宾馆休憩时，吴大猷曾对李政道说，你应该把你做的工作介绍出来，让世人知道！李政道笑笑说，不用，我只求对中华民族科技发展尽己绵薄之力！吴大猷听了激动起来：“你不写，我来写！”

为了采访和披露那些使吴大猷教授为之激动的事迹，记者特地走访了掌握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情况的权威人士、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高级工程师柳怀祖先生。这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专家，早在1975年就参与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组织工作，1979年就开始参与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当中国政府决定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后，柳怀祖就授命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协助领导小组具体协调工程建设决策、计划的实施。他同李政道教授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李政道教授每次来华的活动，大部由柳怀祖先生安排。柳先生平时守口如瓶，今天，记者带着吴大猷“也要写”的信息去拜访柳怀祖先生时，他终于破例向记者略予披露。

柳先生是个思辩精辟、办事干练、精通业务管理的专家。他稍稍沉思后就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作介绍了。他说，李政道教授是个有战略眼光的杰出学者，他从1972年首次归国以来，一直满腔热情地致力协助、促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仅是李先生支持中国科技发展棋局上的一着棋。就在这个把中国带进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创世纪工程中，李政道先生也是抓战略大计，起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

李政道向周恩来首提重要建议

1972年，李政道博士踏上阔别多年的故土，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衷心邀请李政道对云南落雪山宇宙线观测站发现的一个质量可能10倍于质子质量的重粒子进行鉴定。李政道对周恩来说，观测站获得的数据远不如高能加速器发现的数据准确可靠。李政道向周恩来强调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在这以后他建议中国应考虑建造一个小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样做，花钱不多，却可以做第一流的研究工作。

中国的领导人是掌握哲学思维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他们认真考虑研究了李政道教授的建议。不久，

周恩来在给物理学家张文裕等的信中说，“（建造加速器）这件事不能迟延了”。他要求中国科学院必须把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列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加速器的建造终于放到了议事日程。然而对缺乏加速器建设经验的中国说来，决策过程中的争论是激烈而又漫长的，经过多年的反复讨论，直到1979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政府终于宣布：它将建造一台500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加速器。对这样一个决策，李政道博士是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中国终于迈出了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步伐，不安的是，从经济、技术……及今后的研究目标看，这对中国来说都会有极大困难的。但是，李政道尊重中国政府的抉择。他理解经过动乱折腾的中国，在重新获得稳定后，急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急切心情。他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将全力支持中国建造加速器的事业。

为中国培养一支高能 物理研究骨干队伍

李政道本来不是一个组织管理工作，而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者。然而，正如他的夫人秦惠箬女士所说的，自从1972年回国访问后，李政道却热心于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为，他知道，要支持中国发展高科技，需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参与。他认为，要建造加速器以及今后开展高能物理研究，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人才。早在他回国访问之初，他就向中国领导十分强调培养科学人才的重要。李政道提出：芭蕾舞要从小培养，科学人才也需要从小培养。他向毛泽东建议，可以考虑在高等学校设立“科技少年班”，后来中国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为了替中国培养一支能在质子加速器开展研究的科学家队伍，他与美国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的学者们一起开会，建议美国能接受中国高能物理学者来美深造和工作。在取得协议后，李政道来北京同邓小平会见时，汇报美国将考虑接纳中国高能物理学者访问和工作。邓小平对此十分支持。不久，中国即派出了40多名各种学科的优秀学者到美国。李政道以他在美国物理学界的崇高声望，把这些学者分成22个组，派到美国五大高能物理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这些被称为“李政道访问学者”的中国高能物理学者，在美国得到了李政道教授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些学者在美国遇到困难，李政道即多方活动予以疏通，学者们在美国的费用出现问题时，李政道一个一个地帮助联系解决。秦惠箬女士说，那时候李先生一天就要写几十封信，打无数

次电话来做协调安排工作。李政道先生说,这些学者是中国高能加速器事业的希望所在,一定要让他们掌握当代最先进的高能物理理论和研究技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学者赴美深造的工作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骨干,不仅成功地在这套先进的设施上开展研究活动,而且取得了使世界高能物理震惊的重要研究成就。

李政道致书邓小平: 买加速器非良策, 再次建议造 22GEV 正负电子对撞机

果然不出李政道先生所料,由于经济、技术、管理实力难于支撑,刚刚起步的质子加速器在经济调整中被迫下马了!中国政府这个突然决定使国内外为之哗然,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又展开了:中国究竟能不能建造高能加速器?中国是买加速器好还是建加速器好?一种观点在当时似乎很时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建造加速器的条件,如果一定要搞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可以从科技发达国家买进一套加速器就行了。

李政道教授看到这种状况心中十分着急,他给邓小平和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写信。他指出,买加速器是不能提高中国高能物理科学水平的,只有通过自己亲手设计、建造和研究的实践,才能造就一支强有力的、有水平的高能物理科学队伍,中国才能够跻身世界高科技行列。

李政道这时再次向中国建议:可以考虑兴建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他指出,这个方案,他曾和美国第一流加速器专家潘诺夫斯基共同进行过深入研究论证。这种正负电子对撞机造价较低,但是在这个能区需要开展的粒子物理研究课题还很多,有可能得到重大的研究成果。他还把潘诺夫斯基就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研究论证的全部资料提供给中国,请中国政府领导和科学家研究参考。

李政道教授还提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是一项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复杂的高科技工程,如果决定建造,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程组织指挥机构。

邓小平采纳李政道建议 决定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李政道教授的来信,给正在讨论是买加速器还是

造加速器的中国有关部门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案,也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在广泛听取各部门和科学家的意见后,深刻洞察科技重要性的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看这件事(指李政道提出建造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没有错。”他还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拜托您帮助我们办成这件事。邓小平还提出让曾经参与过“两弹一星”研制组织管理工作的谷羽先生抓这件事。

1983年11月,谷羽先生率领高能物理代表团赴美,就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问题进一步考察,并探讨与美国高能物理界进行合作的前景。谷羽等一行抵达美国,李政道教授非常高兴,他为中国领导人远见卓识的决策而鼓舞,他向谷羽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将尽全力支持这项关系到中国高科技发展前途的重大事业,他还将争取美国高能物理界为这项巨大工程积极提供支持和援助。

在李政道教授的影响下,美国高能物理界对谷羽一行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这时,李政道教授对随谷羽来访的柳怀祖先生说,美国高能物理界的热情里蕴含着一种热切的期望,他们希望看到中国能果断地、高效率地开展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作,希望能看到中国的成功。

谷羽一行回来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赴美国考察访问的情况。1983年12月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北京建造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并决定由谷羽、张寿、林宗棠、张百发四位组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由谷羽任组长)直接对中央和国务院负责。

同邓小平一起为对撞机奠基

在领导小组卓有成效的组织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各项筹备工作:如征地土建、加速器预制件研制等进行得非常迅速而有节奏。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有10多个部门约200多家企业、研究机构约近万余名人员参与了这项工程建设。

李政道先生更是倾注大量的心血,每年至少化三分之一的时间为这件事操劳。他建议承担正负电子对撞机设计的科学家前往美国进行设计,李政道教授邀请美国的加速器、高能物理专家对中国科学家的设计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并对所有设计方案进行科学评估,以确保工程建设能达到最佳水平。

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西郊对撞机工地上隆

重举行这项伟大工程的奠基仪式，邓小平及中国高级领导人都来参加奠基仪式，邓小平高兴地同李政道教授握手交谈，李政道再次同邓小平谈起邓在7、8月间曾经同一位著名华人学者说过的“比赛”的事，那次那位学者向邓小平说：“现在，中国有三架加速器的建设，其中一架在北京，一架在合肥，一架在台湾，都计划在1988年建成，这无形中是一场比赛！”那次，邓小平曾兴奋地说：“好，我们就来场比赛吧！”所以李政道笑着对邓小平说，现在，“比赛”就开始了！

邓小平对李政道说： “中国人民衷心感谢您”

由于出色的协调和指挥，也由于参加建设单位积极配合，对撞机工程进展非常顺利。为了确保建设特别是对撞机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的质量，李政道教授推荐美国著名加速器专家潘诺夫斯基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作的顾问，潘诺夫斯基每年都来京，对工程建设进行技术指导。李政道教授在此期间也年年来京二次，了解工程进展，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他作为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美方成员，他时时协调美国高能物理界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合作支持，作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每次来中国都会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他有机会向最高领导通报对撞机工程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就使整个工程都能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注。这也就保证了对撞机工程能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前进。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安装、调试，即将实现对撞成功。远在美国的李政道教授得悉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立即赶来北京，一到住处，他就急急亲笔写信给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向他们报告这个将改变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地位的喜讯，邀请他们视察已经建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在世界高能物理界引起很大反响。10月24日，邓小平等兴致勃勃地来到洋溢着喜气的对撞机实验室，一见到李政道就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对他说：“中国人民衷心感谢您！”……

李政道总结对撞机成功经验

介绍到这里，柳怀祖先生不无激动地说，是的，中国人民是非常感谢李政道教授20年来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的无私的、巨大的帮助和杰出的贡献。李政道教授不仅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和成功运行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关键作用，而且还做了许多帮助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性工作。他多次到中国讲学，向中国科学界介绍当代高能物理的最新成就，启迪中国要重视基础研究；他连续十年招收CUSPEA，吸收中国千余名优秀青年学者到美国第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深造，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有希望在物理学领域创造突出成就的人才，他倡导“博士后”，使中国找到了一种发挥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才干的制度；他在中国建立了多处高等科学研究中心和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为中国开辟了高水平的研究基地；他还竭力促进海外科学家团结起来，为发展科学振兴中华而奋斗。李政道教授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的名字必将和中国高科技发展永远联系在一起！

然而，李政道教授是十分谦逊的。就在他前来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的庆贺活动时，记者有幸访问了他。他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雄辩地说明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是一支既有聪明才智又能为民族振兴献身的科技队伍，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工作精神，是令人十分敬佩的。李政道强调，当然，中国的领导特别是邓小平先生对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他们能高瞻远瞩地作出建造对撞机的决策，并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确保工程“如期甚至提前完成”。他们制定并坚决执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为中外合作进行高科技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负责这项工程建设的周光召、谷羽、张寿、林宗棠、张百发先生等都是出色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既注意充分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充分尊重科技人员的首创精神，又按照系统工程原理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最后，李政道教授深情地说，总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功使我看到：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具有自立、自信、自强精神的伟大民族！

（责任编辑：刘文）

沈钧儒和他的女婿范长江

●舒云

沈钧儒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著名的法学家。

范长江生前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著名的记者。

这是人们熟知的，但人们却并不一定知道范长江就是沈钧儒的女婿。

沈钧儒的爱女、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女士，近日披露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先说沈钧儒

沈钧儒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每一次他都是站在人民这一边，因此屡遭通缉。他受过戊戌维新的影响，办过地下印刷，专门印刷维新的东西。沈钧儒胸怀救国壮志，决定到日本去专攻政治法律。因为搞立宪活动，回国刚一上岸就差点被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在浙江活动起义。后又积极倒袁，袁世凯也要抓他。后又反对曹锟贿选，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南下，孙

传芳也要抓他。“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将他扣押，拟加枪杀。1936年11月，沈钧儒因抗日救亡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后扩大至全国各界，他任执委兼常委，进行各种抗日活动，声势浩大，被蒋介石抓了起来，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的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时称“七君子”。宋庆龄专诚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进行营救，她说：“七君子”是提倡抗日救国的，如果他们有罪，那我们都有罪。不把“七君子”放出来，我也要去住监狱。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得不放了他们。

沈钧儒是个十分爱国的人，他专门写过一段关于自己抗战的决心：“我爱世界，我爱一切。我爱我国，我爱我家。我爱我的朋友，我尤爱我自己。我爱和平，我不明白在这文明进步的时代中，为什么有这样无故侵略的战争。因此，凡世界含有侵略性之主义、理论及其设施行为，我应当反对之。”

日本侵略中国，沈钧儒愤怒地说：“分明是一群强盗到了我的家



1940年，范长江和沈谱结婚（左二为沈钧儒，右一是王炳南）

里，为什么不许我们说一声‘赶他出去’！”

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你们是被共产党利用么？”

沈钧儒干脆地说：“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为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

一次又一次生死的考验，沈钧儒已经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出狱后，他继续搞抗日救亡运动。

对抚养子女的问题，他痛感旧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凌，与科学技术落后不无关系。国家需要建设人才，他希望儿女学习科学技术。在他很困难的情况下，宁肯数月间几次断炊，不论典当、借债，也要供他们读书。

沈钧儒有5个子女，沈潜是最小的女儿，上面4个哥哥。大哥学医；二哥学土木建筑；三哥因得过脑膜炎学了美术，以后又学了商；四哥学电。沈潜学的是应用化学专业。大哥、二哥和四哥都是留学德国，三哥留学日本。本来沈潜也要留学欧美的，因为日本侵略没有成行。沈钧儒担心自己的小女儿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中，不时有生命危险，没想到自己最最疼爱的小女儿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没出校门就背着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是女儿没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恐怕也不会有范长江这么一个女婿，这就是志同道合的缘分。

再说范长江

那时是在抗战的武汉，范长江是新闻界救国会的会员，常常到沈钧儒家中与他商谈。沈钧儒对他印象不错。沈潜也就认识了范长江。和沈钧儒同是“七君子”的邹韬奋，是范长江的朋友，也是沈老的朋友。由他牵红线，向沈老推荐范长



毛泽东和范长江亲切交谈

江给沈潜。

沈钧儒是很喜欢范长江的。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思想上他们都很一致。

沈潜后来有一篇回忆范长江的文章，说长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具有强烈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第二，他热爱祖国和人民，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话、做真事。

第四，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比如，为了追求真理，范长江宁可在文凭到手的情况下，毅然脱离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而去街上卖豆浆油条，经过一段艰苦的工读生活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且选修了好几个系的课程。1935年7月，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历行经年，行程万余里，采访了大西北。他是第一个报道长征的记者，比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报道早一年多。他抢在国民党三中全会

开幕时发表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蒋介石大骂他，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则给范长江写信表示深致谢意。以后，当《大公报》老板用优厚条件来收买他，让他放弃“民主、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时，他又坚决脱离《大公报》，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范长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正像范长江准确预言了红军长征的结局一样，他也准确预言了新中国的诞生。

沈老仅仅凭自己的接触，就已经确认范长江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了。

邹韬奋一当红娘，沈钧儒就同意了。但是，他说他作不了女儿的主，这事还得问女儿。

这时，沈潜正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她说她还小，学习还没有完，不想谈这事。虽然范长江已经是名

记者了，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已轰动全国，沈谱当时却没有答应，当然也没有拒绝。

一晃两年，沈钧儒已经搬到重庆，范长江还是照常来沈家，照常谈论时事政治。这时，沈谱已经大学毕业，回到父亲身边。沈谱说她个人并没有推动这段感情，不知道大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沈谱和范长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逐渐产生了感情。这样，皆大欢喜，一对新人终于结合。

后来，沈谱说：“当时还征求了邓颖超大姐的意见。”这时沈谱已经入党，她最大的担心就是不知道范长江是不是党员？

邓大姐笑了，说：感情可以发展，没问题。

沈谱这才放心与范长江谈恋爱。正像范长江不知道她是党员一样，她也不知道范长江是党员。很有意思的是，她是与邓大姐单线联系，范长江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本来范长江1933年在武汉时就向周恩来提出要入党的，但周恩来认为他当时是《大公报》记者，先留在党外，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对党更有利。后来在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由周恩来介绍，延安批准，范长江成为秘密党员。



沈谱在她父亲塑像前

对外还是民主人士的面目。沈谱也是那一年入党的秘密党员。

婚礼那一天，鲜花堆满了新房和院子。很多同志来祝贺，周恩来也来了，并带来了一个用苏联乌拉山石制成的像架和一块漂亮的红花台布，还有一封邓大姐在乡下治病时写的一封信。

对于范长江和沈谱的婚礼，最高兴的还是沈钧儒，他胸佩大红花，满面笑容，对邹韬奋夫妇说：“谱的婚姻大事办好了，终身有伴，我也放心了。”并即兴写了一道诗：题在女儿与范君长江结婚纪念册上。

1940年10月于重庆

“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祝吾婿与女，笔勉同心结。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携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鸡鸣怀古训，毋恋衾枕热。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行俟胜利日，轰饮合欢杯。”

范长江和沈谱结婚还不到10天，就去了桂林参加国际新闻社的年会。这时，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手签了逮捕范长江的命令，周恩来让他转移到了香港。

不久，党组织也通知沈谱转移香港。

沈钧儒实在不想让唯一的爱女离开自己。自从几年前他夫人病逝后，他就与女儿相依为命了，平时的日常起居，都是由女儿照顾。但是，女儿不走怎么行？环境这么险恶，还是应该让她去和女婿团聚。女儿走后，他含泪写了一首诗，名为



范长江遗像

《铺被词》。

1941年3月之末，女儿有远行，于其行之三日，作此词以自遣：

朝铺被，夜铺被，对了两头叠四角。手叠被，泪暗落，心想车轮转辘辘。转辘辘，行何速，岂有鞭笞随其后，持比鞭笞情更酷。大江水，无情绿，我欲登高望见远，知汝今宵何处宿。江上有雾外山，青山多于蜈蚣脚。

往时事，尽思索，驱不尽，断还续。每出门，仁路曲，下坡背影记犹熟。忽地归来碾椅后，似感温软抱吾目，仰面纵笑手双握，此景一瞥等摧屋，人生如梦亦复乐，推被起坐祝汝福。

女儿离去的那些日子，是沈钧儒最伤心的日子，只是他想到女儿跟着女婿范长江，心里才略略有些安慰。以后，沈谱又数次离开父亲，直到沈钧儒去世前一年，沈谱才经组织决定给父亲当政治秘书。而这时，沈钧儒正在住院，范长江从广东出差回来，给老人带了一头石湾的陶牛，老人很是喜爱。老人望着女儿女婿和四个外孙，高兴地笑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刺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的背后

● 金陵客

1931年7月23日6点钟光景，嘈杂的上海火车北站，忽地出现大批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一阵警哨声，警察将滞留在站前广场上的旅客驱赶到广场四周。不一刻，由警车开道，浩浩荡荡开来一溜车队。轿车在广场前依次排列停稳后，从轿车里走出了以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为首的一班文武官员，此外还有上海滩的闻人名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向松坡、俞作柏等头头脑脑，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各界代表。同来的还有驻沪海军的一支军乐队。

吴铁城、杨虎等在众人簇拥下，从贵宾出入口进入车站，在站台上列队恭候。他们前来迎接的“大人物”，一位是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长兼外交委员宋子文，另一位则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身名显赫的宋子文，不仅掌握着财政大权，加之他是国舅爷，深得蒋介石的依重。宋在上海西摩路141号有一幢私宅，他常在处理浩繁的公务之余，自京（南京）返沪度假小憩。不过，他今日抵沪却是为了一桩公事——与某国财团协商国民政府的借贷事宜。

同车而来的日本公使重光葵，个头中等，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乍看书生气十足，实则是个老谋深算的职业外交官。

7时45分，这趟本该6时55分抵站的55次京沪列车，才长鸣

汽笛缓缓驶进站台。

军乐队奏起了《迎宾乐曲》，吴铁城、杨虎等人也一扫满面倦容，抖擞精神，准备鼓掌欢迎等待已久的二位贵宾。

宋子文、重光葵乘坐的两节专列加挂在列车的尾部。车门打开后，两个体格魁伟的卫士敏捷地跳下来，手持匣枪一左一右守住车门，紧接着又从车上下下来十多名卫士，在站台上围成一道扇形屏障。

一切安顿停当，四五个气度不凡的文职官员，才从容不迫地从车厢里走出来，踏上站台，朝迎宾队伍走去。走在头里的一个年近四十、中等身材的男子，身着白哔叽西服，头戴一顶白色拿破仑帽，手持一根橙黄色文明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此人正是经常在报上出现的宋子文！

就在他们一行人将要走近迎宾队伍的一刹那，忽听列车前端一节车厢里传出“砰砰砰”三声枪响。众人还不明就里，站台上不知从哪儿又涌出七八个早已埋伏在此的枪手，“砰砰砰”又是一阵乱枪，子弹飞蝗般射向下得车来的那一群要人。

宋子文身旁一名文官当即被子弹击中，一头栽倒在站台上。

站台上顿时炸了营，卫士、警察、特工各自保护着自己的主人朝安全的地方躲避。在一遍“抓刺客”的叫喊声和枪击声中，列车上的普通旅客再也顾不上什么禁令，

纷纷从车门、车窗处挤下车来，四散逃命。

在站外广场上担任警戒的警察闻声蜂涌而至，与正在撤出站外的刺客短兵相接，相互对射了一阵。双方相持不下之时，站台上又是轰隆隆三声巨响，有人扔出三枚发烟弹，浓烟滚滚遮住了警察的视线，刺客们乘机逃之夭夭……

当日，沪上各大报馆都发出号外，以通栏黑字大标题《宋财神今晨遇刺 唐腴代主遭难》，报道了今晨发生的“北站刺宋”事件，称宋子文在北站遇刺侥幸逃脱，他的机要秘书唐腴中弹身亡云云。

而对有人刺杀日本外相重光葵却禁若寒蝉。

刺宋是针对蒋介石的，那么刺重光葵是谁干的呢？

谁竟敢在中国领土上刺杀日本外相！事情还得从日本侵华头



土肥原贤二

号间谍土肥原贤二说起——

日本的一小撮战争狂人对中国东三省觊觎已久。早在1928年，被“东北王”张作霖聘为“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的土肥原贤二，为了阻止中国统一，达到他们永远霸占满洲的图谋，他在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建川美次少将的组织下，与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密谋，将从北京乘专列返回奉天的张作霖炸死在皇姑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之后，事态并未像土肥原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方向发展，少帅张学良秘密从北京返回奉天，很快控制了局势。当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此东北各地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张学良又命人在帅府老虎厅内诛杀了奉系中顽固亲日的老臣杨宇霆、常荫槐，以表明自己与日本人势不两立的决心。

土肥原贤二一伙的阴谋彻底失败了。为此受到日本国内军界、政界纷纷责难，土肥原贤二奉调回到日本。一年后，土肥原贤二被帝国参谋本部派往天津，出任特务机关长之职。



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念念不忘他在满洲“未竟的事业”，暗中与跟他有帝国士官学校同窗之谊的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秘密联络，染指霸占满洲的行动。阴谋在1931年9月28日自毁一段南满铁路，然后栽诬中国守军所为，以此为借口突袭奉天卫戍部队的营区“北大营”，一举攻克奉天。

眼看实施计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土肥原贤二突然忧虑起来。关东军虽然训练有素，但其人数不过14000余人，而当时留在关内的东北军则有30万之众，且装备有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兵力是1:20，实力过分悬殊，胜数难料，倘若美英等国干预，后果不堪设想。他最终想出了“一石二鸟”的计划。

1931年6月的一天，时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武官的田中隆吉，悄悄踏上了驶往天津的海轮。他此番是奉召去天津会晤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的。

田中隆吉不仅是个精明强干的间谍，他身材魁伟、风度翩翩，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他被土肥原贤二派往上海不久，在“三井物产”的一次招待会上结识了只有23岁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他被这位前清王室的王女的风采给迷住了。川岛芳子很快就投进了这位时年37岁的“魔法军人”的怀抱，两人从此结下了孽缘，田中隆吉为她购置了一所住宅，金屋藏娇。

田中一到天津，土肥原贤二为避人耳目，没有在天津特务机关内召见田中隆吉，而是赶到田中下榻的一家偏僻的旅馆去会见自己的老部下。

“田中君，这次让你来，是要交给你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事关大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

田中隆吉挺起胸膛，主动请

缨：“机关长，只要我能办到的，就一定去办。”

“我要你刺杀一个人。”

“您要干掉谁，尽管吩咐！”

土肥原贤二一字一顿，从牙缝中迸出三个字：“重——光——葵！”

田中隆吉被土肥原说出的这个名字吓了一跳，猝然色变，愣了片刻才问：“机关长，您没有弄错吧？！”

重光葵是日本驻华公使，田中不清楚他何罪之有。况且日本人杀日本人，又是在中国的地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田中隆吉茫然地望着老上司。

田中隆吉的惊诧似乎早在土肥原的预料之中。他拍着老部下的肩头道：“田中君，你听我慢慢道来——”

土肥原简要介绍了“九·二八满洲计划”，然后提出了自己对这次行动能否稳操胜券的担忧。

田中隆吉频频点头，钦佩老上司的远见卓识。但他对刺杀重光葵公使却感到不可理解，当年他配合土肥原炮制“皇姑屯事件”，刺杀张作霖也是意在挑动侵华战争，在他眼中，张作霖虽贵为“东北王”，却只是一只中国走狗，而重光葵就大不相同了，他是日本重臣呀！

“机关长，”田中隆吉小心翼翼地问，“我仍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刺杀重光公使。”

“你要用重金雇佣一批中国青年红帮去刺杀重光，让他们觉得完全是个人恩怨。事成后，我们可以大造舆论，说公使是被对帝国心存不满的中国激进分子所杀，以日侨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为借口，刺激内阁批准向中国出兵。”

“可是，为什么偏偏选中重光公使呢？”田中隆吉又问。

“他经常在京沪两地出现，易

于得手，再说，他是内阁中顽固的保守派，一向鼓吹以经济渗透方式来巩固和扩大帝国的在华利益和影响，反对使用武力，是军方的绊脚石，所以我的计划报到大本营后，立即得到了批准。”

田中隆吉听说刺杀重光葵的计划是得到帝国参谋本部的首肯的，立即应承道：“我坚决执行大本营的决断，誓为帝国赴死效命！”

“很好！”土肥原笑嘻嘻地交待了一些行刺重光葵的具体要求后说，“回到上海去，好好地干吧！”

田中隆吉返回上海，立即着手刺杀重光葵的行动计划。他雇佣了青红帮的一个名叫常玉清的杀手，几经谋划，也把刺杀重光葵的地点选定在重光葵经常出没的上海火车站。

田中隆吉派来刺杀重光葵的青红帮杀手常玉清等人，当时也混在人群中。他们错把走在宋子文身旁的气度不凡的唐腴骈当作是重光葵了，见唐腴骈跌倒地身亡，以为大功告成。

两批人马都把唐腴骈错当成自己刺杀的对象，见击中目标，扔出烟幕弹，借助滚滚浓烟的掩护，纷纷撤出战斗。

那么，重光葵何以能幸免于难呢？原来，这位日本公使的“官脾气”救了他一命！

说来也巧，重光葵经常乘坐55次由南京去上海，每次都是列车过了真如车站后才由列车员把这位“贵宾”唤醒。偏巧在这一天，55次列车鬼使神差在苏州站出了毛病，而列车员当时睡眼朦胧，错以为列车已经到了真如车站，便叫醒了重光葵，惹得这位公使大发“官脾气”，最后索性穿好衣服大骂特骂。列车抵达北站后，重光葵仍在为列车员搅了他的好梦一事喋喋不休，明知吴铁城、杨虎等人出

面迎接，却故意不肯下车，以示“抗议”。谁知这样一来，却迷惑了月台上的常玉清等青红帮刺客，让他死里逃生。

北站刺宋的闹剧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然而，历史的大幕却依然开启

着。本文的主人公们又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历史大戏……

土肥原贤二等战争狂人，并未因田中隆吉未能在上海成功地挑起一场侧应战争而放弃侵吞满洲的计划，相反加速了侵略的步伐。当年（1931）9月8日，土肥原如愿以偿返回奉天，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十天之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比原定于9月28日动手的计划整整提前了10天。关东军在事变的次日，侵占了奉天等20余座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事变后，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市市长。

田中隆吉在“九·一八事变”后，又密谋挑起上海事变，以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寇侵占东三省的舆论压力。他在川岛芳子的帮助下，指使常玉清等杀手化装成中国工人，刺死日本莲宗和尚，挑起所谓中国工人袭击上海日本妙法寺的“僧侣事件”，由此为导火索，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即所谓上海事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



1945年9月2日，盟军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持手杖者，为日本外相重光葵。

事变”，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淞沪抗战期间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勇军，协助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一批爱国志士又在“斧头党”的基础上组建了“铁血锄奸团”，专门刺杀日酋、汉奸，搞得他们整日鸡犬不宁。1932年4月29日，有“皇军第一名将”之称的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同时赴会的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了左腿，以致他后来升任日本外相时，被世界嘲讽为“跛子外长”。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将日寇彻底赶出了国门。9月3日“跛子外长”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协定。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庄严宣布：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与其他5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重光葵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1948年12月22日深夜，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走向绞刑架，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责任编辑：刘文）

董必武指挥我们占领

● 杨培新

反腐败，是普天之下人心所向。国民党上至蒋宋孔陈，下至保长连长，几乎无官不贪。人民大众愤懑之情犹如火山躁动，国民党宣传机构为维护官僚集团利益，竟然不顾民意，抓人、封刊……于是，在特务如蚁的报社，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舆论阵地争夺战。

重返重庆

轮船靠岸的笛声，提醒我已经到了重庆朝天门。

1941年春节，皖南事变发生，当时我在中共南方局青委《战时青年》工作，青委书记刘光把我召唤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嘱咐我紧急疏散，自找社会关系隐蔽。当年就在特务密布的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现在，1943年，我终于又回到重庆。

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的政治



1943年，杨培新在重庆

秘书鲁明告诉我，董老长时间考虑，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同志，去和《商务日报》的徐逸安配合工作。鉴于你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和隐蔽工作的锻炼，要你到《商务日报》去虎口夺食。任务是把这个报纸夺取过来，并改造和运用这个报纸。对重庆《商务日报》我并不陌生，它是一个反共反苏、臭名远扬的报纸。我当时才21岁，能改造这个报纸么？新闻界知名人士萨空了，进《新蜀报》当经理，但最后却被特务武装接收，撵出《新蜀报》。可这是党的决定，不能讨价还价。

我立即到《商务日报》门市部找徐逸安。他机警地把我引到一家茶馆密谈，给我介绍了《商务日报》的人事关系：社长高允斌，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来是康泽当年打进四川组成别动队的头目之一，现在是三青团的负责人。编辑部由军统特务金东平把持，林桂圃、刘光炎等反共文人担任主笔。跑行情的记者谢自强，也是军统特务。这个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金东平每发一次反共新闻，就可得到一份奖赏。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商务日报》的津贴，因为法币贬

值，变成少得可怜的一点钱。社长高允斌被架空，他的太太谭德芬，怂恿高另找一帮人夺回实权。我听了以后得到的印象是：敌强我弱，对比悬殊。但我还是答应立即搬进报馆。

《商务日报》社址设在林森路商业场，日本飞机轰炸后，成了废墟，只剩下左边的一栋楼房。我到报馆后，因报纸名誉太坏，订户不多，广告很少，对职工开不出工资，已经成为十足的破落户。报馆只保证到时供应平价米——一种霉米。宿舍很简陋，我和白鸟、逸安同住一间房，他们两人都患肺结核，习惯于向天花板吐痰。我经常身无分文。有一次到上清寺财政部采访，连乘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

强我所难

董老是通过鲁明对我实行单线领导。要我到《商务日报》做外勤记者，从跑经济新闻入手，在川康工商界和迁川的大中小厂商中以文会友，广交朋友，争取尽快成为名记者。

这真是强我所难。因为我当过青年救国团武昌区组织部长，在周

《商务日报》



董必武

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政政治部第三厅抗敌宣传队第三队任地下党支部书记，重庆《战时青年》社编辑，《新湖北日报》副刊通讯室主任，搞的是青年运动和文艺。我原来读过一些经济书籍，也在中华大学念过工商管理系，但并没有真正接触经济实际。而且我性格内向，不会“扯把子”。徐逸安陪我去旧货摊买了一套旧西装，一双旧皮鞋，算是有了“包装”，然后教我抽烟。我只学会了吐烟圈。

一次，我出席记者招待会，看到浦熙修（《新民报》）、子冈（《大公报》）、黄冰（《新蜀报》）、毕群（《世界日报》）等许多记者在座，谈得非常热闹。当我一落座，大家就鸦雀无声。我这才知道，他们认定这个特务报纸出来的不会是好。我在抗敌宣传队的一位战友，还四处向老朋友打招呼，说我进了特务报纸。这时，我仿佛掉进污水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只好暗下决心，争取早日实现《商务日报》的改造，否则真是无面目再见江东父老。

在商言商

周恩来、董必武的战略是要我们从组织上夺取《商务日报》，不许再作反共宣传，为我所用。并提出“在商言商”的方针。董必武说，提

“在商言商”的口号，这是“社会习惯许可的范围”，可以团结中间派，孤立顽固派。

《商务日报》内，我们人少力单，必须团结中间派。当时《商务日报》的总主笔是王烈望，兼任主笔多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的专家学者。王烈望是马寅初的学生，写过《外汇概论》等书，担任交通大学教授。他为人敦厚，有正义感。我们和他谈到报纸尽造谣言，有损报格，应当“在商言商”，不应刊登那些反共新闻和言论。他深有同感，于是，我们公推他出面，向高允斌建议。高允斌同意，并下条子给主持编辑部的金东平，非经高允斌看过，不准发政治性的社论和新闻，只登经济社论。金东平虽然还根据国民党宣传部的意旨，不时登一些反共的东西，但数量上已大为减少。

调虎离山，占领编辑部

1944年，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迫于形势，组织中外记者团访延安。金东平提出由他代表《商务日报》，以总编辑身份参加。金东平长一脸横肉，谈话时常把手枪往桌子上

甩，一副流氓面孔。我们赶紧向鲁明汇报，是否要制止他上延安。过几天他回话，领导人（董老）说：延安已作好充分准备，不在乎多他一个军统特务。还要我们怂恿高允斌派金东平去，好乘机占领编辑部，把版面完全控制起来。

金东平一走，我们立即去占领阵地。金东平找来一个校对主任，对蒋介石的名字倒排了也没有校对出来。徐逸安“提醒”他说：你捅了大漏子，很可能会捉去枪毙。他连夜逃出重庆。徐逸安和我编报，他编一版，我编二版。徐逸安累得吐血，但他满不在乎。徐逸安1942年进《商务日报》，比我早一年。他向董老汇报了《商务日报》内特务林立、相互倾轧的情况，认为有可乘之机。董老当时就形成派人打进去的设想。徐逸安机智灵活，行动神秘，令人莫测高深。高允斌也看不透他，曾对我说：“逸安是有老板的人，今晚他是汇报去了。”认为他是军统的人。高允斌的妻子谭德芬，对逸安很好，老缠着他，逸安对她事事奉陪，目的在于通过谭德芬影响高允斌。大家有一点委屈，常常对他发泄，他默默承受。逸



重庆新华日报

安总是顾全大局，不讲工作条件，不要名义。他喜欢幕后策划，不喜欢出头露面。建国后，他到《光明日报》工作，后在“肃反”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后病逝了。

我们原来想让逸安当编辑部主任，但他身体负荷不了。又找到了程光锐，他是平安保险公司的职员，在鄂北编过报，他毅然舍去优厚、安定的金饭碗来到《商务日报》。因为报馆发不了工资，老婆离婚他去，我们亏欠他太多。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一切，稳重踏实的共产主义者。后来，我把湖北恩施《新湖北日报》资料室主任马锐筹找来，他有正义感，我们叫他“马老哥”。他不多说话，但讲的恳切、合理、使人心折，他成为编辑中人缘最好、最公道、大家信服的班长。陈国良由逸安推荐，担任编辑部副主任。陈国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懂得党的地下工作，老练沉着，深得编辑们的信任。雪牧是诗人，他初来时，为苏军解放柏林，标上“红旗飘扬在柏

林城头”的标题。金东平说：这比《新华日报》还利害。我们对高允斌打圆场，说他是诗人性格。刘火子从桂林撤退重庆，经金仲华介绍到《商务日报》，他天真纯朴，正在和金姑娘（金端苓）谈恋爱，像一对大孩子。韩劲风、翟静之随后也来当编辑。董老安排的彭友今一直坚持工作到1949年重庆解放。编辑部还组织一批青年做校

对工作，何乃迪任校对主任，王原松等担任校对。

这个班子执行党所提出来的“在商言商”方针，我们把同盟胜利社的反共新闻，刘光炎、林桂圃等的反共社论，全部扣下来，扔进废纸篓。金东平从延安回来后，就住在编辑部隔壁，监听、骂街、捣乱，肆无忌惮。他写出的《延安归来》，要求在《商务日报》刊登。我们让报馆拿钱替他印了几百本，由他拿去报功。金东平要求上班，我们要高允斌抚慰他：“好好休息，工资照发”。我们自己发不出工资，但对金东平却是准时发给十足工资，让他悠闲自在。我们执行了“挤”而不打的策略，避免了狗急跳墙。周恩来要我们“集中火力”反对“危害最大的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和合作企业。”他当时就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很可能结成统一战线。董老就根据这一精神，要把《商务日报》用在这个战略方向上。于是，我们从下列三个方面展

开了猛烈的攻击。

揭露国民党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的通货膨胀，从1940年开始转入恶性阶段。法币发行日益增加，物价猛烈上涨。马寅初1940年冬天，就在《时事类编》上撰文，指出过去几年是用发票子，掠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的实际收入来打仗的。蒋介石立即逮捕曾经为他和宋子文、孔祥熙讲过课的立法委员马寅初，押往贵州息峰集中营。马寅初在宪兵团长宣布逮捕后，要求在重庆大学作完预定的讲演。马老带着夫人、孩子，让他们坐在讲台上，指着他们说：我也有妻子儿女，但是我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豁出来讲真话。他再次谴责官僚资本利用通货膨胀掠夺人民群众，言词恳切，声泪俱下。讲完以后，学生们列队欢送，哭声震野。

由于物价一日数涨，职工和知识分子实际收入降为抗战前的10%。闻一多教授，战前工资400多银元，这时实际收入下降，不能不依靠卖衣物度日，为人刻图章到深夜。

《商务日报》用很大篇幅，报道国民党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的情况。当时，中央银行里掌管法币发行的人，经常抄送法币增发的统计数字、中央银行编制的物价指数给我们。我们有根有据地暴露通货膨胀的真相。并指出国民党怎样运用出售黄金来欺骗和麻痹人民。当时重庆其它报纸都不报导物价行市，《商务日报》每天报导花纱布、日用工业品、工业原料上涨的动态，以及黄金、美钞黑市领头暴涨的情况。使得升斗小民、家庭主妇不得不看《商务日报》。这就起到动员各阶层群众反对国民

党的作用。

暴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

通货膨胀带来统制经济，官员必然乘机以权谋私，而四大家族更是利用手中特权，迅速形成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官僚资本。国民党反动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使这些贪污腐化案件不断暴露出来。孔祥熙所属中央信托局信托处林世良运用职权贩运私货，被军统抓住，告到蒋介石那里，最后不得不忍痛枪决。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及其家属贪污、贿赂案，也被军统逮住告到法院。起初重庆各报对此并不重视，《商务日报》却抓住这个机会，到法院听审和调查，把全案揭发出来，对孔祥熙施加压力。对农民银行囤积居奇案、黄金案等等也紧紧抓住，写新闻、特写、专栏，把矛头指向四大家族。

揭露国民党政府统制经济黑幕 支持鼓励工商界起来斗争

当时，在重庆由西南实业协会和一些经济学家组织的星五聚餐会，（每星期五中午聚餐），边吃边听报告，然后边发表抨击国民党政策的议论，对孔祥熙、宋子文发起猛烈的攻击。我参加星五聚餐会，并和他们交朋友，拿到翔实材料，在报上发表。西南实业协会是张群等政学系头头支持的，他们和孔宋之间有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张嘉璈原来经营中国银行，蒋介石、宋子文对中国银行强行参股，并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张嘉璈被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长。张嘉璈对此强烈不满。抗战期间，

他到美国考察，美国认为他代表中国的自由民主势力，加以支持。张禹九向他哥哥张嘉璈推荐，请我上重庆南岸黄山（那是蒋介石和其他要人的居住区）张嘉璈住宅谈话并吃饭。张抨击当时孔宋的财政经济政策，我列举事实支持他的观点，怂恿政学系向四大家族开炮。抗战胜利后，孔宋迫于舆论压力，先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企图运用政学系张嘉璈，拉拢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残局。我写了“两张的财权”，指出蒋介石想重演1927年拉拢政学系，利用民族资产阶级镇压革命势力的故事，劝张嘉璈不要跳入火坑。此文在《经济日报》上发表后，张禹九知道是我写的，张嘉璈来沪后特地请我上张公馆吃饭。我乘机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劝他从中央银行总裁任上退下来。张嘉璈后来没有跟蒋介石上台湾，而是到美国教书。全国解放后，中国银行仍保留张嘉璈的理事席位。

四川企业家卢作孚办民生轮船公司，国民党军政部要他运兵运粮，但给的运费不够成本。《商务日报》呼吁，迫使当局提高运费。接着四川的土财主，包括内江的糖

商、自流井的盐商，也来重庆找我们。《商务日报》帮他们开记者招待会邀请名单，帮他们准备材料。运用社会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提高收购价格。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来请愿，要《商务日报》包打官司。对重庆企业家胡子昂、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我们也建立了联系。

抗战爆发以后，迁川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的久大、永利、黄海化学工业社，受四大家族压制，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和外汇不给解决，对其酸碱产品压价收购。我们访问范旭东，写成访问记，称赞他和英国、日本化学工业的较量。又访问了总经理李烛尘。李对我们大发牢骚，我回来发了头条新闻。李当时很惊慌，怕国民党要跟他算帐。但是企业家称赞“烛老敢讲话”，国民党不但没动他，而且被迫提高酸碱收购价格。李的胆子也就逐渐大了起来，从此，他和共产党交朋友。还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轻工业部长。陈光甫是卓越的银行家，他以五万元资本创办上海银行，后来存款上升到几亿元。他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是同学，为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

“江浙财团”的首脑之一。我去访问他，他对四大家族已经失望，对共产党八路军深表关注。后来，他经冀朝鼎安排，会见了周恩来。章乃器在重庆和陈光甫合作，办上川实业公司，他为工商界仗义执言，言必中的。1948年我到香港创办《文汇报》，他是港九地产公司经理，帮助《文汇报》和工商界建立密切联系。他回北京以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后被错划右派，我当时深为惋惜。

军需署事件

国民党政府任命陈诚为军政部长，派庄明远为军需署长。军需署委托土布工厂代为织布，但克扣工缴。《商务日报》为之仗义直言。新闻刊出，他们立即在重庆市党政军联席会议（各方特务头子都出席）上，提出要《商务日报》道歉，承认造谣惑众，破坏军需生产，并惩办肇事人员，撤消高允斌的社长职务。高允斌被吓破了胆，金东平趁机提出把我们这些人撵出去，由他接替。



1983年杨培新在澳门

军需署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当场宣布此事，羞辱《商务日报》，施加压力，逼迫《商务日报》改组。

这是一场生死搏击。如果战败，我们就全军覆没。当即向鲁明汇报，当场商定，党尽最大努力动员重庆各报记者，于军需署开招待会那天，一致刊登比《商务日报》的新闻更详细、更尖锐的报导，以孤立军需署，逼迫它退却。鲁明连夜分别向新闻界朋友打招呼，并通过章乃器、胡子婴、罗叔章等动员小厂家联合会从旁呐喊。我们就具体行动。我们和各报记者已有比较深的接触，《大公报》徐盈、子冈、高集、曾敏之等，《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扫荡报》采访部主任谢爽秋、《时事新报》采访部主任陈翰伯、《国民公报》采访部主任朱某、《新蜀报》记者黄冰、阙耀南等都是记者群中很有影响的朋友。他们答应想方设法同时刊出新闻。

《商务日报》社长高允斌接到军需署通知，唉声叹气，他表示不愿受人当众羞辱，并被迫道歉。他说：你们闯的祸，应由你们去担当。他要我们代表报馆去挨骂。

我到军需署，看到庄明远对各报记者谦恭有礼，唯独对《商务日报》记者横眉竖眼，摆出一副“鸿门宴”的架势。我们不卑不亢，泰然自若，准备反攻。军需署长逐一看过当天各报后，脸色逐渐变化，他知道众怒难犯，他要对付的，已经不只是《商务日报》而是重庆各报了。他立即转圜，在会上道歉，说自己督促不严，希望各报不吝指教。事后立即提高织布的工缴。土布业在《商务日报》大登鸣谢广告，并誉之为“工商喉舌”。

但我们自己却感到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场不应该打，而借助党的力量才打赢的仗。我们总结经验，今后要集中火力打击四大家

族，孔宋无兵无特务，应当重点进攻；陈立夫、陈果夫拥有中统，要看准了才打；对政学系官僚要分化、争取。对其它人则不要轻易触动。为了便利考虑策略、掌握分寸，由我审查和批发经济新闻，认真把关，从而避免四处放枪，到处树敌。

“黄金案”后出现的转折

国民党政府1945年3月29日调整黄金价格，由每两2万元调到3万5千元。调价前一天，重庆、昆明等地多卖了一万多两。这显然是事先泄露消息，是一个大的贪污案，各方喊打。一天，《国民公报》采访部主任带他的夫人来看我，那位龙小姐在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当小职员，那天她也买了几两黄金。中央信托局决定把她抛出来当替罪羊。她心中气愤，就把中央信托局怎样做手脚，怎样分脏和盘托出。我们建议她找沙千里律师辩护，并答应在舆论上给以支持。

我拿到龙小姐提供的材料，立即赶到财政部，要求会见孔祥熙财政部长。但他们的回答是：“孔部长赴美，现由俞鸿钧代理部长。”我说，就见俞部长。但他们去问后，答复是俞部长正在开会，不能接见。我说：“好，你今天不见，我明天和你报上见。”我转身走了，不一会，有几个人跑来：“请杨先生回去。”

俞鸿钧部长已在办公室等我，他笑着说：“不知杨先生有何见教？”我说：“您刚代理财政部长，就发生黄金案，你责无旁贷。我已掌握材料准备明天见报。”他说，“既然杨先生已经掌握材料，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讲明真相。那天，是宋子文院长主持会议，有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钱币司长戴铭礼等和我参加，当天作出提高黄金价格的决定。至于那天多卖了多少两黄



1991年，原重庆《商务日报》部份工作人员摄于北京。前排右起：鲁明、彭友今、杨培新、张孟恢，后排右起：张彦、王芳松、谢牧、程光锐、夏景凡。

已向俞鸿钧讨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当。他说俞部长器重你，还请你到他家吃饭，你可否向俞鸿钧美言几句，促成其事。他并没有问我和《商务日报》的事。我这才放下心事，并答应有机会就帮他忙。《商务日报》高允斌知道王新衡请我吃饭，认为我这个人很不简单，对谢自强等军统特务也起了威慑作用。抗战胜利后，他去上海，名义是上海市府调查室主任，实际上是军统局上海站长。我们到上海筹办《商务日报》，到他的杜美路住所拜访他。

巩固《商务日报》阵地

《商务日报》一直很穷困，没钱买纸，没钱发工资。如果找不到支持，高允斌早晚也会把报纸盘出去。俞鸿钧要我去当政策秘书之后，徐逸安忽然想到可以通过他借一笔贷款。俞鸿钧是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下辖中央信托局，经

营存贷款业务。政府银行贷款利息低，借到贷款买成黄金、美钞，几个月就涨了一倍，归还本金后还能落下一批黄金、美钞，可以补贴报馆开支。这事得到黄苗子的支持，我向俞鸿钧提出并安排高允斌出面会见，俞批给中央信托局办理。中央信托局遵照办理，借了一笔巨款，买成数十根金条。其中，一部份分给了高允斌，大部分留下补贴日常开支，报馆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高允斌看到我们不仅能编好报纸，使报纸信誉日隆，而且能够筹资使他得到实惠，对我们言听计从。这时正式任命我为采访部主任，马锐筹、陈国良为编辑部主任，徐淡庐为经理，吴清友为总主笔。

这时，我们为了增强实力，吸收了钦本立、王思曙、梁柯平、张孟恢、张光琛、夏宗禹等当记者。由于鲁明严格审查我们进入，而且多方调查每个人的来历，宁缺毋滥，因此，政治素质较好。《商务日报》

穷的出名，贪图名誉、地位、金钱的人，知难而退。为了便利记者在短时间内成为内行，我们实行分工负责制。钦本立搞工业、王思曙搞财政，梁柯平搞交通，张孟恢联系四川企业力量。党给的创办费，只准用于活动和宴请有关人士，自己不拿生活费，靠写稿维持生活。后来，我们参加上海、香港《文汇报》，仍然维持《商务日报》的传统。我们决定重建《商务日报》董事会，我们不满足于掌握阵地，准备请何北衡、范崇实、温少鹤、卢作孚、吴晋航等企业家投资入股，并请黄苗子进入董事会，充实报馆资金，采用现代化设备，改善员工生活，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

抗战胜利后，上海重新恢复为全国经济中心，我们的《商务日报》在上海迅速立住了脚跟。

（责任编辑：刘家驹）



鲁迅是怎样塑造阿Q的呢。我们自然会联想起他塑造阿Q用的几个原型。这里仅举周建人《阿Q风俗人物一般》一文中介绍的五个人：阿D、阿IS、阿Don和农民阿贵兄弟，这都是鲁迅用以塑造阿Q的真人实事。除去阿Q的“Q”，是确实取自农民阿贵“贵”字头的一个英文拼音字母外，阿Q性格中那些欺弱怕强、欺软怕硬、自高自大、自轻自贱，既极端保守又好称“革命”，既现实失败又精神胜利，向吴妈下跪求爱……大都是取自阿D、阿IS和阿Den三个破落地主的人和事！

它清楚说明，作者为了按照自己“写出一个现代我们国人的魂灵”这一主题思想来塑造阿Q的，因此，必须“杂取种种人”。这种“杂取”，是为了“国人魂灵”具有典型性，大凡有“国民劣根性”不管是地主、农民都取，是不分阶级的。因此，三个破落地主和两个农民都被鲁迅写到同一个贫下中农的阿Q上去了！

这对于长期忠实于“阶级斗争”观点的人是难以接受的。

二

五十年代初，以冯雪峰为代表承袭鲁迅“国人魂灵”的观点因模糊了阶级斗争观念，被打倒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农民典型”论。认为阿Q是农民阶级的某种典型。

冯雪峰挨整，实在是冤哉枉也！《阿Q正传》发表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才刚刚成立，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没来得及构思；鲁迅怎么可能按照阶级观点来写作《阿Q正传》与塑造阿Q呢！在某些具有强烈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人看来，地主、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是绝对不能容忍写到一起去的。可是，塑造阿Q的是鲁迅；在鲁迅“写国人魂灵”的非阶级观点看来，地主、农民……都是“国人”，则完全无妨写在一起。

鲁迅在给《答〈戏〉周刊编者》信里，清楚指出：

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鲁迅这里说的写“一切人”，也就是写国人魂灵的意思。鲁迅原本就有——阿Q是“农民模样”。但又不是写农民，而仍是写“国人魂灵”的——这两重意思。这才是鲁迅关于阿Q的更为完整的本意。

是农民，又不写农民，而是写“国人魂灵”的——这不自相矛盾了吗？

我认为，阿Q的这一矛盾，并不是逻辑矛盾，鲁迅的“国人的魂灵”，并不是通过什么抽象、不存在的“国人”去表现，而正是通过形象的“未庄的国人”，即农民

阿Q去表现的。例如，阿Q与王胡比虱子，比谁的多，谁的大——这在干干净净的大人老爷中自然绝对没有的事，但它决不是表现农民不讲卫生，倒正是讽刺大国民们香臭不分、美丑不辨的恶性攀比；比谁的公馆更阔绰、谁的轿车更豪华、谁的姨太太更漂亮……等等。再如，阿Q与王胡、小D在街头巷尾“进三步、退三步”的“龙虎斗”，这自然更是素称文明的达官贵人所不屑，乃市井小民之所为。但这决不是表现农民粗鄙的打架斗殴，而正是抨击中国上上下下都普遍存在、闻名世界的“窝里斗”。

这种暴露，主要是凭借象征等手法：用农村“未庄”象征农业中国；用全体“未庄人”象征大多数“国人”；用农民阿Q来象征这大多数“国人的魂灵”；用阿Q的种种农民表现，象征种种国民劣根性……等等。阿Q的农民表现与国民性实质的矛盾，就通过这种象征性表现手法统一起来。



总而言之，离开“国民性弱点”，阿Q农民表现就失去了灵魂和意义；这个矛盾相互依赖，相互统一，从而构成了生动、完整的阿Q。

到了六十年代，中国一位领导人在一本书中说，阿Q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以后，各家之说即刻偃旗息鼓，定于一尊，就连中学教材也采用了“落后农民典型”的这一说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

农民典型论者把阿Q的所谓“革命”吹得天花乱坠……甚至把毛主席农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有关论述，都给阿Q和《阿Q正传》扣上了……

而实际呢？

整个《阿Q正传》中一个革命组织、一个革命人物、一桩革命事件……乃至一点一滴革命行动全都没有！

难怪鲁迅在《阿Q正传》中，用不无轻蔑的口吻指出：“未庄还不能说无关于改革的”，唯一变化，不过是“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而已。这显然是鲁迅对“革命”投机者的无情暴露与有力抨击：辫子的盘而不剪，以示支持“革命”；如“皇帝坐了龙庭”，辫子一放，又依然为臣民。《阿Q正传》所描绘的砸龙牌、抢宣德炉、挂“银桃子”……等等，不过是一幅淋漓尽致、篡夺革命的丑剧！

有人会说：这一章不是连标题都明明写着“革命”二字吗？窃以为是作者有意安设的反语，目的是警醒读者：阿Q掉脑袋的残酷现实，就是所谓的“大团圆”，阿Q的历尽挫折连连失败，就是所谓“优胜纪略”。而“投机者的潜入”，就是所谓的“革命”！

四

所谓“国人的魂灵”又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鲁迅经常提到的“国民性”，是那种种“国民性”形象化的集中表现：

欺弱怕强、欺软怕硬、既凶恶残忍又懦弱卑怯、既自高自大又自轻自贱、既喜欢奉承又逢迎拍马、既圆滑诡辩又笨拙口讷、既正经虚伪又低级下流、既野心贪婪又愚昧短见，既顽固保守又狡猾善变（或曰：既保守又“革命”）、既精神胜利又现实失败……

狭隘、嫉妒、排他性、窝里斗；冷酷、麻木、健忘、幸灾乐祸；面子第一、招牌主义、无特操、听天由命、死不觉悟……

《阿Q正传》不仅写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同时还写了阿Q不准小D“革命”；不仅写赵太爷、假洋鬼子欺侮阿Q，同时也写了阿Q欺侮小尼姑和小D；不仅写阿Q被人杀了头，同时也写了阿Q梦想杀别人的头；不仅写了阿Q临刑前被围观者看热闹的异常恐怖和巨大痛苦，而且更写了阿Q作为围观者欣赏杀革命党的兴高采烈、巨大欢乐……一个阿Q死掉了，一大批“阿Q”还欣然活着；他们既是这欢乐与痛苦的制造者，也是“欢乐”与痛苦的承受者。如果他们不正视这一点，这种愚蠢与凶残、这种示众材料与看客的轮迴就将永远继续下去！……

这怎么会是什么农村“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乃至“农民运动”的反映呢！

这是鲁迅式的深刻抨击“国民”投机；这是完全符合辛亥革命的实际、鲁迅思想的实际与《阿Q正传》原文的实际的。这才是“阿Q之谜”的唯一的真相！

许寿裳先生就曾对阿Q作出



过正确说明，他说：“鲁迅提炼了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阿Q这个典型，他利用阿Q以诅咒旧社会。”抗战时期，周恩来就《阿Q正传》在武汉演出更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以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

三十年代初，斯诺曾问起鲁迅：“‘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正管理着国家哩。’”由此可见，在鲁迅眼里祸国殃民的蒋介石之流，就正是典型的阿Q！（责任编辑：刘文）

郭沫若告诉国人的些什么？ 友谊与归宿

● 冯锡刚



1959年，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李伯钊、夏衍等人在一起

田汉作《谢瑶环》横遭挞伐后，郭沫若情绪沮丧的在自己的弟子面前吐露心声：“像田汉那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以前，我和他亲如兄弟，气质也相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出事之后，就从来没有来找过我……”

三年后，正当文革狂乱，田汉病死秦城监狱；又相隔十载，郭沫若在思想解放的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刻，以86岁高龄辞世，未能等到为田汉平反昭雪的一天。这两位亲如兄弟，气质相近的诗人、戏剧家兼革命斗士，只能在九泉之下重温昔年“相期席与歌”的旧情。

“五四运动后 所产生的新人”

1919年至1920年之交，正在

日本福岗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班求学的郭沫若，进入了诗歌创作的“喷发期”。宗白华主持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大版的篇幅不断发表郭沫若的新诗。宗与也在日本的田汉的通信中介绍了郭沫若。拜读过郭沫若《凤凰涅槃》的田汉早已神往心仪，1920年二月间给郭沫若写了封情意真挚的“订交”信。

在这封长信中，田汉向素无交往的郭沫若倾诉“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之心曲，随函寄赠近照一帧。

郭沫若展读之下，立即以同样的热诚回报：“寿昌：你真可爱……你的面貌同我家里的一个胞弟很相仿佛，只是他不及你这样的俊秀呢！”

过了一个半月，田汉乘车由东京专诚去福岗博多湾拜访郭沫若。时值郭沫若妻安娜刚分娩，郭沫若

正忙得不可开交。面对不速之客，主人喜不自禁。

尽管用以待客的只是“白水煮豆腐，萝卜打清汤”，两位倾心于新文学的学子畅怀纵谈，十分投机。想到田汉在通信中对自己的诗作《独游太宰府》的激赏，郭沫若特邀友人同去实地一游。欣赏着闻名遐迩的梅花，倾诉着出自肺腑的情怀：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自我当中

吐露出清淡的天香，

开放出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青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
本体！

……

这次初晤另有纪念意义的是合影。田汉在38年之后以无限的深情追忆当年的情景：“我们还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与席勒的铜像状，我们当时的确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

1921年六月中旬，在东京郁达夫寓所，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聚会，成立创造社。

二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由提倡革命文学而转入政治斗争，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并由周恩来介绍入党，可谓戎马书生；田汉则以主持南国社而从事文学创作、艺术教育、戏剧活动，可谓文坛健将。到了三十年代前期，两人仿佛换了一个位置。郭沫若于1928年春亡

命日本，为环境所迫，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字和奴隶社会，在三十年代写出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著作；田汉则于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在创作大量剧本的同时，与夏衍、阳翰笙等人卓有成效地占领了国统区诸多艺术阵地，尤其是拍摄了许多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影片，鼓舞了亿万民众。

但这只是外表的不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郭沫若在1932年出版的《金文丛考》一书的扉页题诗明志：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我遇其厄，愧无其文。

爱将金石，自励坚贞。

1935年春，田汉被捕，在狱中吟诗明志：

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

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

娇儿且喜传书字，巨盗何妨共枕头。

目断风云天际恶，手扶铁槛使人愁。

这年秋天，田汉经营救保释，于10月间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并在此后的短短半年间，接连举行了一连串的公演，使一向冷寂的南京剧坛显得分外热闹。对此，进步舆论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主要问题是有无替当局粉饰太平之弊。田汉听到种种议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来表明心迹：“我们的背上虽然背上很重的十字架，我们仍当勇迈地前进，走向牺牲的祭坛。”

“第一次在政治上合作”

卢沟桥的炮火使郭沫若和田汉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俩在睽违十载之后，相逢在大上海的“八·一三”民族再生的喜炮声中。

八月初，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成立，郭沫若为负责人之一，田汉为协会成员，均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抗日救亡宣传之中。

9月19日，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郭沫若与会并发表题为《鲁迅并没有死》的讲演。结合时势，郭沫若强调“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指出“贯彻鲁迅精神”“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方法，也是保卫国族的最好的方法”。田汉则以七律一首言志抒情：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政，亮节堪为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树翁。

在鲁迅生前，郭沫若和田汉都曾与之以笔墨相讥，但大的方向又都是一致的；鲁迅逝世后，郭沫若与田汉又都真诚地纪念鲁迅，推崇和弘扬鲁迅精神。

此后，郭沫若和田汉等人负责组织抗战演剧队和战地服务团，多次率团赴前线进行慰劳宣传和救



郭沫若在北伐途中

卅年以久是就停左东
 像一覽君先示相期希
 今歌平生涯肝胆共
 苦楚跑念为生民立
 延年我表我
 面莊在博多相見時以平為引係相
 以斯思已三十年平彼山為頌能
 力民佑石入念而長渴地不此
 古以廿能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平之和平之佳人也 郭沫若

汉在桂林举行的纪念活动中，“为沫若兄五十寿辰而作”长诗《南山之什》。纪念会上，诗人满怀深情地朗诵出自肺腑的心声：

“没有你，
 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
 没有你，
 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
 没有你，
 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
 没有你，
 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
 将失去紧密联系。
 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
 中国有着你，
 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
 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民族的期待，战友的奋勉，汇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郭沫若久蓄的创作情绪。终于，以1942年创作历史剧《屈原》为喷发口，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高潮期出现了：《虎符》、《高游离》、《南冠草》等历史剧源源而出。这一组历史剧不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而且以其独具的浪漫主义诗意而产生浓郁的艺术魅力。这是与20年前为新诗奠基的《女神》相映生辉的并峙双峰。

“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和田汉于1946年2月上旬相继抵达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他们的记忆中有特殊的感情：二十年代的文坛狂飚，抗战之初的救亡呐喊。这是他们展露艺术才华和显示战士风骨的人生舞台。现在，又面临着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这两种命运的决战。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这是郭沫若对上海的写真。时势的激荡每每

沫若和田汉并肩前行，相知日深。

“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1938年末，郭沫若来到重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较为和谐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前景如同山城的迷雾，令人莫测。1940年春，田汉由桂林抵渝，两位相别经年的战友得在令人窒息的雾重庆畅叙别情。

此时，国民党向三厅下“最后通牒”：不集体加入国民党即作离厅论；在郭沫若率全体人员抵制下，未果，九月即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消三厅；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于极点。国事堪忧，加以家事纷扰，田汉于这年春天重返桂林。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反共声浪甚嚣尘上。为着推进抗战民主进步事业，在党的影响下，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前于该年11月为郭沫若举行50寿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论鲁迅与郭沫若》，赞扬郭沫若是“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祝他永远地前进，要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田

济难民的工作。

第二年，郭沫若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田汉任三厅六处（主管艺术）处长，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上任伊始，郭沫若在阳翰笙、田汉、洪深等人的襄助下，开展了规模盛大的宣传周活动。为欢呼台儿庄大捷，田汉作词、张曙谱曲的《洪波曲》分外引人：

我们战黄河，
 我们战淮河，
 做山湖水今又生洪波，……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首即兴创作的抗战歌曲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之后，张曙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之下，郭沫若写了许多吊诗挽联来纪念他，一再提及此曲：“且听《洪波》一曲，抗战唱连年”、“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等等。后来郭沫若所撰写的抗战回忆录，也取名为《洪波曲》。

十月下旬，武汉沦陷。郭沫若率三厅工作人员历经长沙大火、衡阳流离、桂林轰炸。几十天颠沛流离、出生入死，郭沫若始终与三厅成员同甘共苦。田汉感慨系之地说：“沫若表现得真不愧是一个果毅而亲切的领导者。”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郭

使这位历史剧创作的高手生发激情。在重庆时期即已着手研究的王安石这个历史人物重又在他的心头浮现,一个以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为三种不同类型的文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历史剧构想开始酝酿。他命之为《三人行》,用以表现千年前的那幕改革与保守反复较量而终致失败的民族悲剧,歌颂以王安石集中体现的“人民本位”的历史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创作计划终究未能付诸实施。

不无巧合的是,田汉以《丽人行》发出了时代的呼声,作品的主角是三个不同类型的现代女性,适与《三人行》形成有趣的对照。据作者称,这部20场大型话剧创作契机得之于现实斗争的刺激。这期间有几件事使作者十分激动:北平的“沈崇案”、上海的“摊贩案”,美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成为一种催化剂,于是以沛然而下的激情,写出了这部不但在作者创作生涯中,而且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留下印记的杰作。《丽人行》的时代背景虽规定为抗战末期的上海,但观众一望而知是对现实的鞭笞,故1947年二月在无锡首演之后,效果极佳,三月剧团赴沪公演,更是引起轰动。

就在上海公演的前夕,3月13日,进步文化界为田汉50寿辰暨创作生活三十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会。

作为近30年的知交和同一阵营中的战友,郭沫若更是热情洋溢,写出诸多情意真挚的诗文。3月11日作散文《先驱者田汉》,以言简意赅的笔触勾勒出田汉的人格画像,由衷地称颂“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3月14日,正是田汉的寿辰,郭沫若以诗人的情怀赋五律一首为祝:

卅年如手足,献纳在东侯。
一党君先我,相期席与歌。
平生沥肝胆,世事苦蹉跎。
命为生民在,还当战养和。

诗后有一段饶有意味的跋文:“寿昌今年五十,余已五十有六矣,回忆在(日本)博多相见时曾以席勒歌德相似,忽忽已三十年,幸彼此尚硕健,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灯下成此,书以共勉。”

“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这正显示出两位诗人戏剧家兼民主斗士的风骨。时逢《丽人行》公演,作者题写过一首感情激越而传诵一时的五言绝句:

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这年11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民盟非法”。在党的安排下,郭沫若赴香港,田汉返长沙。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战略决战的前夜,郭沫若和田汉奉召相继北上解放区。待得他们相会在北京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曙光行将照亮长夜难明的神州大地了。

“新华颂”与 “为民请命”

开国前夕,1949年7月,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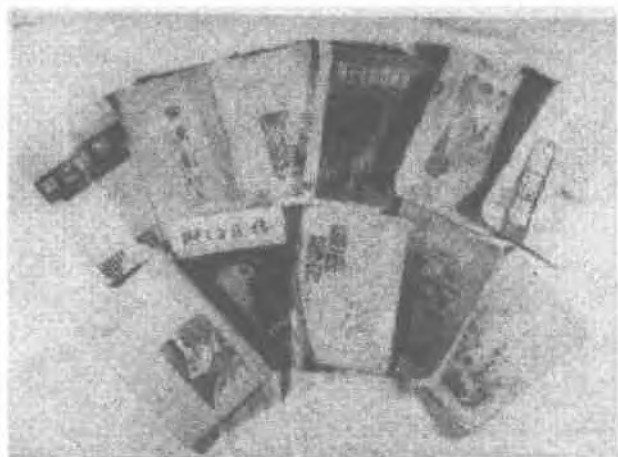
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以其崇高的声望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后来,田汉也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开国之际,有一件不无意味的事,似乎成为日后郭沫若与田汉在历史新时期不同作派和遭际的征兆,那便是国歌词的选择。

1949年9月,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任的郭沫若,写了一首题为《新华颂》的应征国歌歌词,发表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歌词共三段,今录“其三”:

人民专政,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领袖雍容。
江河洋海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民族,如弟兄,
千秋万岁颂东风。

《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郭沫若也认同这样的批评,他自责道:“……是老掉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尽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后来他的创作实践就美学追求来看,似乎未能脱出《新华颂》的窠臼。

有人提议以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曲谱。郭沫若为



田汉部分著作

此还填了一首词，但没有为大家接受。后来有人提出干脆仍以田汉的原词为好。这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周恩来则以赞赏的口吻表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警策自励嘛。

建国以后的9年间，这两位诗歌创作的捷才，在剧本创作上几乎都是空白（田汉有几部改编的戏曲作品），究其原委，除却各自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这个原因之外，文艺界频仍的批判运动也不无影响，举凡《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冯雪峰丁玲批判等等，几乎是接踵而来。这当中与郭沫若和田汉相涉的各有一次。1951年2月下旬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到半个月，郭沫若于六月初，在《人民日报》发表《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时隔二个月，郭沫若在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之后，撰文“重新再检讨一次”。虽然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郭沫若不乏自我否定，但武训批判却是带有政治色彩，这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来说，影响是深刻的。田汉则在1957年的反

右派运动险遭不测，起因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的两篇触及时弊的文章。这年春季，田汉以人大代表资格去广西、湖南、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视察，了解到一些艺人在生活方面有诸多困难，有些演员长期无戏可演而浪费青春。田汉向来刚直而有侠气，在闻知这些状况之后愤慨不平，在有关的座谈会上，当众重申国家的有关条例，并以自己的千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补贴确有困难的一部分老艺人。回京之后，即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文，分别刊登在戏剧家协会主编的机关刊物《戏剧报》当年第7期和第11期上。这两篇文章在戏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和知识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因为它触及时弊，揭露“阴暗面”而又出自全国剧协主席之手。请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一文中的一节：

浪费了国家的一寸丝、一尺布、一口铁钉、一块木头，我们还知道计较，浪费了广大演员的宝贵的、不可再来的青春我们却十分大方，气也不叹，心也不动。

这两篇文章几乎给作者带来厄运。钟惦蓰以《电影的锣鼓》（仿佛是田文的姊妹篇）而获罪，后来被打成右派；丁玲则因南京狱中的一段经历而导致1955年“反党集团”的冤案，并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中遭“再批判”。田汉的处境真是危乎殆哉，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双料”呵。也许是田汉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夏间谨言慎行，但更主要的是得到高层领导人的保护（周恩来在一些场合公开称赞田汉善于同社会各界的三教九流打交道而不失原则立场）。总之，田汉算是捱过了这一难关。

现在看来，田汉对戏剧界的“右派”（如吴祖光等）的批判更多地带有表明心迹的意味。当然，这种举止终究是人格的扭曲。郭沫若已经很少再有“为民请命”的表示（一半是崇拜，一半是谨慎——他与陈明远的通信、言谈往往有对现实的较为清醒的评判）。田汉则还要在适当的气候下顽强地表现自己，后来的创作就是一个明证。

《蝶双飞》与《重睹芳华》

1958年是一个热烘烘的年头，“大跃进”的浪潮汹涌而来。“赶英超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神州六亿正以极大的热诚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干着南辕北辙的事情。反右之后已经很少再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三月中旬，郭沫若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上讲话，强调：“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大跃进的目标。”于是“写中心”成为文艺界同行一时的准则。郭沫若和田汉都赶写出了歌颂“大跃进”的作品。郭沫若以诗集《百花齐放》为之鼓吹，田汉则以话剧



田汉和梅兰芳、熊佛西、周信芳



1960年7月，郭沫若在主持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为之讴歌。《百花齐放》有若干首作于1956年，推想起来恐怕是受到毛泽东主席于同年五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启示和鼓舞而产生的创作契机，但当时因“所熟悉的花不多”而未能写成“百花齐放”，二年之后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之下，仅仅以1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计101首的诗集。作者后来承认：“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我是深以为憾”。撇开作品的立意，仅以形式而言，“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所以，诗人深叹：“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一部分幕话剧，上演过，稍后还改编并拍摄成电影。一望剧名而知，这是以修筑十三陵水库为题材的作品，歌颂

“大跃进”，“畅想”共产主义的到来。

如果一直是这样“写中心”，田汉也就不成其为田汉了，这年三月，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田汉勉力写出了9场（后来扩展为12场）大型话剧《关汉卿》。诚如众多评论者所指出的，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瑰宝，是田汉创作生涯的高峰。

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再现了关汉卿这位现实主义戏剧大师的战斗风骨，歌颂了下层民众敢于反抗，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鞭挞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腐朽。全剧洋溢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融一体的艺术情味。压轴的一阙《蝶双飞》更是感人至深，“可以跟历来脍炙人口的好曲子并驾齐驱”（叶圣陶语）。田汉对此曲亦颇自得，屡以其中的前半段书奉友人：

将碧血，写忠烈。
作厉鬼，除逆贼。”

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
长与英雄共魂魄。
强似佳人绣户描花叶，
学士锦袍趋殿阁。
浪子朱窗弄风月。
虽留得绮词丽句满江湖，
怎及得傲干奇枝斗霜雪？

郭沫若对《关汉卿》有很高的评价，称赞这“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五月初，他在读到田汉寄去的征求意见稿后，灯下挥笔，写了一封充满由衷情意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勉励：“你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你使关汉卿活得更有意义了。”

二月初，郭沫若在广州以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五幕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曾流着泪对曹禺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他在剧本出版单行本时所写的“序”中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些话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作品和作者心境的钥匙。作



田 汉

者有过亡命日本十年之久的坎坷经历……郭沫若对毛泽东确实怀有知遇之情。因此，作品借“文姬归汉”的史实，着重歌颂曹操的文治武功就不难理解了。郭沫若通过蔡文姬这个古人，吹嘘进了现代人（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气息，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知遇之情。歌颂革命领袖，只要无悖历史唯物主义，当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历史剧毕竟多少要受到史实的规范。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作者将曹操塑造成“一个人民的领袖，说他是‘太阳’，是‘天下人的再生父母’”是不恰当的。还有人指出，作品中对东汉末年蔡文姬归汉时经长安到邺下（曹操所在地）一路所见的“太平景象”的描写有背于史实。田汉为《蔡文姬》的修改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才华。郭沫若在一封信中以感激的心情提及此事：“我到底是有十多年不写历史剧了，初稿很不成样子；多亏了寿昌他们大力帮助我修改，特别是后半部。结尾的《重睹芳华》则完全出于寿昌的大手笔。”

盛唐气象”与“载舟覆舟”

继《关汉卿》和《蔡文姬》问

世并引起重大反响之后，两位诗人戏剧家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在此后的几年间各自又连续创作了几部历史剧：郭沫若有《武则天》（1960）和《郑成功》（1962，电影文学剧本，分为上下两集），田汉则有《文成公主》（1960）、《谢瑶环》（1961，京剧剧本）等。其中最能显示两位诗人戏剧家深厚情谊和不同风格的，当数《武则天》与《谢瑶环》。

《武则天》剧作以武则天“最成熟的时代”即60岁前后的6年，平息徐敬业策动的叛乱作为主干，塑造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女政治家形象，从而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翻案。

与《蔡文姬》一样，作品发表后也引起热烈反响，有不小的争议，郭沫若照例将作品寄送田汉等友人提意见，并还让周恩来和陈毅抽空审阅。田汉读了作品，很坦率地向作者表示：对于武则天敷粉过多了。

郭沫若对田汉的“敷粉过多”的批评不以为然（后来在昆明观看此剧后曾写过“翻案何妨敷粉多”的诗句，正是对这类批评的一个回

答），其相当自信的一个理由是：“我是着重写了武则天的中年时代，即她一生中最光彩的一段”。在六十年代初这个天灾人祸交加的岁月，郭沫若的“续篇”之说触动了田汉，他向郭沫若表示：既然你为《武则天》写了续集，若有可能，我再写出武则天的后期悲剧，对她晚年的过失提出批评。

1961年下半年，田汉以陕西碗碗腔《女巡按》为本，改编成京剧《谢瑶环》。这个改编本不是剧种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种再创作。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评价，由原作的“骂”而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作一定批评”；其次，原作是一个喜剧的结尾（谢瑶环受权奸迫害，后与她所爱之江湖义士结合而隐入太湖），田汉改为悲剧结局（谢瑶环被权奸迫害致死）。田汉认为“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作者的意图在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一方面体现武则天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批评她统治后期的一些过失。

在文革风暴降临之前，《谢瑶环》被首先用来开刀祭旗。完全了解田汉创作《武则天》三部曲“之三”的郭沫若，发出“像田汉那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的哀叹，真是让人怵目惊心。“性格即命运”。郭沫若和田汉在后来的那场空前浩劫中，处境和结局终究有很大不同，其中虽有诸多复杂因素，但这种“表现盛唐气象”与告诫“载舟覆舟”（《谢瑶环》中有“载舟之水也覆舟”的唱词）的异趣，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精忠柏”和“泰山种”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二年，是文艺界相对宽松的短暂时光，田汉等不少文艺工作者较有锋芒的作品

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为着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左”倾，处在中央一线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文艺而言，周恩来1961年6月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陈毅同年3月在紫光阁戏曲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批评了违反艺术规律，践踏艺术民主的错误倾向。到了1962年，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的鼓舞下，由田汉和阳翰笙主持，这年三月间在广州召开了影响很大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出于对“左”倾路线的深恶痛绝，田汉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从北京到各省市都传达了‘文艺十条’，许多同志出了气，吐了苦水，但气可能还没有出够，苦水还没有吐完。在这次座谈会上可以一吐为快。”陈毅应邀到会发表长篇讲演，痛快淋漓地批判了许多“左”的东西，与会者精神大为振奋。

“广州会议”召开之际，郭沫若也在南国花城，《羊城晚报》记者整理发表的《郭老谈诗》中，颇能见出这位文坛泰斗谨言慎行的心态。

宽松的好时光真如昙花一现。1962年9月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浪中，“左”倾思潮以更为急剧的势头汹涌而来。田汉首当其冲。

1963年9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艺界，其中特别提到戏剧界。到了这年11月，毛泽东更进一步抨击：《戏剧报》（田汉主持的全国剧协机关刊物）尽是牛鬼蛇神，《戏剧报》宣传牛鬼蛇神。这等于是点名点名，田汉蒙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紧接着，12月12日，毛泽东在反映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了一个措词尖刻的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文艺）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抨击“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得到毛泽东批示的鼓舞，柯庆施按预定计划加紧筹备，终于在这年12月25日拉开了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的帷幕。

田汉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身分，迢迢千里从北京来到上海与会。刚刚取陈其五而代之的张春桥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之职，严密控制整个观摩演出的会务，自然不会淡忘一年前田汉在广州会议上点名批评的旧恨（上海第一书记在广州会议结束后，严厉制止上海与会代表向上海文艺界传达会议精神）。在张春桥的直接控制下，会务安排居然既不让上海有关部门去迎接田汉，更有甚者竟不让这位全国剧协主席上主席台。

田汉自然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海的权贵。观摩期间，田汉有感而发，写了一首题为《江南——中国革命戏剧的摇篮》长诗，其中特别歌颂了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功绩。送去刊登时，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说是一定要涉及三十年代的部分尽行删除才能发表。尽管处境难堪，田汉还是

毫不退让地表示：“要改，你们去改，我是不改！这首诗可以抽回不登”。对于柯庆施于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田汉颇不以为然，认为它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这样恶劣的氛围中，出于关切，与会友人提议田汉提前回京。田汉权衡再三，接受了友人的好意。返京途经苏州因事小住，田汉在司徒庙观赏著名的清、奇、古、怪四棵古柏，感而赋诗，托物明志：

裂断腰身剩薄皮，
新枝依旧翠云重。
司徒庙里精忠柏，
暴雨狂风总不移。

“暴雨狂风”正一阵紧似一阵地袭来。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田汉已被康生、江青之流视为异己，处境相当困难。大会开幕当天，几位演员去看望田汉。他满腹委屈地对不知内情的来客说：“我也要参加大会，我是发起人之一，你们了解我，我是一向支持现代戏的啊！”郭沫若以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文联主席的身分参加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坐。这个会，原本是田汉施展英才的人生舞台呵，然而却与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戏剧的奠基者



关汉卿剧照

无缘。

大会期间，毛泽东于6月27日在一份关于文艺界整风的报告上作了措词严峻的批示，断言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发出令人震惊的政治警告：“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一来火药味就更浓烈了。大会后期，康生在讲话中大开杀戒，点了许多作家和作品以大加挞伐。这位靠整人起家的“理论家”将包括《谢瑶环》在内的不少作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居心险恶地由现实追溯历史，鼓蛊人心地倒腾出田汉1935年被捕入狱的那段历史，诬陷田汉“自首变节”。在主席台就坐的郭沫若真是如芒在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走向牺牲的祭坛”，挚友当年写下的表明心迹的誓词，30年后不幸而言中。从此，田汉便从公众场合消失了，报刊也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字。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革”的狂风降临之前两年便结束了。饶有意味的是，他在世时，在报刊上最后发表的作品，是同年6月下旬刊载在《羊城晚报》上的《唱马师曾》，中有“乘风破浪豪情在，忍向芦沟送汉卿”的绝唱。这是巧妙的双关语，既是对当年扮演关汉卿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高度赞赏，也是身处逆境的自励。

这样一位献身于我国现代革命戏剧事业的杰出战士蒙受不白之冤，倏忽之间从文坛上消失了。郭沫若的处境毕竟要好得多。这年春节，毛泽东点名要他参加由诸多党政要员和民主人士与会的教育座谈会，并与之亲切交谈；春夏间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8篇阐释毛泽东诗词的大块文章；就在田汉大遭厄运的7月间，他率代表团出

访越南，并有不少出访诗抄得在《人民日报》发表。

田汉是首先拿来开刀祭旗的。在“两个批示”的威慑下，文化界又进入多事之秋：杨献珍的哲学、夏衍的电影、邵荃麟的文艺理论相继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郭沫若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尽管实际地位逼近民主人士，但毕间是中共党员，不能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好在有毛泽东的关怀（1965年夏间亲自提议郭沫若作井冈山之行，接着又两次写信给郭沫若夫妇，言词亲切，“敬颂安吉”），郭沫若国务活动照样参与，诗文依然发表。郭沫若的心头总是悒郁难消，然而对于大政方针须以虔诚的拥戴来表示。这年11月，74岁高龄的郭沫若冒着朔方严寒，赴山西参观“社教”，并且还象征性地下农田地与社员一起摘棉花。1966年元旦，《光明日报》套红刊出此行所作组诗《大寨行》18首，讴歌“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1966年的早春二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转载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位著名评论家撰写的《评〈谢瑶环〉》，将田汉的这部作品与孟超的《李慧娘》、吴晗的《海瑞罢官》并列为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面教员”。如果说1964年七月康生的讲话只在内部传达的话（此后周扬等还一再强调对田汉等人“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而竭力加以保护），那末在毛泽东认定“《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从而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动乱的序幕，田汉是心如死灰了。几乎是与此同时，戚本禹等在《红旗》上抛出《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翦的不少史学观点其实也就是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作为文坛泰斗和史界班头，这回正面临着双重的政治压

力。在惶恐不安之下，郭沫若以书面形式向中国科学院党委提出辞呈。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近年来总是觉着疲倦”，想“告老还乡”，“晚年只想找个小小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些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其忧谗畏讥之心境可见一斑。田汉和翦伯赞是郭沫若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相知最深、情意最笃的挚友，如今都在挨整，“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又谈何容易。

毛泽东决意保护郭沫若。4月下旬，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郭沫若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例行会议上的发言。郭沫若在这篇发言中大作检讨，而且情词恳切，通篇贯穿对“文化革命”的竭诚拥戴，对“毛主席思想”的紧跟。这与其说是要郭沫若难堪，不如说是为他解脱。田汉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历尽磨难之后瘐死狱中，11年之后获平反昭雪，骨灰盒中竟无骨灰，以至于开追悼会时只得放一枝笔和一本《关汉卿》。也是1968年，郭沫若的爱子郭庶英被迫害致死，白发人葬黑发人，心中痛楚无以言表。郭沫若后来在“批林批孔”历经坎坷，但一直得到毛泽东的明令保护。1978年六月以86岁高龄去世，备极哀荣，其时复出不久的周扬尊之为“泰山之神”。

田汉和郭沫若在早年分别以席勒与歌德期许。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田汉仍对席勒表示敬重，而郭沫若则对世人称之为“中国的歌德”表示反感。这种差异是颇堪玩味的。

“卅年如手足，相期席与歌。”郭沫若和田汉的情谊及其人生历程正可视作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缩影，人们将从中品味出一些有意味的东西来。（责任编辑：杜晋）

瓦尔德事件

——中美关系首次对抗

● 奎 松

一

1948年11月1日拂晓时分，沈阳城响起了枪声。接着，整个城市乱成了一团，到处都可以看见成群的国民党兵在逃命。

在最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沈阳城里几乎从早到晚都处于一种惊恐不安的状态中。长春被围，锦州失陷，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中心城市沈阳，已经成为中共军队的囊中之物。

位于五纬路与三经路拐角处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大门一早就紧闭着。住在二楼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也只是偶尔临窗望望外面的动静。

“中共！”身高马大的麦克林斯特上尉，站在二楼楼梯转弯处的窗口前猛然喊起来。瓦尔德探头向外一看，果然，至少有一个排身着浅黄色军装的中共士兵，正警惕地端着枪，沿着街道两侧的墙根搜索前进。既没有开枪，也没有破门而入。

瓦尔德松了一口气。

美国政府自从抗战结束以来，

花了差不多20亿美元来支持蒋介石对付中共。中共对美国政府的痛恨不亚于对蒋介石。即使如此，美国国务院仍然考虑，一旦东北落入中共之手，应当把沈阳总领事馆当作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一种尝试。

瓦尔德虽觉得这是一次冒险，但一想到自己将成为第一个直接同中共政权打交道的美国外交官，从心眼儿里又感到兴奋。

瓦尔德感到更为宽慰的是，傍晚时他收到美国代理国务卿的来电，正式批准他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商业的利益，设法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

二

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从11月2日起开始在大和旅馆办公。军管会主任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成员陈云，副主任是伍修权和陶铸。伍修权兼沈阳卫戍区司令，陶铸兼卫戍区政委。同时，任命朱其文为中共第一任沈阳市市

长。

11月3日，留在沈阳的美、英、法等三国领事，与苏联商务代办得到了朱其文就任沈阳市长的就职通知。这使得瓦尔德异常兴奋，他很快就起草一封贺信，派参赞助理罗卡格送往市政府，信中“期望并确信能与先生建立亲密关系。”

第二天，瓦尔德就得到了朱其文市长的复函，邀请他及英、法两国总领事与苏联商务代办，于第二天下午2点30分前往市长办公室晤面。这使得瓦尔德激动不已。

在接见的头一天，陈云在军管会例会上强调，与外国人的晤面必须十分慎重，对方提问要一问三不知。接见时，年轻的朱市长确实做到了陈云的叮嘱，他只是面带笑容，介绍新政府保护外国人的一些必要措施，这包括发放证件、机动车通行证和标志旗，以及派兵守卫各领事馆和重要的外国人住宅等。瓦尔德对派兵把守领事馆颇有异议，但他无法说服朱市长改变这一决定。最让瓦尔德失望的是，朱市长会晤结束时，意外地邀请苏联商务代办留下来单独晤谈。他彻夜

构想的机会，竟给俄国人取代了。随后他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不无妒忌地声称：我不明白，几个月来始终只是步行的这位商务代办，怎么会有一辆崭新的吉普车。

三天后，朱市长竟自作主张，在林莉、周砚两个翻译的陪同下，先后前往法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进行回访。在美国领事馆内，朱市长还特地参观了由美国新闻处创办的图书室。几天来，情绪沮丧的瓦尔德为之一振，他详细地向朱市长展示那些工业及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试图引起朱市长对利用美国的技术来重建东北的兴趣。瓦尔德提出，美国对中国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只是希望能够在商业和技术方面重新回到东北来。朱市长当场表示：美国人是受欢迎的，他很愿意看到美国商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在东北的贸易活动。朱市长的表态，使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如同聆听福音，他趁机提出的是否与美国通信等问题，朱市长也很痛快地答复说：只要美国的船只能够达到大连港，就可以将信寄到解放区。

朱其文可爱的超前外交意识，如若在今天，会被推举为十佳市长的，可那时敌我阵线分明，他苦心孤诣的作为，只能被视为胆大妄为。

瓦尔德也不会想到，朱市长的这次回访成了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陈云就得知了朱其文对美国总领事的谈话内容。他当即把这位年轻的市长叫到办公室来，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关于外交工作已经再三重申过了，务必小心谨慎，一问三不知，你怎么随便乱说！”“美、英、法三国领事留在沈阳的目的，主要是试探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你不想一想，你的答



复不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吗？”

朱其文额头冒汗了：“我本来只是想向他们证明在我党的领导下，市政恢复如何迅速……”

“太幼稚！”坐在一旁的陶铸也严肃地批评说，“美、英、法外交人员都是些职业帝国主义分子，对他们决不能像对待一般人的态度一样。一个负责干部，连这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

次日，陈云、伍修权和陶铸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就此事向中央进行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

三

毛泽东在西柏坡读着电报，走到院子中央的磨盘旁站下，声色俱厉地说：“这个朱其文，完全丧失立场嘛！他们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接过话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军事管制的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呆不下去了。”

毛泽东点点头：“不承认他们的领事地位，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

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来起草一个电报吧！”

当晚，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从西柏坡发出。电报明确提出：……我们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达到封锁和孤立他们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电报特别提醒东北局和沈阳军管会：凡外事上的问题，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方针行事。

11月11日下午3时，陈云通过电话向正在前线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彪商量东北军区迁到沈阳之后的各项事宜，当谈到美、英、法等领事馆问题时，林彪首先关心的是，这些领事馆有没有电台，如果有，一定要缴下来。

15日上午10时，军管会一位参谋军官乘车来到美国总领事馆，向瓦尔德递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要求美国领事馆在36小时内将电台全部送交军管会。

瓦尔德当天致函沈阳军管会陈云主任称：

……该项电台之存在及使用，系由中国国民政府承认与批准者。

……而敝总领事馆之存在则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故希望贵会即予批准此项电台及使用为盼。

瓦尔德和朱市长的“亲切”交往，使他深信，共产党需要美国总领事馆继续存在下去，只要做一点说明，他们就会，“采取一种合作与友好的态度”。

18日下午3时，瓦尔德在副领事哈巴特的陪同下，来到大和旅馆一楼军管会的会客室。一位中等身材，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军人出面接待了他们。他就是军管会副主任兼卫戍区司令伍修权。

伍修权当即告诉瓦尔德：“我们也接到了先生的信件，在军事管制期间，恐怕没有转圜的余地。不论先生的电台有何重要作用，在军事管制期间，一律不得使用。当然，先生所有收发报机及其零件，本会将妥为保管的。望先生能够遵行。”

瓦尔德声称：“我们认为这样做会有损于本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伍修权回答说：“继续使用你们的电台将是违抗军管会命令的行为，我相信先生能够了解它的严重性。至于先生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我想重要电报可用明码电报，转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发出。”

瓦尔德没想到，事情竟如此不妙。他把手一摊，说：“请您了解，电台是美国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我们是无权交出的。既然电台禁止使用，那么，是否可以由军管会派人就地查封，等我们向国务院通报之后，获得批准后再做处理？”

“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电台必须交出。”伍修权斩钉截铁地说。

双方为此争执甚久。最后，伍

修权站起身来，说：“既然先生等不肯自动交出，那么我们只好派人到领事馆去取了。”

瓦尔德一脸不高兴地站起来，态度傲慢地说：“那是你们的事情。”

“那么，十七点我们会派人去取！”

四

瓦尔德回到领事馆，距离军管会来收取电台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0分钟了。他急忙来到收发报室，向报务员张仲英匆匆口述发给司徒雷登大使的电报：

大使。沈阳电台现在关闭，将不再开通，它正在被没收过程之中。尽快通知国务院。瓦尔德。

电报发出之后，瓦尔德与哈巴特叫来的无线电技师希克尼、报务员蒋正侠和张仲英一起，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将2台台式发报机，9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大批真空管及其他无线电零件集中起来，统统搬到领事馆的前厅里，等着军管会的卡车和士兵按照规定的时间前来收取。

但是，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门外并没有出现军管会的卡车和士兵。

为什么沈阳军管会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收取电台呢？

这时，在大和旅馆门口早已准备好了卡车和一个排的士兵，负责执行任务的参谋人员早等得不耐烦了。在陈云的办公室里，伍修权、陶铸等四位领导人一直在要不要立即派人去领事馆收取电台争论着。长时间没有吭声的陈云从椅子上站起来，终于走到电话机旁，说：“我看还是请林总直接给中央发电催一催，今天不去取了。”说完，他拿起电话机，一边拨号，一边向伍



陈云

修权挥挥手说：“叫他们撤回去吧！”

原来，军管会在发出第四号通令，决定限期收取电台之前，没有特别考虑到外交问题。待美国总领事来函说明该馆拥有电台，但不同意交出，方才意识到此事涉及到外交，掌握政策界限较为复杂，于是致电东北局并中共中央说明情况，致使36个小时期限未能执行。

晚7点半，林彪根据电话商量的结果，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此事。

毛泽东看过林彪的电报后厉声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领事馆强取罢了。怕它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屁事。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有权禁止他们的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

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实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保管封存，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进入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19日上午，苏联商务代办专门上门来找到伍修权，他不仅要求尽快没收美、英、法领事馆的电台，而且强调应设法赶他们走，因此他建议我们不仅要禁止他们自由出入，还可以切断他们的电灯、电话……要他们失去呆下去的条件。

20日上午11时半，两辆急驶而来的军用卡车，停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大门口，大批士兵从车篷里先后跳了下来，沿着领事馆两边的街道迅速排开。

门开了，两名军官踏上台阶，站在楼门口，一位军官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纸在他们面前展开，开始大声宣读：“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这是你们故意违抗军管会命令的必然结果。”

瓦尔德觉得头皮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两只眼睛直冒火。此时此刻，他只能做出顺从的样子，带着两位军官来到收发报室和译电室，清点已经整理好的电台和其他相关的零件。最后，军官拿出几张写着字的纸，一张一张地填写，然后由翻译一一交给他签字。

领事馆的大门被从外面关上了，代替过去市政府派来站岗的警察的，是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一

名佩戴手枪的军官。

这位曾经在苏联干过12年，又在伊朗干过8年，从未栽过跟头的外交官，如今，自己的外交生涯是不是到此结束了？

五

美国政府明知沈阳的电台被没收，沈阳领事馆的人员被软禁，不论是司徒雷登大使，还是美国国务院的负责官员，都没有打算要将瓦尔德等人迅速撤出来。美国政府还是希望瓦尔德能够在沈阳坚持下去。

事实上，如不是苏联人坚持把中国的东北看成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美国政府早就在东北插上一脚了。1946年，当美国外交官随着国民党军队来到沈阳，建立起他们在东北的第一个总领事馆之后，他们就极力在东北扩展自己的影响。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进一步向北延伸，那仅仅是因为苏联坚决反对美国在哈尔滨等城市设立领事馆，而长春等大城市又长期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国东北在它对苏联关系中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在1947年美苏在欧洲进入冷战状态之后，它就对东北的地位更加看重，必欲在东北保持自己的影响。

苏联人极力主张中共将美国人赶出东北，这种情绪也同样影响到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当如此多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被送到大和旅馆的大厅里时，在场的伍修权、陶铸等人也禁不住大吃一惊。高岗说：“我看这个领事馆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务窝子！”常委们也几乎一致认为，美国领事馆确有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嫌疑。

东北局领导人的怀疑几乎当天就得到了足够的证明。

21日下午3时，东北局社会部抓获了潜伏的特务伯彦苍，在伯的住处起出与美国领事馆同样型号的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台。当晚又抓获另一特务分子吴人俊，起获同样的电台两部。经过连夜审讯，又捕获佐佐木等人，再起获两部同样的电台。这些雇用者，都是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做掩护的。

毛泽东这些天曾做出过如下的考虑：既然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要同美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共中央当然也不赞同将美国人赶出中国大陆的任何意图。在东北之所以要采取挤走的方针，是因为要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利益，但这并不等于它准备在关内其他地区也这样做。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毛泽东的积极设想被24日东北局发来的关于抓获美国间谍的报告给打断了。

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乎意料的。

毛泽东读过电报之后，愤愤地说：“看样子美国的阴谋还不小呢！这些帝国主义，狗改不了吃屎。”

显然，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这下变得更充分了。毛泽东还特别告诉起草电报的周恩来：“不光是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是这些国家的记者也要小心。应该还要加上一条：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但其目的是要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抗衡共产党。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不禁勃

然大怒，拍案道：“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这种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鉴于淮海战役顺利进行，改编成第四野战军的东北解放军，已经完成对平津塘沽地区敌军主力的切割包围，沈阳敌特活动已经不足以威胁自己的军事进程，在毛泽东的正式批准下，周恩来明确指示东北局恢复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之间的往来，并于圣诞节当天恢复了对领事馆等三处的供电。

瓦尔德终于收到来自美国国务院关于准备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电报副本，沈阳军管会也明确同意瓦尔德等人迅速开始撤离沈阳的准备工作。瓦尔德半年多来第一次脸上出现了笑容模样。在他看来，一场恶梦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瓦尔德又一次估计错误。

1949年6月上旬，已经进驻北平西山的毛泽东接连收到华东局及南京市委接连报来的司徒雷登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很快告诉周恩来：“既然美国政府已经在5月31日公开宣布了其在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事情，司徒雷登之流又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一个消息，让人民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6月1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

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

6月30日，毛泽东在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同时，还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瓦尔德等一千人进行公开审判。

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其在中国的失败寻找借口，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公开警告国内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倒向另一边；要求全党根除一切对美国的幻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共产党的这一历史性胜利使亿万普通的中国人挺起了腰杆儿。于是，包括在沈阳美国领事馆内被颐指气使惯了的中国雇员，也开始敢于顶撞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了。此时，由于撤离工作被勒令停止，又被指责涉嫌间谍活动，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瓦尔德，同中国雇员姬玉衡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将其解雇。而当姬玉衡再度理直气壮前来要求付给他当月的薪水时，双方发生言语冲突，瓦尔德盛怒之下，竟挥拳打人，并将姬玉衡踢下楼梯致伤。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当即指示东北局将瓦尔德等涉嫌间谍又殴打中国雇员的5个美国领事馆人员一律拘捕，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上，毛泽东明确批示：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对于瓦尔德来说，最倒霉的时刻来到了。

这是10月24日下午3时。大约5辆军用吉普车停在沈阳美国领事馆的门前，数十名士兵在三位军官的率领下，进入领事馆，当众宣布了对瓦尔德等人的逮捕令。在数以千计的围观群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面色苍白的瓦尔德被押上了“囚车”，送进了监狱。

11月1日，这个一年前曾经是充满了梦想的外交官，却站在了中国法庭的被告席上。听着公诉人和一个个证人的指控。瓦尔德禁不住懊悔万分。但现在看来，他当初决定留下来完全是一场灾难。这一决定，不仅毁了他的前途，而且也使美国人丢尽了面子。他深知，这一事件对于二战以来在世界上已居于头号强国的美国政府来说，可谓羞辱极深。以致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不惜提议派飞机和武装突击队突袭沈阳，劫回被捕的总领事，以挽回政府的面子。好在美国军方领导人还比较清醒，知道要在沈阳这样一座大城市里进行这种突袭，不仅救不了瓦尔德等人，反而会陷入中国地面战争的泥潭。

恶梦很快结束了。11月下旬，瓦尔德等人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并被宣布驱逐出境。

12月11日，瓦尔德忐忑不安地在武装人员的押送下，登上了南行的火车。这场恶梦对于瓦尔德个人来说，确实很长，但他哪里知道，这场恶梦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要继续20多年呢！

（责任编辑：仲文）

说真话难还是应该

说

真

话

● 杜导正

1958年，我国的三面红旗处处轰轰烈烈，我作为新华社驻广东省首席记者，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公共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登在第一版。大炼钢铁，我也高兴过。当时头脑又热又简单，我跟着省委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机关小院子里高炉炼出的那东西，我们随手拿起一块敲敲，当当响的便误以为是钢。秋后农业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到荒唐程度，我照样热情报道。粤北连县有个星子公社，说一亩高产了2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毕业的周方旸写了稿子给我，他说这24000斤是32亩水稻并在一亩地里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稿子可以发，但要说明这数字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广东省委书记张根生审。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内的这几行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我以为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

1959年初，广东省到处叫缺粮，水肿。广东省委还是没有多少警惕，直到广州市只能供应七天的口粮

了，省委才着了急。陶铸是省委第一书记，他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那时有人说，1958年农业放那么多“卫星”，粮食多得堆成山，怎么转眼间便没粮了，不可能，准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照省委的部署，搞了一个反瞒产运动。我和《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到东莞去看，介绍的人说，村外哪个草垛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粮食，说得很真切，也的确搜出一点粮食。后来才知道，这是干部事先藏在那里，专门做给反瞒产的领导看的。省委在东莞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写了详细新闻给北京，说广东省反瞒产如何成功。

我的头脑真正冷下来，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4月份。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看，我陪他俩去了。到了海南岛，我目睹村庄里众多农民患水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上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等县农民啃树叶子和一种叫黄狗头的块根植物，不少人外出讨饭。我以为可能出了问题，便派了两个记者去从化等县调查。我作为新华社分社社长，给他们定的任务是，放警报，想办法，协助党委领导人民度过困难。当时曾有人提醒我说，老杜，你是否神经过敏，将农村问题看重了？此次跑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普遍

饥饿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岛回来，我又听到许多类似的情况，便在4月19日晚上，给新华社总社一位副社长写了一封信，反映广东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在“三面红旗”上看来犯有错误。

那天夜里，广州气候闷热难当，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多字。写完信，衣服被汗水浸透了。

写完这封信，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专文，在《新闻业务》刊物上发表。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部署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议，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见到省委秘书长张根生，他面带愁云，悄悄跟我说：“不好了，庐山会议传来消息，全党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我心一怔，心里说坏事来了，我马上想到4月19日写给新华社总社那位副社长的长信。

果然，两个月后，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那位副社长，那位副社长便将我4月的信给他看了。他便给广东省委写信，建议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动态》点了我们9个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的名。接着对我的批判开始了。前后批了我两个月共16场。起初，批判会限于省新闻界处以上党员干部，20人左右，以后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省体育馆，省、市宣传部门党员干部6000人参加。大会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国内大好形势说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不是事实；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了解下情，不关心农民，就你们几个人了解和关心农民。

揭发与批判继续拓宽升级。我的错误越揭越多，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一次困难”。最后省委一位部长揭发我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他说，毛主席1957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观点，便和这位此时揭发我的部长在车上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讲目的，都没讲客观规律，这便是我们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增加上“实事求是”4个字便好了！

对于这些批判，开始时我想不通。我想，我4月19日的长信，信中的现场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不会假。那些概括性的灾荒估计可能与实情有出入，但不会错到那儿去。我只是一封给上级——新华社总社副社长的内部信件，我又没有公开散播什么东西，特别是看到小会上批判我最勇敢最尖锐的几个人，都是那段时间蹲在办公室，根本没跑过广东农村的同志。我心想，我反映的是看到了的情况，你们没看到，你们批判我的根据是什么呢？毛主席说：“犯右倾错误的人，七斗八斗，顽固不固。”他说对了，我渐渐想通了。一、信中那些全省概括性灾情估计，我可能错了，因为这些情况只是听来的，我又没到每个地方看过；二、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散布惊慌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我这封信是散播了惊慌情绪；三、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张闻天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紧”，这话往我身上一套，不也合适吗？我不正是对三面红旗那么热切地宣扬过，现在又说农村状况很严重的吗？人就那么奇怪，我好似想通了，说我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好像可以的，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自己，在六千人大会上做了两个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我做出书面正式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这个决定是经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定的。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庐山会议



1985年，作者在广州拍摄下了满面春风的小商户

和庐山会议后整掉彭德怀反党俱乐部后,以为各部门、各省市都有大大小小的彭德怀式的人物,下令各地都要揪一批划一批。陶铸在广东省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我是其中的一个。

1961年夏天,陆定一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7个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调到暨南大学新闻专业开课执教,但处分的尾巴仍留着,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省委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通知你,说现在省委认为杜导正同志对1959年广东农村形势的估计和意见是正确的。”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

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职务。3月中旬,新华社总社召我回北京,谈谈工作,看看文件,休息一下。主持新华社总社工作的副社长朱穆之找我谈心,我说我的教训归结为“欠谨慎”三个字。朱穆之说:“我看你以后注意的倒不一定是‘谨慎’,还是要大胆工作,不要把锐气整掉了,该说的该做的,还是要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大胆说大胆做。”

就我们党来说,1958年头脑发热搞“三面红旗”,1959年大灾荒开始冷静反“左”,同年秋天庐山会议头脑又发热反彭德怀反右倾,1961、1962年七千人大会,被迫冷静下来,又开始纠左。这次纠“左”谈不到彻底,只是修修补补,以致不久导致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错误,但经验教训总是总结了一点,接受了一点,所以出现了1965年形势全面好转的势头。在这几年不平凡的经历与反复中,我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这我在此文的叙述中,我以为讲过了。概括地说,一、1958年“三面红旗”宣传中,我是很坚决很积极很有“成绩”的,因此是很错误的;二、1959年“三面红旗”的错误暴露出来时,我因为下乡多,跑了海南岛,觉察“三面红旗”的错误,比我周围的人早一些;三、我冒了一点风险,将广东灾情向上级写信做了较具体有些分析的反映;四、因为这封信不合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愿望,我在反右倾运动中挨了整;五、我们这个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我的冤案很快被平反了。

我是1945年末开始做党的新闻工作的。党的事业发展中,有正确的时候,有错误的时候,有辉煌的成就,也有痛心的失败,党的正确与成绩中有我的一份,党的错误和失败,照样有我一份。我被人错误地整过,我也

错误地整过别人。我犯错误,有时是自觉的,多数是盲目的。1958年到1962年,我的这段经历,对我的后半生影响甚深;“文化大革命”10年中,我又经历了类似1958—1962年的过程。“文革”中我从抵制,到顺从,到紧跟,到怀疑,到否定。它逼我做了更多些思索。经历了这两段历史,我以为我对人民记者这个高尚职业的理解比以往说正确了些,深刻了些。我在我著的《是与非》一书中写道:“总结一下40余年的经验教训,我体会最深的是:一个记者一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物,都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物都要实事求是;采访写作中要坚持调查研究;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对的敢于坚持,错的勇于改正;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不写违心的文章。”

这里,我愿强调地谈谈为真理为人民不可计较个人生死荣辱的事。人民记者的根本职责是正确地反映真实情况给党给读者。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情况要真实,二是真实的情况还要正确地反映。做到这两句话都很难。刘少奇1948年给华北记者团讲话就说,一个地方,你记者初来乍到,人们都不认识你,心里话,真实情况一般不会对你说的。必须坐到炕头上去,慢慢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总会扯出一些真实情况。从这个要求说,我作为记者,革命战争时,是这么做的,所写的东西,现在看也还基本真实。进城以后,我深入调查的作风便弱了,飘浮了,多是采访以前,脑袋里已经有了框框,到下边去目的便是找例子证明自己或上级的观点正确。我在1958年写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便是根据道听途说或上级机关材料写成的,至于星子公社亩产24000斤的高产卫星新闻,发的时候更是怀有私心,怕省委不高兴,才故意将括号中这高产数字是23亩水稻并成的一句话违心地删去,有意欺骗上级欺骗读者。1959年4月19日那封信,则是我深入到农村亲眼看到后才写的。从这几个采访例子看,掌握真实情况,一般说并不非常困难,当然太复杂的事件不在此例。至于说,对掌握到的真实情况,能否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我以为和要求真实相比,这方面党与读者对记者的要求低一些,从我的经历来看,也是这样,即复杂的事物,要分析的正确,判断的正确,是艰难些,但也并非高不可攀。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很朴实的東西,并不奥秘。像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指出的,我党1958年“三面红旗”犯有错误这个掷地有声的结论,其实那时已是很明显的事实,党内许多同志也是这么看的。庐山会议初期,胡乔木、吴冷西等同志也这么支持

彭德怀的看法，只是毛主席大发雷霆以后，这些同志便转而批判、揭发彭德怀了。我和新华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另6位国内分社社长，那年只不过是经内部渠道，向上级反映了一点点真实情况而已。虽然浮皮潦草，但它真实，它正确，从历史角度看，它起了好作用，能站得住。所以，做记者的，在重大问题上，抓取真实情况，做到正确判断，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算很难，从我与周围记者多半生的经历看，记者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说正确的话，最要紧的还不是能否掌握到真实情况，能否做出正确判断，而是有无胆略，是敢与不敢。说白了是愿不愿为人民也是为党说真话，勇于承担风险。

我以为，我们党有个老弊病：党员犯左倾错误多数情况不受责备，连自我检讨也可不做；犯右倾错误，多数被整得很惨，有的搞得家破人亡。这个弊端，沿袭多年，历久不衰，当然总的说，我们还是比以前聪明了文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进步更明显些。作为记者呢，说假话，说左话，写假报导，也是大多不被责备的。我写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星子公社亩产二万四千斤》等报道，我在反右派运动中错划了4位同志为右派，我将老同盟会员罗翼群骂得狗血淋头，在《南方日报》写了批他的4个整版的文章，等等，多少年了，除了我自己在文章中、信件中做过自我检讨，向受害的同志致过歉意外，作为上级党政组织是从不曾批评我，更不说要处分我了。可1959年写了那么一封说了点真话的长信，“文革”中对“文革”太离谱的东西说了点不满的心里话，可就被整得死去活来。“文革”中受批斗，大家彼此彼此，那不必说了。1959年4月19日，我写那封长信时，知道上级某些人听了不会高兴，所以我没写成公开报道，连“内参”也不敢写，只作为一封信写给顶头上司。当时我以为这么写，风险会有些，但不致于被整到那儿去。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我始料不及的。经受了那场“反右倾”，特别是经历了“文革”浩劫的大反思，我自以为我成熟些了。当然这首先归功于“文革”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全党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进行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们党内重新占了上风。我这些年的想法是：人生很短暂，数十寒暑而已，



作者走访农村，和农民亲切交谈改革开放的成果

作人特别是作为记者，能力有大有小，但想事做事写报导写文章，总该实实在在，光明磊落，力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不要看别人眼色行事，不要图个人的荣华富贵。总不该个人利害第一，是非第二。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总该是非第一，个人利害第二。革命战争时，我们为党为人民利益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目前和平时期为什么不能为人民利益为真理而挺身说真话做实事呢？这些年，一直到近几年操办《炎黄春秋》月刊工作中，我仍然有若干过失，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上，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创办特区、反腐败等等重大问题上，我以为我没有含糊过，我尽我的能力，组织了报导，写了文章，说了些真话，说了些实话。现在每每想到这儿，良心上便能得到一种甜蜜的自慰。

作者来函更正

《能言善辩的乔冠华》（载1994年第11期）一文作者吴妙发来信称：该文中提到宣读“五二〇声明”时，错把林彪写为毛泽东。特此更正，向广大读者致歉，并向指出此错误的孟治寰、卓得胜、段福录、蒲德生、杰白、翁君、尧放鸣等同志致谢意。

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

法庭上，他是伟丈夫
生活中，他不拘小节

● 陆水明



1932年10月15日。

住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二楼西的陈独秀，午睡刚起床，就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朝楼上奔来，紧接着是一阵粗暴的敲门声，随即闯进来十多名中外警察，为首的一位手拿照片端详了一会，问道：“你就是陈仲甫先生吗？”

“敝人正是！”陈独秀不卑不亢地答道。

探头喜形于色，想不到共产党巨首竟落在他的手中：“请跟我们去租界走一趟！”

陈独秀的被捕，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吹嘘，说什么捕到了“久缉未获的共产党领袖”。其实，

此时此刻的陈独秀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与陈同时被开除出党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在中国组成一个托派小组织，并推举“老头子”陈独秀为首领，即后来被世人称之为“托陈取消派”。

中国的托派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大都是一些坐而论道者。陈独秀由于体弱多病，一般不太过问托派组织的事情，许多会议也不参加，他的住所也少有人知。他这次被捕是由于托派中央常委谢德盘的叛变所致。

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将陈独秀等人押往南京。

当夜11时，陈独秀被一个排警察押上火车。

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已沦为阶下囚，但他的一举一动却不失伟丈夫的气魄。他上车后不久就入睡，一路酣声如雷，一觉睡到天亮，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士兵把他叫醒方知已到南京。陈独秀对于自己眼前的处境及结果是非常清楚的。这段旅程等于押赴刑场，他居然能安心入睡。他这种泰然处之的神态，连押送他的警探们都惊讶不已。

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者，若没有“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的至高境界，是绝对做不到的。难怪乎，陈独秀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之后，许多人把他奉为当代的东方哲人。

二

陈独秀被捕，成为当时全国最轰动的新闻。以蔡元培领衔的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开展营救陈独秀的活动。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对宣传西方文化的新派人物尤为倚重。他上任的当月就向因创办《新青年》杂志而名声大振的陈独秀发出邀请，聘请陈为北大文科学长。从此，蔡与陈成了莫逆之交。1927年8月，蔡元培担任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0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等八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放人。

除蔡元培等人外，胡适、柏文蔚，北大师生等个人和团体也纷纷奔走营救。

法律界著名律师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等人均公开表示，愿意为陈独秀出庭辩护而不取分文。

许多正直、公道的报刊舆论也纷纷发表文章，恳请当局从轻处罚陈独秀。

蒋介石既不想得罪蔡元培等名流和社会舆论，也不愿便宜了这位老对头。他急电召国民党党部派人携其档案去武汉行营向他当面汇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干事黄凯带叛徒谢德盘一同前往汉口。蒋介石详细地询问了陈独秀与各地红军的交往情况，当他确知陈独秀与目前苏区的共产党和红军组织已无任何瓜葛后，于是来个顺水推舟，电令国民党中央将陈独秀从军法司移交到地方法院审理，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外界：陈独秀可以免于死。

在从军法司移交给地方法院之前，陈独秀由军法司司长王振南陪同来到军政部，何应钦穿着括挺的上将军服站在会客厅门前等候，给了陈独秀很好的礼遇。谈话是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主要是询问陈独秀与苏区和红军的交往情况，陈独秀再次告知他现在与苏区已无任何往来。末了，何应钦客气地请陈独秀给他写一张条幅，陈慷慨应允，然后送出会客室。

三

翌年3月底，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以“危害民国案”名义正式向陈独秀提出起诉。

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在江宁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由于陈独秀在国内享有的知名度，对他的审判格外引人注目。

昔日不起眼的江宁地方法院，这天却热闹非凡。法庭旁听席只能容纳百余人。但来自镇江、苏州、无锡、上海等地的新闻记者却有二百多人。过道上，窗户外都挤满了人，要亲眼目睹这位当年五四运动风云人物的风采。

法庭的两边柱子上新张贴了

一幅对联，上联是“听讼期无讼”，下联是“明刑复恤刑”，意思是将严肃谨慎地审理此案。

上午9时10分，审判长、推事、检察官以及被告律师等人就坐。审判长是江苏高等法院院长胡膳儒，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偶、沈育仁，被告首席律师章士钊，其余四名律师是吴之屏、彭望邨、蒋豪士、刘祖望。

9时20分，陈独秀由两名法警带上法庭，审判长准许让他坐在椅子上回答提问。那天陈独秀穿灰色棉袍，着棕色裤子，留有一寸长胡须，神态镇定自若。

9时30分，书记官宣布开庭，先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审判长逐一审问，陈独秀用极短的词句回答。但当审判长问到：“你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独秀却作了充分的阐发：“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一）现在国民党政府是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听了陈独秀的答辩，旁听席上有人转声赞叹：“好一个陈独秀，仍不减当年‘拖二十四门大炮轰炸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英雄气概！”审判长只好摇铃让庭内保持肃静。第一次开庭在匆忙中结束。

4月15日第二次开庭。这次审判长没问更多的问题，陈独秀也没费更多的口舌作答，只是对前日审讯笔录作了核实。

4月20日法庭进行公开辩论。

检查官朱儒对陈独秀的所谓“罪状”再次作了补充说明：“归纳被告的主张，共有四阶段：（一）组织团体；（二）宣传；（三）武装暴动；（四）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目前被告的行为，尚处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所以，被告犯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当审判长问陈独秀答不答辩时，陈独秀立即回答，“岂止是答辩，我要抗辩！”接着陈独秀有力地讲，“检察官先生控告我犯有危害民国罪，理由是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要郑重声明：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比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是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果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但是这句话谁都不能承认，因为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根本不能算是国家。因此在理论上，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并不能就同于危害民国。”

陈独秀顿了顿又继续辩诉：“我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组织苏维埃政府，这也并不危害民国。有些人把苏维埃看成是洪水猛兽，这与同治、光绪年间，视铁路为洪水猛兽情形是一样的。我们主张组织苏维埃政府不为法律所容，但不能说法律所不赞同的东西就是叛国。如果法庭要对待不同思想主张的人加以判决，这不成了中世纪欧洲宗教式的法庭了吗？所以，检察官先生对我的控告是站不住脚的，请法庭宣告我无罪释放。”

陈独秀的抗辩掷地有声，法理清晰，引起旁听者的同情。

4月22日陈独秀写了一份《辩

诉状》，让友人带出监狱传抄和印发。陈独秀在《辩诉状》里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写道：“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之组织，钳制人民之口舌，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割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试问谁为‘叛国’？！”

陈独秀在《辩诉状》中大声疾呼：“我生平言论，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公告国人。我无罪！如果有罪，那就是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罪在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罪在得罪了国民党之缘故。我只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

陈独秀的《辩诉状》在社会上人们争相传看，读后使人大有一种把郁积在胸中多时的闷气一吐为快的感觉。

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民权15年。

四

不日，看守所来了位不速之客。此人就是当时顶顶有名的章士钊大律师。

看守所所长认得章士钊，见他来了忙趋前讨好地说：“章大律师大驾光临，想必是要见见陈独秀先生？”

“正是！还望贵所长给予方

便。”章士钊回答。

“那是，那是。”所长边说边把章士钊引到优待室。

陈独秀见是章士钊来看他，脸上并没有露出多少欣喜，说话倒几分揶揄：“承蒙章大律师来看我，可我现在是一阶下囚，想打笔墨仗也已失去平等。”

章士钊并不生气，而是带几分感慨道：“仲甫兄说话仍是那么尖刻。尽管过去我们政见不一，你骂我是段祺瑞的走狗，我骂你是乱党贼子，互斥对方是反动，但我们一直是私交很深的老朋友呵。”

这一点章士钊并没有说错，此番话倒引起了陈独秀的追忆。

在辛亥革命前，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与同时到达的章士钊、苏曼殊同住一室。那时他们都是热血男儿，经常在一起把盏共语，论世道沧桑，白云苍狗。他们同是那样的才华横溢，骄气逼人，性格豪放。那岁月，陈独秀一生也没忘，几十年后他仍向身边的亲人讲述了那段经历。

陈独秀说，他和章士钊、苏曼殊三人非常要好，好到有饭同吃、有酒同饮、有衣同穿，有难同当。但他们三人一人一个性格，陈独秀给苏曼殊起了一个绰号叫“风流和尚”。说苏人极聪颖，诗、文、画都很有造诣。苏的画教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其诗句也写得发人幽思，字里行间别有洞天。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印象要差些。章士钊能言善辩，重逻辑，讲起案例来广征博引，丝丝入扣。在日本留学期间，章士钊曾和一位日本大佐的夫人搞婚外恋，非要找章决斗不可。陈和苏商量让章逃走了事，否则性命难保，以后也就当不成段执政的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了。

政见不同，友情为重，这在当时不乏其例，如梁启超与孙中山。

梁骂孙是“乱党”，孙斥梁是“保皇派”，但孙梁的私交极深。不像这几十年非友即敌，鲜明对垒，这或许是那个时代人们所受文化思想陶冶所致吧。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也非常明白章的好意：为他义务出庭辩护而不用掏一分钱。倒是章士钊有几分担心，担心他这位倔犟的老友不肯配合而影响辩护作用，因此提前来看看守所与陈独秀通通气，以便协调一致行动。陈独秀接受了老朋友的心意。

从此，章士钊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为了从法理和事实上击败国民党法庭给陈独秀罗织的罪名，章士钊三到上海，四进苏州高等法院，五次会晤陈独秀本人，作了大量的准备。1933年4月20日，法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庭，章士钊在庭上作了长达一个小时洋洋万言的辩护。章的辩护法理严谨，思路清晰，很能打动人。然而，法庭并未因章士钊的出色辩护而开释陈独秀，仍判陈独秀13年徒刑。章士钊对国民党这种无视法律尊严，任意践踏神圣的法律怒不可遏，起草了一份“辩护词”，与陈独秀自己写的《辩诉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引起轰动。这两份东西被亚东图书馆编为《陈案书状汇录》出版，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两所教会学校）还选为法律系教材。

五

陈独秀的字与他的文章一样，写得极好。他的草书龙腾虎跃，行云流水，颇有章法。

自他被捕后，他的字就更值钱了，许多人向他要，陈独秀困人而写，当然也有拒绝的。

陈独秀刚被捕时，暂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当天，侦

缉队队长就向陈独秀要字，其态度可掬，笑脸盈盈。陈独秀望着这位身着便衣模样十分精明的“捕快”，略作思索挥笔写了“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张条幅。意在告诫他这个拿枪杆子的人不要忘了自己的真正职责，不要忘了当前日本军队正大举进犯中国东三省，并向华北地区推进，国破山河，勿忘国难。所思所虑，所行所为应是国人之忧，而不应国人相互杀戮，祸起萧墙，自家人残杀自家人。这位侦缉队长也许看懂了，也许没看懂，反正说了一连串的谢词走了。

陈独秀在给何应钦题的条幅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条幅里陈独秀既表达了自己不愿受屈辱的心迹，也是对身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一种敬勉。据说何应钦对这张条幅十分满意，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就是后来当他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时，也带上了这张字幅。

陈独秀被判刑后关押在南京第一监狱——老虎桥监狱，陈的许多故友时不时地看他。一天，著名画家刘海粟去监狱探望陈独秀。陈独秀和刘海粟也可称得上是忘年交了。陈比刘大20来岁，但陈把刘当成是同辈的朋友一样敬重。刘海粟送给陈一幅已画好的画。陈也回赠刘一幅字，上题为“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在索字者中也有人纯粹是为了钱财的，有一位看守先后向陈要了两幅字，转身拿到外面卖高价。此事不知怎么被陈独秀知道了，当这位看守又厚着脸皮来要字时，陈便断然拒绝了。这位看守想利用职务之便向陈报复，无奈陈独秀是名人大案，连典狱长都得让他三分，看守的恶主意没有得逞，过不久，狱方把这位看守调离他处。



蔡元培

六

陈独秀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的婚恋也是一波三折。

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大众，出身名门，三寸金莲，性情也柔顺，在世人眼里，秀才出身的陈独秀与高大众联姻可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然而，陈独秀始终对这种由家长越俎代庖的婚姻耿耿于怀。大众大陈独秀三岁，目不识丁，“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陈独秀内心深处与他的这位旧式夫人怎么也“好”不起来。

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被陈独秀与另一位女子的真诚相爱而冲破。这位女子叫高君曼，是高大众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个知书达理，热情奔放的新潮女子。她深深地同情姐夫，并悄悄地爱上了姐夫。陈独秀也被这位小姨子的高雅气质所吸引，内心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与爱恋。他们常常相约而聚，互吐衷肠，互倾爱慕。经过勇敢的抗争，1910年春，俩个有情人终于在西子湖畔结成伉俪。

令人遗憾的是，这对佳人没有



何应钦

把他们这段美好而激动人心的故事续写下去。在他们共同生活了15年之后又分手了。高君曼带着惆怅，带着迷惘，也带着痛楚来到南京定居，陈独秀孤身一人留在上海。至于他俩分手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没有一种说法能完全说服人。

陈独秀的第三次婚恋是在1930年。那时他已53岁，岁月风霜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石门库楼房。与他隔壁居住的是一位叫潘兰珍的年轻妇女，约20刚出头。潘兰珍也是一位苦命的女子，在英美烟草公司供职，因年轻被骗，曾与一流氓姘居几年，生了一个孩子，后又被这个流氓抛弃，孩子也因病夭折。潘兰珍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为避开流氓的纠缠而搬到这里居住，渐渐与陈独秀相识并产生好感。陈独秀对外用化名，自称是大学教授，行动诡秘。由于是邻居，潘兰珍有时帮陈独秀缝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你来我往日子久了，俩人产生了感情。1930

年底，尝尽凄风苦雨、历经磨难的陈独秀与饱受人生苦难的潘兰珍结合了，尽管他俩的年龄悬殊，但他们仍然相处的非常融洽。

陈独秀与潘兰珍结合后，俩人搬过几次家，他们还收养了一位小女孩，使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岳州路住所被捕。适时潘兰珍正好回浦东娘家小住，没有殃及。当国民党报纸连篇累牍刊登逮捕陈独秀的照片和文章，潘兰珍才恍然大悟，大声惊呼：“原来我家老头子就是陈独秀！”她义无反顾来到陈独秀身边。她追踪到南京，先住在陈独秀的学生、“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北大毕业的段锡朋家，后租赁了间民房，天天去监狱探望陈独秀。潘兰珍的出现无疑给了陈独秀那颗早已伤痕累累的孤独的心以极大的慰藉。陈独秀在牢中脾气变得很坏，但每次潘兰珍来看他，他的性情就开朗许多，有时甚至像一只温顺的羊羔听任她的安排。可以说，在陈独秀这次长达近5年的囚禁生活里，如果没有潘兰珍的悉心照料和心灵上的寄托，很难想象陈独秀能不能挺下来。这位自己不幸而又心地十分善良的女性，就像一个避风港，给了陈独秀这艘破旧不堪的小船以最好的庇护。这是陈独秀晚年的一大幸事。

在当时，陈独秀与潘兰珍的这层关系外人很少知晓，包括在监狱长期陪同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狱方更不知底细，以致闹出一些不愉快。

一日，典狱长把濮清泉叫到办公室询问，甚至带有几分怒气：“有件事要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

忘记了他是在坐监狱，而把我们这里当旅馆了，这使我们很为难。”

濮清泉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究竟出了什么事？请典狱长直说。”

“那好，我问你可知道有位姓潘的女士经常来看望陈先生？”

“是有一位姓潘的女士常来看陈先生。”

“她是陈先生什么人？”典狱长又问。

“我不清楚。可能是他学生吧。”

“不像学生。学生岂能天天来看老师？”典狱长表示怀疑。

“是不是陈先生的小女儿？”

“从她的举止看不像是陈先生的女儿。”

“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濮清泉实在憋不住了。

“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位潘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请你婉言转告他，要为我处境想一想。面子要双方来顾，如再有这样行动，那就莫怪我无情了。”典狱长终于把话挑明了。

濮清泉赶紧说：“怕不会吧，请你再调查一下。”

典狱长肯定地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请告诉他，往后请他自爱一点。”

隔日，濮清泉抽个机会将典狱长的话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转告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听了后神态自若，既无愧色，也无赧颜。

沉默良久，陈独秀平静地说，“关于私生活方面，在建党以前我是有些放纵，在北京也跑过八大胡同（妓院），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注

意检点再没有胡来，这一点我对自己是注意的。至于国民党的报纸造我的谣，大报道大谣，小报道小谣，我不在乎。可你怎么也相信这是真的呢！”

停了一会，陈独秀接着说，“既然你们问起这位潘女士是谁，我现在告诉你：她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爱情的归宿，是我陈独秀深深爱恋的女性，是我离不开的伴侣。”

濮清泉听了很觉愕然。陈独秀充满感情地讲述了他与潘兰珍相识相爱的过程。还告诉表弟，潘兰珍是特意从上海赶来南京照顾他的，为此她把养女都送到南通老家去了。并一再叮嘱濮清泉：“你不能有一丁点的轻视她，她是你堂堂正正的表嫂！”

濮清泉听了后也十分感动，为陈独秀晚年得这位知己而感到庆幸。他把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关系告诉了典狱长，典狱长也就没再说什么。以后每当潘兰珍来看望陈独秀时，看守们都知趣地走开，让他们去享有那人间共有的欢乐。

七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的消息很快转到了监狱，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陈独秀简直就像儿童过年一样高兴，喜形于色。他托人从狱外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与表弟濮清泉一起痛饮，以示庆贺。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表弟说：“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

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们，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请受奠一杯！”说罢把酒奠酹地上。

接着他斟了第二杯，未开口早

已泪湿衣襟，呜咽地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再也说不下去了，失声痛哭。

濮清泉见过陈独秀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更未见过他哭得如此伤心，如此动情，如此悲切！一时不知怎么劝好。

过了好一会，陈独秀才低缓地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延年、乔年是我六七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两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卒，竟走在了我前面。”

延年与乔年与陈独秀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他们父子的性格都非常刚烈，他们之间常因意见不合而闹得不愉快，同时内心深处也深藏着割不断的父子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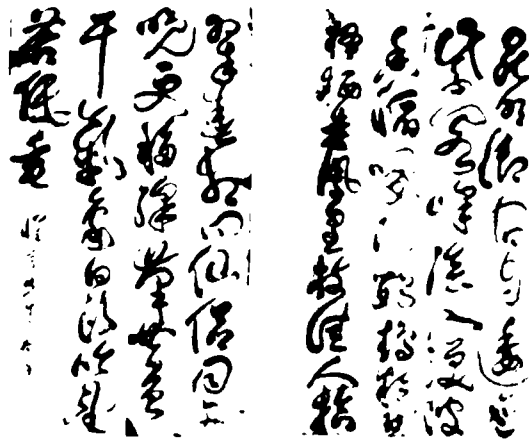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了妥协退让的机会主义错误，陈延年曾在广东区委会上公开地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乔年也曾经当面批评陈独秀：“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

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解除了党内领导职务，在上海一秘密住所闲住，由秘书黄玠然陪伴。在那段白色恐怖最严重、也是陈独秀最心灰意冷的日子里，乔年尽量抽出时间领着爱人史静仪去看望陈独秀。有时仍免不了争执几句，但更多的是宽慰陈独秀。陈独秀嘴上尽管说：“儿子竟教训起老子来了！”实际上，乔年夫妇每次去看他，他还是十分高兴的，只不过陈独秀不轻易流露出儿女情长罢了。

延年乔年相继牺牲对陈独秀的打击太大了，陈独秀也为有两个好儿子感到骄傲，尤其是兄弟俩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常浮现在陈独秀的脑海里。

延年是1927年6月26日被捕的，刚开始并未暴露身份。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是陈独秀世交，欲设法营救，并请胡适帮忙。胡适天真地将此事告诉了吴稚晖，以为他会帮忙。没想到此时的吴稚晖已成了铁心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早把当年与陈独秀的友情抛到脑后。吴稚晖听到此消息，惊喜若狂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为宫怀甫录杜甫诗《秋兴八首》手迹



四川省江津市五举乡石墙村，陈独秀
就死在左边的角门里

地说：“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并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贺函”，里称“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巨憨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定要严惩不贷。”7月4日敌人将延年枪决。行刑前，刽子手喝令陈延年跪下，他不予理会，刽子手上前用强力将延年按下，然而当刽子手刚松手欲挥刀砍时，延年又突然跃起，使刽子手扑了个空，敌人恼羞成怒，狂叫着一拥而上，再次将延年强按在地，用乱刀将他砍死。

乔年是1928年2月16日被捕的。起初敌人也没有发觉他的真实身份。与乔年一同被捕的周之楚也没有暴露身份，表现也十分英勇，按照狱中组织的计划由他来顶替乔年，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的生命。因为周的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便赶回国内托人营救。结果，敌人不仅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身份，连乔年的身份也暴露了。乔年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一字不吐。同年6月6日，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在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

独秀先后失去两位爱子，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西安事变”陈独秀起初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欣喜。他对濮清泉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说罢劝濮多喝酒，以示庆贺。

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抗战局势进一步严重。日本人飞机开始飞临南京的上空轰炸，陈独秀所在监狱被炸弹击中，房屋倒塌，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

同年8月，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来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共商抗日大计，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向蒋介石当面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与此同时，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钟凡（原北大学生）得知监狱被炸消息后，与社会名流胡适、张伯苓等商议联合保释陈独秀。国民党当局表示同意，但条件是除了人保之外，还需陈本人具“悔过书”。

陈独秀听了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也不悔过，我有什么好悔过的？附有任何条件的释放我都不接受，包括人保。我要求无条件出狱。”

8月21日，迫于形势，国民党司法院院长，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一个“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内称：“该犯入监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

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当天，国民政府就将呈文批复给司法院，表示同意。同时，司法院向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让其开释陈独秀。

8月23日中午，陈独秀出狱。

8月25日，陈独秀针对国民党司法院所谓的开释理由给《申报》编辑写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因种种原因，这一声明未能在报上登载。

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即派说客向陈独秀游说，企图拉拢他，均遭拒绝。先是派胡适拉陈独秀入“国防参议会”，与蒋委员长共议国事。陈独秀明确告诉胡适：“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接着，蒋介石又派亲信朱家骅去拉拢陈独秀，要陈“组织一个新共党”，并以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作诱饵。陈独秀毫不所动，坚决不干。蒋又想请陈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长，也遭到拒绝，并斥蒋是“异想天开”。

陈独秀出狱后曾多次表示，“愿意重新回党工作”。并派出他的私人代表罗汉与中共驻南京、武汉、西安办事处的代表博古、叶剑英、李克农、林伯渠等人接触，洽谈陈回党工作事宜，中央根据陈独秀的意愿，以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名义复电，提出接受陈回党内工作的三项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

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二)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对后二条陈表示没有异议，对第一条不愿作出承诺，他认为自1932年入狱后他已自动与托派脱离了一切关系，因而用不着再发表什么声明。

博古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也有别人不可比拟的地位。他如能重新回党工作将是一件大好事，但还需做很多工作。党内能和他谈得拢的人不多。我博古的资历太浅，我出面和他谈，他不一定买我的帐。润之也不行，他俩的性格都太硬，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周恩来。但周恩来现在不在南京，只好等一段时间。

恰在此时，风云突变。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王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对

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不仅是托派，而且是“杀人犯”、“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的日本间谍。”

康生也跟着起哄，造谣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徒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的高论引起社会舆论大哗。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出来为

陈独秀辩诬。

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高一涵等九人写信给《大公报》，内称“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纪行动，亦全国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尽管有许多善良的人们站出来为陈独秀鸣不平，但悲剧已经造成。王明、康生的蛮横无理最终无情地割断了这位离党多年的老战士“回党工作的”情愫。从此，他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凄风苦雨中任意漂泊，度过他潦倒的残年。

孤雁西南飞。

1938年7月，他与逃难的人流从武汉来到重庆，后落脚在江津县郊鹤山坪。

陈独秀的晚年，生活窘迫，精神郁闷，每当落日晚霞悄悄褪去，在疏星淡月下，潘兰珍搀扶着陈独秀来到村东头，他常常凝望着远处竹林杂舍之上袅袅飘起的炊烟，背后留下两个孤寂凄凉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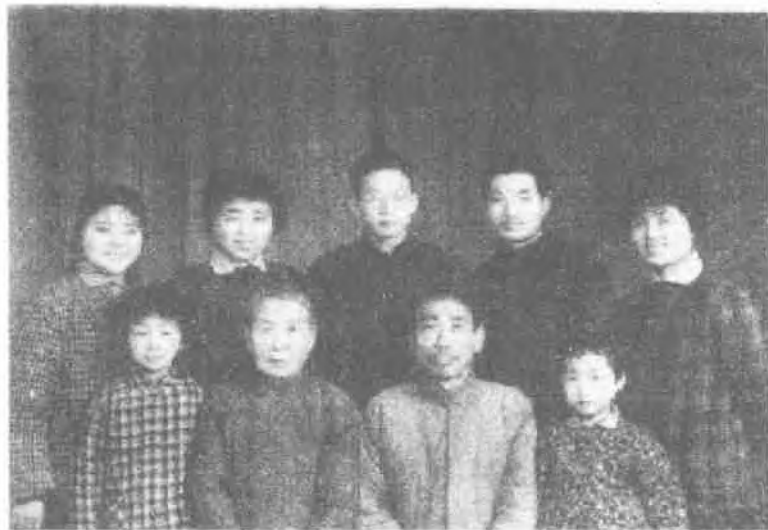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责任编辑：杜晋)

本刊学术增刊征购

本刊1994年《炎黄文化研究》学术增刊尚有少量存书，免费邮寄，欲购从速。

增刊内容丰富，刊论文33篇，186页，订价7.50元。



陈独秀的后代们。后排：陈独秀孙女陈长璜（左1），陈长玮（左2）陈长琦（左3）孙陈长琦（左4）孙婿王德瓦（左5）；前排中为陈独秀之子陈松年夫妇及外孙女王韵（左）王庆东（右）（1975年）

民谣云：“抽的烟喝的酒是贡的，花的大把票子是送的……”这是当今千百万人对贪脏枉法者从心底唱出的一曲辛辣的歌。别忘了，人心不可欺，本文作者给我们颂扬了一个锲而不舍、一身是胆的张新民。他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终于将一群“推磨鬼”拉上了法庭。

天地有正气

● 张正隆

1991年11月18日，吉林省军区战士冯少刚被一群流氓用刀捅死，四名案犯被抓获，捅刀的叫韩兵。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清晨，一直参与此案的吉林省军区保卫处处长张新民，刚起床电话铃响了。

“你是张处长吗？告诉你，法医的尸检鉴定改了，省军区要不出面，战士就死得太冤了。”

“你是哪里？”

“我是公安分局的，别的你就别问了。”

张新民驱车赶到朝阳区分局预审科，找到了负责此案的×××

张新民看了几行鉴定书，脑袋发炸了：冯少刚致死的刀伤被改写成啤酒瓶砸伤；并将死因归结为208医院抢救不及时所致。

再看照片，创口特写部位被毁！

张新民心里滴血，这里有鬼！尸体火化了，血衣烧了，原始记录不见了，照片毁了，若是底片再没了，问题就更复杂，更难搞清楚了。

他又赶到市公安局，技术科的人说：不用看了，底片没了。

张新民只觉得周身的热血都

涌到了太阳穴上。又涌向笔端，化作一篇《关于法医在冯少刚被杀一案中出伪证包庇凶手的情况反映》在省军区首长手中传阅。

司令员周再康少将看完情况反映，亲自向省公安厅长通报了这一情况。

将军有些激动：一般的事，我们部队就忍了。把战士杀了，还搞假鉴定，太无法无天了！

公安厅长立即找来了长春市公安局长。

市公安局组成调查组，立即行动。

一天，法医王建友打电话约见凶手父亲、大观园酒楼老板韩克彬，有人截获了如下一番对话。

王：“老韩，鉴定书我已发出，底片也叫我毁了。”

韩：“朝阳预审科搞到鉴定书我就知道。”

王：“给你冒好大个险，在法医界没有这事。”

韩：“你的鉴定能不能经得起推敲？”

王：“能。……”

韩：（如果）“事情暴露要经得起考验，以后不再联系了。”

1992年3月中旬的一天早晨，

保卫处长张新民吃过早饭刚要上班，电话铃响了。

“你是张处长吗？我是公安厅的，告诉你，韩兵做了第二次精神病鉴定，结论变了，你们赶快去追查！”

韩兵被捕后的鉴定是：普通醉酒，有责任能力。

张新民直奔设在公主岭市的公安厅安康医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副院长。

张新民直奔主题：听说安康医院为韩兵做了第二次司法鉴定，结论是什么？

副院长闪烁其词：我们的鉴定没多大用处，检察院、法院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张新民说：我们想看看鉴定结论。

副院长道：你们不是委托单位的，不能看，也不能跟你们说。

张新民一针见血：你不说就说明问题了。

此时，一个神秘人物登场了。2月25日晚10点多钟，一个40多岁，中等个头，穿件黄大衣的女人。敲开了省精神病院老院长王克俭的家门。

她是利达物资经销处总经理。

这女人进屋就说：“我是韩兵的母亲”。说着就跪在地上，声泪俱下：“王院长您救救我的儿子吧，不然我也没法活了，救我儿子就是救我们一家呀！……”

老院长问明情况，安抚了一阵，送走女人后，发现沙发垫下露出半截信封，拽出来一看，鼓囊囊的，是4000元。老院长把信封交给医院保卫科。

离开王克俭家的总经理，又去敲省鉴定技术组副组长，省精神病院副院长刘静芬的家门，又如法炮制，依然碰了钉子。

接着，她闯进了省军区政治主任彭玉林的办公室……

1992年2月11日，办案人×××，××以“朝阳区检察院通知做第二次精神病鉴定”为由，呈报了给韩犯再次鉴定的报告。就是这样一个报告，有人竟然当即批示“同意”。

大年三十这一天，办案人×××就去安康医院私自填写了委托书，并请医院有关人员在公主岭大酒店吃了一顿，饭后即将韩兵送入精神病房。

当初，案子破得那么漂亮，张新民很高兴，觉得事情到此为止，他的使命完成了。现在一个接一个的蹊跷事，他被震惊、激怒了，法医搞假尸检鉴定，医院搞假司法鉴定，韩家搞了双保险。韩家本不足惧，棘手的是被韩家金钱雇佣的这些推磨鬼。眼下要紧的是搞清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事实，把这些魑魅魍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如此案生案、案套案、案中案，别说他不是办案人员，就算是，要搞清楚又谈何容易啊！这些搞暗道的人可都是行家里手呀！

一种爱与恨交织着的激情，在他心头涌动、冲腾、奔啸！

他就喜欢叫真。

1970年，他参军第二年被选送到长春农牧大学读书。一次在3路有轨电车上，见一小偷偷一妇女钱包。“抓小偷！”他喊一声挤过去，那小偷扒开车门就跑，他跳下车就追。不到20米距离，按他的体力和速度，一般人几百米内就追上了，那小偷却跑得奇快，大街小巷一路追出5里多。不是追上的，而是硬把那小偷撵熊了，撵服了，撵得跑不动了，也不想再跑了。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老家双阳县出了个风云人物，当了中央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常委和县革委会主任。这人原是个大队书记，张新民的父亲就在那个公社当社长。上边来人挖事迹，父亲说：他的事儿就那些，别拔高弄到天上去了。后来这人被抓了起来，上边又来挖罪行，父亲说：他是劳模，不是造反造上去的。有人就说父亲是榆木脑袋不开窍，父亲说：宁肯不当官，不能不做人。

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他不可能经历父亲那些磨难，那脾性却是相同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最见不得好人受欺侮，坏人逍遥法外。当了保卫干事，处长，举手投足都关系到别人的前途、命运，他就更不能不叫真，而且越是棘手的案子越能唤起他的灵感和激情。他不知道王克俭、刘静芬、彭玉林等人已经叫上真了，但他知道世上有许多叫真的人。他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韩家能用金钱为杀人犯铺出条金光大道红地毯来。

就在韩家的双保险一个已经流产，一个开始破败的情势下，朝阳分局的起诉意见书和朝阳区检察院的起诉书，又不动声色地将韩兵杀人案定为“流氓、伤害”，或是“伤害、流氓”。

这意味着最多只能判处15年徒刑。

令人费解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案件管理的条款，长春市明确规定，命案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朝阳区检察院对此好像也疏忽了，竟然越权受理起来。

《红楼梦》中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位应天府大人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了一出命案，为的是给自己弄一张“护官符”。把韩兵杀人案弄成“葫芦案”的“葫芦僧”，为的又是什么呢？

大观园酒楼是幢棕白两色的多层建筑，一楼门面古色古香，仿古的铅灰色门扇，大红色水泥柱子，金黄色琉璃瓦。

它座落在长春市云鹤街与解放大路相交处，现在它引人注目处不在于厅堂的壮观、典雅，而在于其主人在为自己儿子倒行逆施的神通和高效。

这位韩老板就像一对顺风耳和千里眼，……当省精神病院两位老专家刚接到韩犯卷子，韩犯母亲周冶就找上门去。她进入省军区大院直奔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又是那么轻车熟路。

法医王建友伪证、受贿被依法起诉，有关部门要动作了，他却跑到了香港。

周冶被捕后，为了少干扰，把她送到距长春近200里远的磐石县看守所。有人很快就知道了，看望者络绎不绝，其上司还找到有关部门说单位可以作保，让这位长春市利达物资经销处总经理提前出狱。

去北京医科大学做鉴定，白天开会决定，晚上就动身，事前只有3个人知道。可韩老板也知道了。于是，负责押送韩犯的人都是经过选择的。追捕韩兵父母，韩家人还是早知道，还做了手脚。

有人说“大观园”神了。

转眼已是1992年11月中旬，眼看就是冯少刚被害一周年了。

望着窗外飘飘大雪，张新民眼前仿佛看到精神已经失常的老人的妻子站在街头，一声声嘶喊着：“刚儿啊，我的刚儿啊！……”

对于韩家大搞权钱交易的恣意妄为，人们无不义愤填膺，但又愤并不等于行动。有人就劝过张新民：案子是地方办的，你已经尽力了，无论对军区还是冯家都说得过去了。你这样叫真会得罪多少人，今后还咋与地方打交道？再说韩家那么有钱，要是出个几万买你项上人头，又哪多哪少？

1986年底，长春市一民兵武器库被盗，犯罪分子将一枚爆破筒和6枚反步兵跳雷埋在地下，并触动了一枚跳雷的引爆装置。这反步兵跳雷威力很大，一旦爆炸会跳起两米多高，里面都是钢珠。军地20多人联合办案，一时找不到专业人员，领导用目光询问大家，张新民说“我来”。人们都退到后边卧倒，他趴在冰雪地上，先用摩托车辐条把冻土一点点捅松，再用双手一点点扒。就这样扒出个直径60多公分，深1.5米的坑，把这些铁家伙一一取了出来。

绒衣绒裤湿透了，双手磨出血也未觉得。他不能不紧张。那两个小时的每一瞬间都可能轰然一声巨响，他就无影无踪了。他也有妻子、孩子，那时他没想到他们，也没想军人的使命和保卫干部的责任，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存在于此前此后生命的每一时刻。

可眼下这韩兵杀人案，是一声“我来”就能解决的吗？

从致命伤由刀扎的变成啤酒瓶子扎的，到“普通醉酒，有责任能力”变成“复杂醉酒，限定责任能力”，再到“故意杀人”变成“流



张新民

氓、伤害”，“伤害、流氓”，已是一波三折了。他不知道韩家还要用金钱变出什么样的花活来，但他知道韩家是不会就此罢手的，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也正是韩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此案社会反响强烈，人们都在关注着这场钱法大战。

现在，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年来情况向上级全面反映一下，争取军区首长、乃至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直接参与和支持。韩家大搞权钱交易，买鬼鬼神，神通广大，实在匪夷所思。那也就只有把事情捅到上边，通过权力之手抡动法律大棒，惩治不法不徒。

11月18日，也就是冯少刚被害一周年这天，张新民拿出了一篇一万一千多字的《执法人员贪赃枉法庇护凶犯，年轻战士惨遭杀害含恨九泉》。

正在省人大开会的省军区司令员、省委常委周再康少将，把经政委修改过的“万言书”，给省委常委及有关领导每人送了一份。

一天晚上，周司令员家来了一位地方干部，绕了一圈进入正题：周司令，你工作那么忙，韩兵的案

子还是不管为好啊。

周司令员微微一笑，你是不是韩家派来的？那人连忙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司令员正色道：如果你的孩子被杀了，能就这么不清不白拉倒吗？我看还是你少管闲事，正经做人吧！

几天后一个晚上，司令员家电话铃响了。

耳机里传来一个冷冰冰的男声：周司令，我衷心劝告你，韩兵的案子你不要管了！

司令员轻蔑地一笑：为什么？

对方恶狠狠地道：你要管，就没有好下场！

这一刻，我们好像看到了杀害冯少刚的那把不知下落的警用匕首，寒光闪闪，咄咄逼人。

将军眼里喷出火星子：老子在上甘岭坚守了43天不知道什么叫“怕”，还在乎你这种小蠢贼的小把戏！

对方立即放下电话，让人感觉是个反电话侦察的行家。

就在周再康少将把“万言书”送上去的第二天，省委书记何竹康在“万言书”右上角批示道：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制的国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案不管牵涉到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认真查处！……

一句一个“！”。

3天后，在省政府12楼会议室，省政法委召开特别会议，专题研究冯少刚被杀案。

省政法委书记，副省长吴亦使用手指捻着桌上的“万言书”，目光、语气在庄严、肃穆中透着不可压抑的激愤：省政法委是研究全省政法工作大政方针的，专门研究具体案子，建国以来还是头一次。看了省军区的这份材料，我连着两夜没睡好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容忍这种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的现象发生！……

第二天，由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长春市政法委牵头的4个专案工作组成立，并做了具体分工。12月22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长春机场候机厅等待登机的周冶，被拘捕了。

在对韩家搜查时，意外获得一个小本，上面神秘地记载着一笔笔现金和贵重物品的去处。

与本案有关的是第3页上的两行字：朝阳区法院刑一庭李铁军BP机一台，1500元；金戒指1800元。款额下面括号内还写着个4位数，好像BP机号码。专案组判定这是个行贿记录，查阅寻呼台和用户登记底卡，发现购买BP机款和一年的服务费均系周冶交纳，用户姓名却是法官李铁军。

在由韩兵杀人案引发的系列案的犯罪人中，我们找不到一个是因为不明是非而稀里糊涂下水的。从这位法官到那位法医，都是明明白白地被金钱诱惑，雇佣着，硬往磨眼里伸手，硬往窟窿桥上迈步！

有人说这些人吃这口已经吃惯了。

那位法医王建友因受贿，出伪证被捕了，安康医院这位一手操办了为韩兵搞假司法鉴定的院长兼党委书记×××，今年5月有记者去采访时，正谈笑风生地陪上级来人去钓鱼。

就在笔者采访前不久，有人曾给张新民掏出厚厚一叠子，说是一万元。张新民和他的战友把这当作送上门来的政治工作，有人则视为送上门来的财神。

没人知道韩家为救韩兵下了多大赌注，有目共睹的是韩家把“大观园酒楼”都卖了，还敢断言的是受贿的肯定是少数，是个别人，甚至是极个别人。可就是这极个别人贪赃枉法，随心所欲地玩弄法律，把这起不到24小时就破获的并不复杂的命案，导演成一部长达两年半好像还未演完的《钱法大战》。

法律应该像太阳施惠于每个公民，而不能像月亮十五不圆十六圆，有时还看不见。而法律是什么，关键在于执法者是什么样的人，这就需要一种制约和监督机制，以使法律不受金钱和权力的腐蚀。可有记者采访侦破此案有功人员时，有人惧见记者，不敢说话。做坏事怕曝光，做好事也怕曝光，这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呢？

当罪犯的母亲周冶戴着手铐，被两位女法警从候机楼押进警车时，这位几分钟前还是那么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女人，哭喊着咱们都是女人啊，有点同情心吧，声音凄厉而又哀怨。

是的，她是女人，而且是个母亲。没人会怀疑这话的真诚，人们甚至相信如果可能，她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儿子的生

命。

就在省委书记何竹康在张新民的“万言书”上批示后不久发生的，同样也是由于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干预，才得以解决的山西临猗县一位农民被活活打死的命案，完全是县公安局长利用手中权力导演的，不用花一分钱。而在由韩兵杀人案引发的系列案中，人们看到的则是所到之处都是韩家的金钱，用钱铺路，用钱买权，用钱弄鬼。

莎士比亚曾这样描写黄金：“这东西就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高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从金戒指到BP机到花花绿绿的钞票，韩家夫妇不屈不挠地进行了一场钱大于法的可行性论证，到头来除了自己沦为逃犯，囚徒外，韩兵又怎样了呢？

1993年9月3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韩兵进行判决：被告人韩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4年2月2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被告人韩兵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天地有正气，人心不可欺！

当人们透过韩兵杀人案引发的系列案，看到了产生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的土壤和环境，更看到了这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张新民们的存在。没有这场命案他们存在着，再有这类荒唐事他们也存在着。

而这，才是希望之所在。

（责任编辑：仲文）



文龙为尼克松助选

尼克松 对华政策 谋士—— 文龙传奇

● 张大富
甘远志

在中美关系史上，一位美籍华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十七代后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政治外交顾问文龙先生。本文披露的是文龙先生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一段秘史。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打破历史的隔膜，应邀来到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发表了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除了“小球推动地球转”的乒乓外交因素外，尼克松政治外交顾问、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总部主席、洛杉矶《新光大报》总编辑文龙先生，也起了极为重要的参谋策划作用。

“娃娃军官”身陷囹圄 英雄后裔情系和平

文龙，祖籍四川省广安县观阁

镇，生于1931年1月20日，是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十七代后裔。

据《文氏家谱》记载：文天祥的先世本居四川成都，五代后唐时由成都迁往江西吉州，文天祥出生于江西。清代嘉庆五年，文天祥的第八代后裔文固国，又举家由江西吉州迁返四川省广安县观音镇（今广安县观阁镇），直至文龙的父亲文树高从观阁镇迁至一溪之隔的四川渠县文山乡，文龙便诞生在文山乡。

文龙少年聪颖好学，力求上进，曾就读重庆北碚的朝阳学院和广东中山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

位。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陆，在海南岛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任职，成为年仅18岁的少校政治军官，专事新闻报道和演说等宣传工作，被称为“娃娃军官”。

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土崩瓦解之际，文龙目睹了国民党腐朽政权的溃败，他极其反感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口号，后来发展到在官兵面前公开宣讲民主思想，不赞成反攻大陆。他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上峰的注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政治局局长席凯把文龙找来，厉声训斥道：“文少校，请你说话注意一点，你的腔调像一个共产党人。你必须记住，这里是国民党海军陆战队！”

文龙毫不示弱：“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中国人，我有权说，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中国再也经不起战争的折腾了，反攻大陆既不正确又不现实……”

文龙当即遭到席凯的拳打脚踢，被关进了国民党军事监狱，由“娃娃军官”转而成为“娃娃政治犯”。

在监狱里，文龙受到了严酷的迫害，狭小的黑室没有床，连伸一伸手脚都要受到限制，只能卷曲成一团蹲着，也没有任何食物供给。文龙事后感叹道：“我当时迫切希望能有一面镜子，好照一照自己是人还是鬼。我也深深感到自由是那么有价值，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那么重要。”

经友人高一祖向海军陆战队司令周守汾说情，文龙获释出狱。但周守汾严令文龙向席凯道歉并承认错误。文龙说：“我只服从公理和正义，绝不向邪恶低头，官可以不当，错坚决不认。”他直接去了台湾。

文龙到了台湾，因他是文天祥的后裔而引起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先后3次召见文龙，每次都让专门的摄影师为他们拍照摄影，以示垂青与厚爱。他选拔文龙为台湾国民党总部青年运动领导人，并经由蒋介石亲自批准，选送文龙到阳明山革命与实践学院去“深造”，准备委以重任。但就在这期间，文龙以青年运动领导人的身份，召集高等院校学生代表每周开一次座谈会，讨论蒋介石反攻大陆及美国是否支持反攻大陆的问题。每次的讨论总结都对反攻大陆持否定态度，有悖蒋介石让文召集讨论的初衷，蒋介石大为失望。在文龙从革命与实践学院“深造”完毕后，蒋介石不仅没有提升他，反而把他冷落到



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会见文龙

台湾动力公司，充作法律顾问。

1953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生访问台北，公开讲话表示，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文龙十分欣喜，终于找到了不支持中国内战的美国领导人。他冲破重重阻碍，违背蒋介石的严令限制，转弯抹角，想方设法私自拜访了尼克松，谈了自己的想法，并称赞尼克松的态度会挽救中国人民。这之后，文龙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抓住一切机会宣扬和平。

文龙终于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列入了“黑名单”。

文龙再也无法在台湾呆下去了。1956年10月10日，文龙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台湾，直奔美国。这年，他年届25岁。

侨居海外不忘根 去职别妻志犹坚

文龙到了美国，先后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5所大学学习，均获得不同学科的硕士学位。曾在美国许多公司担任专业会计师、审计长和《新光大报》总

编辑之职。这期间，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任尼克松政治外交顾问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总部主席等职的经历。

1962年10月10日，尼克松为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而赶赴洛杉矶新唐人街。时任洛杉矶《新光大报》总编辑的文龙，将他在报上呼吁亚裔公民支持尼克松任州长的文章送给尼克松，并与尼克松进行了诚挚友好的对话。在交谈中，文龙预测说：“目前不利因素很多，这次竞选成功的可能性很少，但我坚信，你将来会成为美国的总统。”

尼克松略显诧异：“你凭什么这样看？”

文龙说：“从1953年我们第一次会见时，我就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素质、毅力和自信，有开拓性的创造意识，更有把理想付诸现实的能力。所以我相信，你不仅会成为总统，还会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你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成为红色中国的尊贵客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道，打开北京与华盛顿僵局的突破口，从

而改变世界的格局。”

“这有可能吗？”尼克松问道。

“可能，肯定可能。”文龙十分认真地说：“先生不赞成蒋介石反攻大陆我是早就知道了。我想先生也一定早已看到了这个问题：中国需要美国的资本与科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美国也需要中国广大的市场以保持制造业和工业不断地运行。从政治利益讲，美中联合起来有助于美国对苏联的制约，共同携手维护世界和平。”

尼克松同意地点了点头：“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将来应当改善。只是双方的政治观点差距太大了。”

文龙说：“人与人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美国与红色中国也应该没有永远的仇恨。政治和外交都是这样，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你到中国去，肯定会受到8亿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文龙还谈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看法，认为那是个自私自利、效率不高的小集团，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认为美国支持台湾、热衷于搞“两

个中国”是极不明智的。

在一片仇华的氛圍中，有文龙这样见解的美国侨民可谓寥寥。尼克松听后动感情地说：“我爱中国人。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访问古老文明的中国首都北京。如果我不能的话，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到那里去。我也相信肯定会有这一天的。”

见解的沟通加深了尼克松与文龙的感情，也坚定了文龙对尼克松的信念和支持，不为别的，就为了祖国的和平昌盛，他也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尼克松。这位英雄后裔的祖父——清代翰林文玉堂曾对他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汝长大成人，要为中国作件大事。”他也正是遵祖训干的，他把支持尼克松进而推进中美关系放在了首位，以致后来出任尼克松的政治外交顾问和尼克松总统竞选总部主席之职。

在美国，尼克松的政治形势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好的，在尼克松处于政治劣势的情况下支持尼克松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于文龙对尼克松毫无保留的支持，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外国

学生顾问曾严厉地警告他：“你再错误地为尼克松竞选东奔西跑，摇唇鼓舌，我将请求美国外国移居入境管理部门，将你驱逐出境。”这个顾问拒绝延长他的学生签证，不允许他继续上大学，更有甚者，他在报上支持尼克松的诗文惹怒了他的上司，被强迫辞职。菲薄的失业保险金不足以维持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生活，帮助组织支持尼克松又没有任何经济收益，而这事又恰巧出现在本来就有政治分歧的家庭中。他与妻子胡玉洁博士离婚了。文龙只好带着年仅8个月的儿子议青移居他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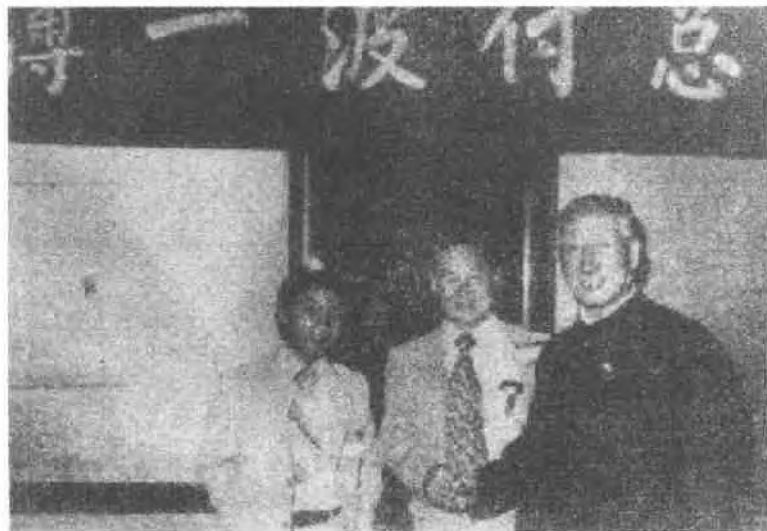
尼克松知道文龙的坎坷经历后，给文龙寄来了钱，并动情地写道：“我十分感激你的诗文，你的友谊和支持是我勇气和力量的伟大源泉，我要争取胜利！”

在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文龙为尼克松在各地巡回演讲、辩论，他的诗歌《尼克松又爬起来了》在美国引进轰动，取得了强烈的反响。

尼克松竞选成功了。他在就任总统后的1968年12月给文龙寄来一张全家福照片，并在信中写道：“我让你知道我由衷地感谢你给我选举所做的成功工作。我偕夫人向你致以圣诞和春节的良好祝愿。”

出谋划策重书历史 呕心沥血再建伟业

据资料统计，自1962年到1972年的10年间，文龙与尼克松两人彼此互通的信函整整有100封。他们时常交换着世界大事的看法和意见，其中谈得最多的便是白宫、北京与台北的三角关系，文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谋略更是经常得到尼克松的采纳。



薄一波会见文龙父子

1970年10月13日,文龙经过6个月的分析研究、深思熟虑,向尼克松总统提出了11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解开与毛泽东交往的途径”。他建议尼克松“派遣你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作为你的代表,经由巴基斯坦这条秘密通道,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雅亚堪,与中国政府接触,然后飞越喜马拉雅山访问北京,为你访问北京作好充分准备。”

尼克松总统收到文龙的建议后,曾经4次写信答复,几乎文龙的每条建议都被采纳接收。这年11月18日,尼克松在给文龙的复信中写道:“从你关心的问题看,我相信你会从我寄来的资料中获得答复,这是一份有用的东西。”文龙打开一看,尼克松寄来的是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文龙扶图激动不已,他的眼热了,因为尼克松的巧妙回答告诉他,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就要翻开了,历史就要重写。

8个月后,基辛格果真转道巴基斯坦,在雅亚堪总统的帮助下飞越喜马拉雅山,抵达北京。在北京,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双方共同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公告。

联合公告发布后的一个月,文龙收到白宫总统助理史密司代表尼克松的回信。信中说:“总统要求我感谢你。他十分赞赏你的胆识和谋略,以及你的奉献精神,并恳请你协助他继续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美中发表了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曾被认为不可能、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这样历史性地出现了。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发布中美建交公报。



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在这之前的1978年11月16日,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偕夫人前往洛杉矶看望文龙先生,一起讨论中美关系。柴大使盛赞文龙先生为促进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政策作出的重大贡献。1980年9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首次访美,也接见了文龙和他的儿子文汉青。

作为中美关系由敌到友好的过程的见证人,文龙撰写了一部名叫《龙象携手》的传奇文学。书中的“龙”是指中国,“象”是指美国,《龙象携手》记叙了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行的中美建交艰难而又微妙的历程,也体现了一位龙的传人刚毅诚直的性格和对和平的追求。书中附录了许多未曾公开的珍贵文献。这本书于1984年1月由纽约优越书局出版发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玛利亚·哈尔丽斯夫人称赞《龙象携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奇文学,值得世人认真阅读欣赏。

尼克松先生去逝了,在他去逝后,美国举行了少有的隆重追悼仪式,以纪念他在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重要作用。64岁的文龙先

生还在大洋彼岸为中美友好关系不懈地努力着,依旧那么执着。用他祖辈文天祥的话说,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为中国作件大事”的祖训激励着他。他多次给他在大陆的亲戚的信中引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过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也以此鞭策着自己。

(责任编辑:刘文)

邮购启事

近日接到几位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当地邮局不能订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3.20元,全年38.40元,免收邮费。

本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联系人:杜习

电话:6076801

国际主义战士谢唯进的悲壮历程

● 王梦岩 孙玉珍

他是周恩来、朱德的战友，为反法西斯，义无反顾的投入了一场国际战争。在西班牙战场上，他统率的炮兵创造了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事迹，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投降主义者出卖了革命。他带着伤走进了集中营，在苦难中回到祖国。文革中他被定为“国际特务”。面对一场新的磨难，他再也没活过来……



国际纵队炮兵政治委员谢唯进

1936年春，西班牙人民阵线执政后，实现了民主改革，五个月内，农民分得712,000公顷土地。工人们开始拥有更广泛的言论、集会、示威游行的自由，劳动人民的

政治地位得到改善。

正在扩张领土的德、意法西斯，把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看成是共产主义“筹划世界革命”的开始。他们支持佛朗哥的右翼反动集团，组织了“西班牙军事联盟”，阴谋武装推翻新政府。

战争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德共的卡佩娜·安娜（医学副博士，后来她成为谢唯进的妻子）等，都处在比往日更加繁忙的反战宣传之中。他们已清楚地看到，制止这场战争很难了，墨索里尼给佛朗哥慷慨援助1万支步枪，2万颗手榴弹，200挺机枪和150万比塞（西班牙货币单位）。希特勒也拿出了大量给养，并保证随时提供各种军事援助。觉醒的世界各国人民纷纷捐物捐款，组织志愿军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之战。

谢唯进决定走向战场，他去西班牙国际纵队参战的请求立刻得到批准。共产国际书记处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批准谢唯进去西班牙国际纵队参战的同时，还给了他一项重要任务，要他先到英法等国的动员华侨、留学生去西班牙参战。

眼下，谢唯进必须在几天内把在德国的一切职务都辞掉，他得先召开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会议，重新选举新的支部领导人；他和朱德、孙炳文等，曾在这个支部一起

共事，一起学习。朱德和孙炳文是1924年在德国哥庭根大学、柏林大学的同学，又是他入党介绍人……今日要离开这十余年沥心沥血的各个工作场所，心情是复杂矛盾的。

卡佩娜·安娜参加了德共中央组织的医疗救护队，已先于谢唯进赴西班牙。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叛乱终于发生了。谢唯进来到法国华工领导人中间。当他走进会场一看，不少是他十多年前留法的学生，今日相会却不同往常，有点像当年留法时确定人生道路的选择那样重要，心情也格外激动。谢唯进告诉朋友们说，希望大家共同做好动员华侨的工作，请告诉他们，中国正在打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全国总动员啊！抽不出人远涉重洋来支援西班牙人民。但是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可以去，有组织地去，个人去都可以。我拜托各位了。

谢唯进在法国还走访了一些过去不相识的旅法华侨青年，不少人表示愿意去西班牙参战，愿意捐款捐物支援西班牙人民。

谢唯进又急匆匆地赶到英国，应当说是旧地重“游”了——十多年前，他留法勤工俭学时来这里学了三年的军事技术。

令人欣慰的是，英国人民已经掀起支援西班牙热，街头巷尾许多青年、老军人举着标语牌，上书：招募去西班牙人员。

在英国的中国侨民中，正在组织赴西班牙的参战人员，谢唯进分别会见了他们。英国对他来说有着难以忘怀的时日……那不尽情情的、严酷的军事训练生活、煤矿考察……在这个古老的约克郡，1922年夏天，他还写了《赤俄最近之经济状况》，文中提出反对干涉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今日西班牙

的形势多么像当年的苏联啊，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全世界人民支援西班牙！此文发表在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主办的《少年》第二号，当时正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主持旅欧支部时期，文章是他们之约而写成的。

他会见了理斯顿教官。十多年前师生的情谊，不管时间多长都是永存在的。当年他那样严格地要求中国未来的将校，今天总算得到一点心灵上的安慰。

谢唯进离开英国那天，还去看了他的前妻、在英国学英语的老师莎丽，以及约克郡煤矿的一些英国工人朋友。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谢唯进一回到巴黎，便乘火车前往西班牙。

二

处于战争状态的西班牙，国土沦丧，人民悲号，整日东奔西跑，躲避战争灾难。谢唯进经过三天三夜的步行，终于赶到了阿尔巴塞特城。

这个小城和中国的大镇子差不多。接见他的人是国际纵队最高领导人马尔蒂，他是法共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还有一位是加诺——即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路易吉·隆哥，也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两个人他虽然没见过面，但他是熟知的。马尔蒂年青时当过黑海水兵，性格刚烈、暴躁，后来他被捕判处死刑，通过国际声援被保释，成为法国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

他们在指挥部前的草坪上席地而坐。

“我们欢迎您的到来，您的多国语言可有了用武之地，国际纵队欧洲人最多，您的英、法、德、俄语是一把金钥匙，用它去打开军事、政治思想工作的‘锁’吧。”加



国际纵队纪念章

诺高兴地拍着谢唯进的肩膀说，“再有，您过去在英国学过军事，懂炮兵，好好施展你的本领吧！”

加诺又说：“您先到共和国军第三十五师工作，负责指挥重炮队。共和国军方面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已经多次请求，无论如何给他们派个懂炮兵的领导者，您去太合适了。”

“我完全同意，明天就去上任，渴望战斗已久了。部队在什么位置？”谢唯进急切地说。

“不要急嘛！这个部队是属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领导，他现统管军队。”马尔蒂笑了笑，谄谄地说，“不过您去了那是暂时的，等我们炮兵纵队开始组建你就得回来。”

谢唯进、加诺和马尔蒂举着咖啡杯子合唱起国际歌，三人三国语言的歌声，飘荡的草坪上空……

谢唯进终于在一家野战医院找到卡佩娜·安娜，战地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畅叙了一夜。

谢唯进和带路的参谋扬鞭策马上路了，马跑得很快，谢唯进知道卡佩娜·安娜肯定在医院的洞口望着他。为了证实这个想法，他迅速地回头张望了一下，果然，卡佩娜·安娜左手放在额前遮阳，站在小山上的洞口前目送他。他扬鞭挥手再次向她告别：“快回去吧！”她那熟悉的笑脸，婀娜多姿的身影，似乎又出现在他的眼前。多年

来，她的影子总是在心灵中驱逐不掉，谢唯进颠簸在马背上，完全沉浸在对女友的眷恋的感情之中。

卡佩娜·安娜此刻也思绪万千，她同情这位兄长，自从他离婚后，一直带着儿子孑生过着鳏居的生活……已经看不见谢唯进的影子了，心中一阵愁苦袭来。她的离愁别绪还表现在希望和他永远不分离……刚才在马上的瞬间回眸，虽是短暂的，她已了解了他的千言万语……

三

谢唯进率共和国军三十五师重炮队来到马德里，这里的保卫战已进行三个多月了。共和国军只有少数民军组成的部队，训练装备都很差，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参战。在敌人技术装备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残酷。但是整个马德里前线，共和国军的一兵一卒，都在浴血奋战。

“快开炮，快开炮！……”民军指挥部打来电话，要求重炮队迅速集中火力，压制敌人的炮火，阻止敌人步兵的进攻。

谢唯进深知这个军中之神——共和国军唯一的重炮队——在战斗中的巨大作用。当他一受命组建这支重炮队时，便按照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指示，加紧训练部队，首先抓组织指挥，利用战斗间隙，把各级指挥员训练了一遍。

敌人的步兵、骑兵都很嚣张，他们依仗天上有飞机，地面有强大炮兵火力掩护，如入无人之境，发疯似地一古脑向共和国军阵地涌来。谢唯进下达命令，一阵猛烈的炮火把摩洛哥的骑兵打退了。他拿起望远镜观察，敌人骑兵死伤足有百十人；负伤的战马嘶叫着在田野里乱跑哀叫。

由于战斗的特殊性——城市巷战、近战频繁，谢唯进临来重炮队任职时，便向何塞·迪亚斯请求配备一个游动火炮营——即轻炮营。

轻炮营各分队忙碌起来，在预设阵地上突然射击，炮弹呼啸着飞向敌人楼群的火力点，物资仓库和摩洛哥骑兵冲锋的先头部队，打得敌人人仰马翻，辎重起火。

谢唯进在指挥炮战的同时，常常想到中国战友——在英法见过面的一些人和来自其他国家他没见过的中国人。这时也许和他一样，也在浴血奋战呢。在西班牙战场上怎么能没有中国人呢？要是能调集到一起，成立一个中国战团、或中国支队，这样语言相通，生活习惯一致，打出响亮的中国战斗团体的旗帜，更是显出祖国的骄傲啊！他开始不断地打听他们的下落。

迪亚斯特地来看望谢唯进。

谢唯进只和迪亚斯见过两面，而且都很匆忙，但却给谢唯进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30刚出头，却显得非常成熟老练。一见面，迪亚斯像孩子游戏似的，把一封信一会藏在身后，一会举过头顶：

“猜不到吧，您的女朋友，很要好的女朋友。她把信交给我转给您。”

“是卡佩娜·安娜？”谢唯进失声地说。

“瞧瞧，从你说话的声调已经证实不是一般的朋友。”谢唯进的党组织关系已转到了西班牙共产党总部。这位总书记的玩笑使他倍感亲切。

“还要告诉您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这是您最关心的事情。”迪亚斯很高兴地说，“又有不少中国同志来报到了，有些人在打听您，看

来和您很熟。”

“是些什么人？”谢唯进迫不及待地问。迪亚斯从皮囊里一个文件袋中抽出两页纸交给谢唯进：“有机会见见您的同胞吧，我已经把您的部队番号告诉他们了。战争中能会会祖国亲人、战友，是很幸福的，我也替您高兴。我现在还不走，您赶快给卡佩娜·安娜写封信，我会托人带给她。”

还是迪亚斯想得周到，谢唯进匆匆看完卡佩娜·安娜的信，这哪里是信，是张小便条。内容很简单，告诉他，她已从后方医院安置完伤员，返回沙莱洛国防军医院，望他多保重身体。战争环境能有只言片语就很好，比平时“洋洋万言”的书信不知要珍贵多少倍。谢唯进也写了个便条作为回信，他告诉她战斗激烈，安全无恙……这是她最关心的，最后祝她安康……

送走了何塞·迪亚斯，谢唯进仔仔细细地开始看中国同志的名单。

名单反复看了几遍，其中有六人是1919年坐一条船一起来到法国的。刘景田那么大岁数也来了，真叫人感动。名单最后还有一行小字：个别分散来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现无法统计，人数不详。他完全相信，肯定还会有中国人来西班牙参战，不仅是欧洲的中国人，也许美洲的中国人也会来呢。庞大的华侨、华人，会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西班牙人民遭受的苦难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同情，法西斯的野蛮行径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痛恨！

来了新的中国战友，组织中国战团的愿望更强烈了；但他——一个重炮队长，战斗还在等待自己呢。

共和国军的阵地失守了，敌人完全控制了托莱多地区——距马德里50至80公里的地区。重炮队

接到命令，向马德里市区撤退。

转移途中，共和国军总部传令兵送来何塞·迪亚斯的命令，命令谢唯进火速赶往国际纵队接受新任命。

谢唯进这么快调回国际纵队，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居然当上了炮兵纵队政治委员。马尔蒂和加诺向他解释为什么要他做政治委员，不容反驳的理由是：炮兵纵队有50几个国家的同志，欧洲英、法、德的同志居多数，部队虽然有少数翻译，但每个翻译并不通晓几国语言，不如您这个懂得多国语言的政委工作更方便。直接交待任务，宣布命令，大会小会讲话，下部队了解下情……收效更大。这就是国际纵队的特殊性。再说，政委也同样要指挥战斗。

第一次发挥他政治委员作用，是率领部队进行参战前的宣誓活动。他到英、法、德等国同志集中的连队，也到混编连队（一个连队有几十个国家的同志），布置宣誓会议的内容和会后讨论题的内容。谢唯进和干部、战士谈话，充分显示出他会多国语言的方便之处，乐融融地欢声笑语，谈笑自如。指战员很快了解了宣誓和讨论题内容，以及上级要求的意图。

宣誓那天真是热闹非凡，全支队在支队领导率领下，肃立在一座中学的操场上。宣誓大会开始，由谢唯进和司令员伊戈纳朵夫带领宣誓：

我自愿来到这里，如果需要，为了拯救西班牙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我将献出自己全部的，直至最后一滴血。

几十种语言宣誓的声音，震撼战云密布的马德里上空。千万只铁拳小树林似地举起来了……

在这个特殊的部队，谢唯进不仅仅是做政治委员分内的工作，连



谢唯进（左一）和他的战友们

各支队里因语言不通出现的问题，也要他去亲自解决。一次翻译用英语给部队传达文件，结果不懂英语的战士问这问那，比比划划说听不懂，谢唯进见这情景，只好把同种语言的战士暂编在一起。分别用法语、德语、俄语给他们传达文件。还有少数战士，他们是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奥地利人……看不懂文件，有的还是文盲，他们急哭了，找到长官，要求很简单，只希望能听懂上级讲的什么？于是，谢唯进率领翻译，找到他们本国懂得外语的战友，给他们一点一点转译过去。这可忙坏了政治委员谢唯进，他一个战士一个战士的检查，直到他们完全了解了上级的意图为止。由此，他获得一条经验：他们了解了上级的指示精神之后，思想进步更快，工作更积极热情。

炮兵纵队进入战斗后，繁重的联络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谢唯进头上。他简直成了翻译头，带领翻译同志去友邻部队、或者同步兵单位来研究协同作战问题。林肯支队、季米特洛夫支队、李斯特支队、巴黎公社百人团、台尔曼支队、步兵十一、十二、十三纵队等单位都

不断派人来接谈。

四

已是1937年2、3月了，春天带给人们的不是万物充满生机，而是更加残酷的大战来临。1936年岁末，佛朗哥叛军和德意入侵军以巨大的伤亡，占领了一部分共和军和国际纵队的阵地后，很快推进到萨曼纳雷斯河岸。由于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狙击，使敌人强行渡河突入市区的企图未能得逞。正面攻击失败后，敌人改变了战术：包围马德里。主要由意大利远征军（四万人）来实施。

战役开始不久，共和军在瓜达拉哈拉的防线迅速被意大利远征军突破……情况危急，意大利远征军不仅有上万人的步兵，还有200门大炮，120辆坦克，90架飞机投入战斗。共和国军部队加上国际纵队少数部队，总共不超过15000人，没有飞机和坦克配合，尽管英勇顽强，怎抵御得住意大利远征军的攻击。意大利远征军已向马德里城郊推进！炮兵纵队终于经过两天一夜的艰苦行程，到了瓜达拉哈拉战场。炮兵纵队展开了战斗队形，对准敌人屯兵点、仓库、坦克群、炮



谢唯进（着大衣者）在掩体前早餐

阵地、后勤运输队伍、临时机场。公路上意大利远征军自然逃脱不了炮火的轰击，他们预定通过的桥梁被炸断，等待过桥的步兵又成了炮击的目标。炮兵还组成密集火网，封锁敌步兵进攻的道路。共和国军第四军的队伍冲上去了，为了战争的胜利，又调来了飞机和坦克（原计划没有飞机和坦克参战）部队投入战斗。坦克部队为第四军开路，飞机在天空助战。骑兵团的士兵挥舞着战刀，赶过了坦克超过了步兵，直插已被炮兵打瘫痪的“利托里奥”机械化师的背后，拦住了他们的退路。

“利托里奥”机械化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共和国军的骑兵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彻底溃退了，丢下了几千支步枪，200多挺机枪，30多门大炮，30多辆完好无损的汽车，以及子弹、炮弹、被服和其他军用物资。

在整整10天的战斗中，国际纵队的炮阵地一片火海，牺牲的炮手和负伤的战士近三分之一；有的火炮被敌人炸毁，变成一堆废铁。营、支队和纵队指挥员重伤五人（2位副营长、1位营政治委员、支队副司令和纵队副参谋长各1

个），牺牲一人（支队副司令）。

敌人开始增援。这天晚上，炮兵纵队接到新的战斗命令：即刻紧急转移。在转移途中，被敌机发现目标，实施轮番轰炸。炮兵纵队损失了十几门火炮，谢唯进头部受了重伤。在担架上，谢唯进很懊悔，不管战争多么残酷，不管有多少客观理由，在行军途中受这么大损失，总是令人十分痛心的。国际炮兵纵队的装备来得容易吗？现在补充一点该有多困难哪！海上和陆地的封锁，运进西班牙一点物资真比登天还难！国际纵队的每一个指战员更是宝贵的财富……

谢唯进住进了国际纵队医院。由于骨片没有取出，导致他头疼不止。为了抑制头疼，他专心学西班牙语。

一位白衣战士戴着大口罩站在谢唯进的病床前：“负伤住院就要像个伤员的样子，好好休养。”白衣战士拿过他手中的西班牙语辞典，以女性特有的尖声说：“将军也要作表率呀（他住在单人高干病房），首长更应遵守院规。”

他抬眼看了看她，惊愕了，失声叫道：“卡佩娜·安娜，您怎么来了？”

卡佩娜·安娜摘下大口罩坐在床上大笑起来：“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被您的‘敌人’欺骗了吧？”

谢唯进动情地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您调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昨天刚调来，怎么告诉您？”卡佩娜·安娜在他脸颊上轻轻亲吻了一下说，“今晨才听主治医师说你在这儿住院，马上赶来看你。”

“谢谢！”谢唯进也礼节性地亲吻她一下，“您可是瘦了，黑了。”

“你呢？比我还瘦！”卡佩娜·安娜充满怜爱地说道。

“你老是偏头疼可不是好事，我明天给你检查，主治医师同意了，他也参加。”

“我的伤不重，和我一起来的炮兵纵队的有20多名伤员，都比我重，还是好好给他们检查治疗一下，我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很快就出院。”

“急什么，耐心地等待吧！”

卡佩娜·安娜见他情绪不佳，建议到户外活动活动。

野战医院驻在依山傍水的小镇，有百十户人家被医院占用，作了病房和手术室。

卡佩娜·安娜半搀扶着谢唯进的胳膊蹒跚而行，无言地享受大自然无私赐予……

经过卡佩娜·安娜和主治医师检查，谢唯进头部有骨质碎片未取出。找到了头疼原因，决定马上手术。原来的主治医师很客气地把主刀的任务让给了卡佩娜·安娜，卡佩娜·安娜也不客气，欣然从命。

手术效果很好，伤口一星期就愈合了，头也不疼了，经他再三请求，同意他出院。

出院的前一天，谢唯进又去看望在这里住院的炮兵纵队的同志，向他们辞行，安慰他们好好养伤，

不要急于出院回部队。他又给国际纵队总部要电话，请求允许他去沙莱洛医院收拢中国同志去炮兵纵队的事。马尔蒂欣然同意，他对谢唯进说，炮兵纵队在马德里战役中伤亡很大，很需要补充；如能在沙莱洛医院动员中国同志，不仅中国同志，各国同志都行，炮兵纵队太需要士兵了。

谢唯进带领 87 名干部战士——英、法、德、意人居多数，和 5 名中国同志——来到马德里市区马德里医院附近炮兵纵队司令部。

谢唯进简直是带来了 80 多颗明星，给部队增添了活力，带来了生机。

谢唯进一回来就投入了战斗。

共和国军部队、国际纵队战士和西班牙志愿青年男女民兵，在楼房、住宅、商店和敌人周旋、争夺。敌我步兵近战，炮兵便无法支援了，只能远距离拦阻射击。整整三天三夜，谢唯进和司令员伊戈纳朵夫坚守在指挥所。

共和国军步兵和国际纵队步兵不断打来电话：

“炮怎么哑了？混蛋！吃安眠药了？！”

“敌人从二楼楼梯上来了，快开炮呀！”

“……”

两位领导人像万箭穿心，痛苦的互相对望着。

“想个什么办法吧？”谢唯进说。

“什么办法？大炮能冲锋？”

在这紧急关头，伊戈纳朵夫和谢唯进把炮手们组织起来，拿起步兵武器，亲自率领他们冲到楼前，向一、二层楼的敌人开火。在三、四层楼的共和国军步兵也紧密配合，从楼窗、楼梯往下射击投弹。敌人腹背受敌，慌了手脚，很快失去了

战斗力，退却了。三、四层的同志一边射击一边高喊着：

“感谢炮兵同志的支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

大楼战斗结束，救出了国际纵队四十五师的一百多人，他们背负着伤员向炮兵纵队指挥所转移。

三百多米的路段仍不断有人牺牲。谢唯进和司令员又组织抢救伤员和处置牺牲的同志。

战争已经造成马德里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电车上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用来为战争服务，收容运送伤病员或物资，运送牺牲人员尸体抬到车上一具具摆起来，血水顺着车厢流淌……人们已经没有了眼泪，庄严地在做着战争中的一切工作……

五

国际炮兵纵队行动神速，顺利地转移到新的预定作战地区。火炮一进入阵地便投入战斗，我步兵在强大炮火掩护支援下，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已无力反击，只有狼狈逃窜。国际炮兵纵队发挥了快、准、猛的特点，打得好，协同配合得更好，受到共

和军总部和国际纵队总部的表彰。还获得西班牙共和国颁发的“国际纵队纪念章”。

谢唯进和他带领的中国同志，比其他国家的同志多了一层更大的喜悦：国际纵队总部转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给西班牙人民和武装部队的信：

西班牙人民及武装同志们：

我们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认为西班牙政府现在所领导的战争，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战争，这个战争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民族的生命，也是为全世界……我们很喜悦地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其间（指国际纵队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作者注）。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参加你们的战争……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眼前有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你们队伍中去的。一个时辰，每一个日子的斗争经过，为你们的一切胜利而欢欣鼓舞。我们相信，最后胜利一定是你们的。

毛泽东

1937 年 5 月 15 日于陕北延安

毛泽东这封热情的信，相隔千山万水遥遥几万里传来，令人心潮难平，感到极大的欣慰。整个指挥



在突破敌人防线埃布鲁河时，谢唯进（看炮对镜者）在指挥作战。

所欢腾起来，围着政治委员拥抱握手，表示他们的热烈祝贺，向谢唯进表达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谢意。

谢唯进心情更难平静……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已辗转20年了，虽然在异国他乡，但这颗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祖国，1925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整个生命属于党了。当时正赶上苏联十月革命刚胜利，由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封锁，经济上十分困难，物资奇缺。他们都把自己做工赚的钱拿出来支援苏联，还在华侨中募捐。当年在北京的吴玉章和王维舟，于安市场召集几百青年学生，开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面捐款几万元。把钱换成物资运往苏联。后来，王维舟又到上海采取同样办法，又募捐了几万元。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分在苏联访问，毅然把自己心爱的金壳怀表拿出来捐献。现在中国人民对西班牙的援助和支持多么像当年啊！人民的心永远是相通的，永远休戚与共。

六

由于指挥失误，国际纵队的炮阵地大部被摧毁，步兵也受到重大

损失。部队指战员怨声载道，士气低落。

谢唯进和伊戈纳朵夫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此刻他们正在基层做思想政治工作，部队战斗情绪向好的方面转化，使他们安定了些。他们刚回到指挥部，指挥部也被摧毁了，司令员被弹片划破了臀部。谢唯进更大的担心是：这一仗部队的伤亡绝非一般的严重，几百门大炮现在还有多少能发射？连队还有多少战士能战斗？……这时，俄罗斯人副营长来电话报告：他们那里火炮和人员伤亡很大……谢唯进让刚负伤的司令员守在指挥所，他带上警卫员来到俄罗斯人副营长所在的一个连队。他明白了，连里的几个干部牺牲了，俄罗斯人副营长正在代理连长组织战斗。

“各就各位，准备战斗！”谢唯进高声喊着。政治委员的模范作用振奋了士气。

副营长复诵了谢唯进的命令后，负伤的炮手，弹药手、观测手迅速进入自己的岗位。

“预备——放！预备——放！”谢唯进的声音传向支队的每一个连队。

支队在几公里的战线上近百门大炮同时动作，火光闪耀，炮声

隆隆。

前后不到半小时的炮火轰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的步兵很快冲了上去，把埃布罗河以南进攻的敌人打退了。

急剧恶化的形势给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带来的是——撤退到埃布罗河以北的梅基南萨和昂波斯塔，这里是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坚守的地区。

长长的撤退队伍中，有炮兵、装甲兵、步兵以及后勤辎重部队；有多少部队？谁也说不清。撤退的队伍中不光是军队，还有无家可归的西班牙人民。有些老弱病残妇孺干脆就坐在炮车上，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决心跟随部队——最可靠的人行动了。谢唯进前后张望了一下，不光是炮车上，后勤辎重部队，装甲部队的车辆坦克上也坐满了逃难的老百姓。饥饿所至，一些人还周身打颤，在炮车上哀号。公路上、田间小路上还有成千上万步履艰难的群众，他们当中有的昏倒在地下再也爬不起来了；各种肤色的人，各种语言声音，嘈杂混乱交错于天地间……

悲惨和愤怒的情绪，无时无刻地在撞击谢唯进的心，撕扯着他的肺腑。谁能对这种场面、声音、情绪不有所动呢？

行进间，卡佩娜·安娜找来了。

俩人的心情是一样的，有好一阵沉默，好像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战争形势极度的恶化，带给他们的是极度痛苦。卡佩娜·安娜完全变样了，脸色变得灰黄没有一点血色。

“队伍拖累这么多老百姓怎么行？”卡佩娜·安娜望着谢唯进的样子——胡子老长，两腮塌陷，眼窝很深，整个人变成瘦弱的小老头——“看你……”她说不下去。从



谢唯进在医院与南斯拉夫伤员在一起

背包里拿出饼干，从肩头上拿下水壶递给他，强制他吃两口饼干，喝两口水。

“有什么办法，跟着部队安全，他们不愿意离开。”

“留给我们医院吧，先收容伤病员、老人和小孩。”卡佩娜·安娜毫不犹豫地，说：“我现在就去和医院领导商量商量去。”

“你是大救星，我正想不出办法呢。”谢唯进一展愁眉笑道，“福从天降，谢谢你这位女神。”

“你呀，刚才那愁云密布的脸色真吓人。”

“这事你无论如何得办成，否则我非生一场大病不可！求你了。”

卡佩娜·安娜又瞧了瞧他，关切地说：“我没想到你身体会这样坏，要乐观些，少想些不愉快的事。还要时刻注意身体，保护自己……”

“哎！……”谢唯进长吁短叹一声后说：“国际炮兵纵队伤亡过半，已经撤销了纵队建制，我和伊戈纳朵夫只分头带队伍，各自的部队最多一个团多一点；大炮损失也近半，兵源补充不上，武器装备和弹药哪儿也领不到呀。我手头只有两千多同志呀，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能安生吗？”谢唯进这些话也许压在心底太久了，压得他快要窒息，今日见到亲人不吐不快呀。他揩了一下流到脸颊上的泪水，“……他们都是各国派来的好同志、优秀青年……他们长眠在异国他乡了，我……我作为指挥员，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的祖国，对不起他们的父母……当然，这是战争……，我只是幸存者……”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但他不能，队伍和西班牙逃难的群众就在他的身前身后。

“别太感情激动，你也负了伤，指挥战斗是你的责任，战争必然会



谢唯进（左4）和西班牙共和国飞行员在一起

有伤亡……”

谢唯进从左胸上衣兜盖上取下“国际纵队纪念章”递给卡佩娜·安娜：“你替我保存着吧，医院总比我们安全些。”

“你还是带在身边好，这也是你的光荣纪念。”卡佩娜·安娜笑着又把纪念章推回去。

“它太珍贵了，我怕战争中遗失。这是多少战友的生命换来的呀！我还要接受更残酷的战斗，还是你替我保管着好。如果我还健在，什么时候拿起它都会想到那些和我密不可分的牺牲了的战友——”谢唯进说完，把纪念章又送到卡佩娜·安娜手中。

安娜收好纪念章，心头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敬佩之情。他心地那么善良，那么爱人——他视战友为知己，死者叫他撕心裂胆，他为整个西班牙共和国都在流血而痛心疾首。卡佩娜·安娜盯着他那怒不可遏的冷峻面孔，她有些害怕。但她明白，这也许就是军人的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行为定式：爱和恨，大爱和大恨……也许就是此刻，他表面默默无语，内心却浪涛滚滚，想着下一仗如何杀向敌人、为人民、为战友报仇！你看，他

往日那学者的气质，和蔼可亲的面容，已经完全消失了。

卡佩娜·安娜似乎也有说不尽的心里话要对他讲。医院里有多少伤员死在手术台上，死在担架上，死在病床上，死在转运途中啊！他们在死前的一刹那还那样眷恋人生！这些国际纵队的战士，当他们还清醒时已经知道回不了祖国了，把早已写好的家乡地址收信人，委托医护人员代他邮寄只言片语、或者一点信物、或者一点纪念品……这不是邮寄的普通信件，是邮寄的一颗千山万水情相依的心啊……但卡佩娜·安娜没有向谢唯进说这些，怕刺伤他本来就忧伤的心。

“我替代保管好，等胜利再戴在你的胸前回中国去！”卡佩娜·安娜为转换沉闷情绪笑道：“如果我能和你一起去中国，我也戴上它……”她指了指自己胸前同样的纪念章说：“与你同行！”

七

埃布罗河战役打响了，佛朗哥把新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和大部分后备军投入了战斗，摩托化部队，坦克、炮兵和空军都参加了战

斗行列。摩洛哥的部队、意大利远征军也参战了，德国空军占明显优势。

战争确实到了决一死战，不惜任何流血牺牲的代价，保卫西班牙国土的时刻。

谢唯进指挥战斗已几天几夜……

一道道火光掠过指挥所上空，敌人的炮弹在指挥所的前后左右爆炸；掩蔽部和指挥所内尘土和木板碎片纷纷下落……突然，一颗炮弹穿透指挥所屋顶，在谢唯进身旁爆炸；谢唯进爬不起来了，双腿血肉模糊。

谢唯进转运到卡佩娜·安娜所在的国际纵队医院——马塔罗第七军医所。不幸中的万幸算是保住了双腿，没有做截肢处理；由共和国军医院最好的外科医生主刀取出弹片、碎骨；双腿打了石膏固定。病床上最难熬的几个月——呕吐、昏迷——过去了。

“这回我可和你在一起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和你在一起了。”爱人之间在战火中难得的相会，应该非常愉快，但这次相会，没有给谢唯进带来一丝一毫的欢乐，他忧郁悲凉地说：“我恐怕很难再工作了，这双腿离开双拐不能行走，将来终生靠人供养了。”

“听我的话，”卡佩娜·安娜安慰他，“加强锻炼，配合医疗，你能好起来，你不觉得你来到这里半个多月好多吗？现在可以扶着床走两步，这不就是进步吗！”谢唯进心情沮丧地说：“中国有句古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打算申请同中国。回我的四川老家安定终生。在国外河流了几十年，也该落叶归根了。”

“你就不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了？不想带我去中国了？”卡佩娜·安娜坐在他的床边，温柔地用手梳

理他那浓密的头发，泪珠不住地滴落。

“亲爱的，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必须重新安排生活，我一个残废人，怎么能让你跟我生活在一起，无论你去不去中国，我们今后只能是好朋友——多年相识的好友。”

“不，决不！不管你将来身体如何，我决不改变初衷——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唯进，我早已属于你！如果说过去还不大愿意表露这藏在心底的话语，现在不能不对你说了。”卡佩娜·安娜感情不能自己地拥抱着他倾吐。

卡佩娜·安娜的坦诚是对他极大的慰藉，但他不能不设身处地为安娜着想，人家是医学博士，没有婚配过的女子，如何能和一个残废人相伴终生呢？谢唯进心中翻滚着波涛。

有消息传来：埃布罗河战役结束了，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伤亡8万人，更叫人气恼的是投降主义者，以西班牙共和国名义，正式决定撤出国际纵队和共和国军中的各国志愿人员；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开始“欢送”……交给一个叫“国际监督遣返志愿军委员会”管理。就是说，把在西班牙浴血苦战两年多的国际纵队的光荣战斗者，交给他们的敌人——德意法西斯和佛朗哥叛军委托的组织。这太不公平了！

1939年1月8日晚，谢唯进和300多名国际纵队伤病员分乘十几辆汽车前往沙莱洛。医护人员也十分清楚，这些人不是去更好的治疗康复，而是去受管制。他们的心难受极了，在送别时无声泪俱下……

“我请求调到沙莱洛医院去照顾你。”分别时，卡佩娜·安娜对谢唯进说，“院方大概不会不同意，他们已知道我们的关系。”

“那当然好啊！”谢唯进忧心地又说，“但是，我们现在是阶下囚啊，医院批准，上边也不一定同意。”

“不同意也不要紧，我会常去看你的。院长过去是我的老师，会照顾我的。”

“但愿如此。”

“物归原主吧。”安娜说完从白大褂兜里拿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他。

谢唯进打开一看，原来是国际纵队纪念章。他对卡佩娜·安娜笑道：“看来不会再去打仗了，自己保管吧！”他笑得很尴尬。

“你要天天锻炼，再见面时你肯定能丢了拐杖。”

“好，借你吉言，再见面我跑步欢迎你！”

汽车开动了。谢唯进从驾驶窗探出头来和卡佩娜·安娜以及其它送别的人告别。

沙莱洛位于地中海滨，从前是有产者避暑胜地。所有豪华庄园别墅变成了病房，都安置了从西班牙中部、南部、东部转移来的国际纵队的1000多伤病员。

经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锻炼，谢唯进的双腿又见好转，他能推着滑轮椅在病房走廊行走了。

一天早饭后，食堂门口贴出布告。布告通知第一批国际纵队队员130人，准备立即到退伍出国的集中地，具体地点没写。谢唯进和刘景田列在名单中，谢唯进一上午忙于收拾行装。汽车来了，按着分配的车辆顺序上车，管理人员和士兵（国际联盟监察撤退外国志愿军委员会派出的法国官员和法国士兵）催促着，推搡着：“快上车！快上车！”“比猪还慢！”“当官做老爷惯了！”“……”

不堪回首啊！当初一片热忱来西班牙，而今竟落得如此下场！

汽车行走一个多小时，抵达一

个叫卡萨德拉塞尔瓦的小镇，这里是国际纵队中、英、美和南美等国指战员的集中地。在这里喜从天降，不期而遇不少中国同志：李丰宁、张树声、杨春荣、张长官、毕道文、张书、张谋、高百格等人。这么多中国同志都相见了，真叫人高兴，谢唯进心头泛起阵阵疼痛：这是些少数的幸存者呀！谢唯进忙站起来和大家握手、拥抱。他们开了个小会，决定成立“中国支队”。谢唯进被选为队长。

“中国支队”经过谢唯进多次请求、得到了集中地当局的批准，以此，中国同志的活动便以中国支队的名义出现了。

又转移了，而且是夜间秘密进行！转移到何处？谁也猜不到。

一路上，逃难的人和撤退的部队如潮。前方公路摆满了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自己放火燃烧的汽车、装甲车、弹药车，还有数十门大炮。这情景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谢唯进的心像刀搅一样难受，许多人在呻吟、在哭泣、整个西班牙在哭泣、在呻吟……

3000多国际纵队人员，又徒步向地中海滨移动。转移没有一辆车，走不动的伤员用人搀扶。谢唯进虽然还能够走，但不能走长路，中国支队全体是他的保护人。

目的地到了，是一片面积很大的海滩沙地，周围有铁丝网围着，每隔50米左右，就有一个法国黑衣士兵持枪巡逻，十分阴森恐怖。

一个国联监委的人和几个法警来到中国支队面前，指着一个海滩沙地说，中国支队在这里造帐篷；又指了指不远处说，到那里去领帐篷和搭帐篷的材料。

修造帐篷的活虽不重，但很费工夫，沙地地表层水多松软，支柱打不牢固。这里大风天又多，据先来的人介绍，他们的帐篷有的因为

建造不牢固，被风刮跑。

中国支队建造的帐篷外加了铁条铁板固定保护；又用绳索把帐篷捆绑起来；除领来的铁棍、木棍作支架，又在森林中砍来粗壮的柳木加固。

帐篷内异常寒冷，冻得人直打哆嗦，帐篷外风声大作，刮得帐篷呼哒呼哒响个不停，地动天也摇。没多久，又来了强风，海滨人家的房屋吹倒，集中营地的几乎所有的帐篷，都遭了大劫难——全部掀翻、刮倒，在海滩沙地乱滚，在天上飘飘摇摇翻飞着；烧饭的炊具、吃饭的碗筷、刀叉全不知去向，……

重新修造的帐篷自然要比原来的更坚固。谢唯进又砍了几根碗口粗的柳木作支架，铁条铁棍石头加固帐篷底座，再用沙石埋好，简直像一座土石结构的海滨寓所。

谢唯进又召集中国支队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今后的斗争任务。会上大家发言非常热烈，主要有以下几点：关键是保持革命者的气节，不屈服不投降。还作了最坏的准备——迎接新形势下的，没有枪炮的斗争考验。

谢唯进叫张树声油印几十份小报送各国同志，揭露法国报纸的集中营如何的谣言。

英国战团同志贴了一张揭露敌人阴谋的大字报，惹恼了集中营法国哨兵用枪托把两个英国同志打伤，英国同志也把法国哨兵打伤在地。正在大家为英国同志助威时，倒在地上的法国哨兵连开数枪，把一个英国战团的士兵打死。

斗争激化了，各战团、支队都派出相应的代表，组成几百人的示

威游行队伍，向集中营总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办凶手。集中营总部也出动了几百军警，包围了游行示威队伍。各国同志决心斗争到底，不低头不屈服！在谢唯进等人带领下，高喊“西班牙共和国万岁！”“国际主义万岁！”“……”

斗争白热化起来，法国警察和士兵朝天鸣枪，喊着：“红色猪猡！”“赤匪！”“……”被包围的各国同志也不示弱。高喊：“打倒法西斯！”“打倒佛朗哥！”“德意法西斯滚出西班牙！”

这时，两个黑衣士兵上前制止喊口号，被国际纵队士兵拉进人群作人质。扬言：不撤退包围士兵就打死他们！不惩办凶手就不放人！斗争持续了一个小时多，集中营当局不得不答应撤退士兵、惩办凶手。抬走两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质。

这次斗争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余波未平。国际纵队有30人被关

谢唯进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

于巴塞罗那

了禁闭，20人被刑讯，少数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中国支队有3人被关押了3天：刘景田、张金印、张金堂，刘景田被刑讯，他是和一个负伤刚复原的瘦骨嶙峋的法国老兵一起被刑讯的，法国老兵在刑讯中被法国军警活活折磨死。

谢唯进也受了审讯，他是和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被指控为组织煽动暴乱而受审讯的。他们据理力争，驳斥集中营当局违反国际法，对国际纵队人员施行非人道待遇，……

从此，集中营增加了军警，如临大敌

针对敌人新的动向，各国战团、支队等组织秘密串通，一致商定今后的斗争要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中国支队接到法国巴黎“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信函，使馆表示：一定把你们的处境当作一件大事向政府陈述，并请求尽速解决问题。全欧侨联会并派人去交涉，务使中国支队人员，早日离开集中营回国；并告知适当的时机，他们还准备来集中营看望大家。

八

长期的囚禁衣食住行发生了极大的恐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英、法、比、德、苏、等国工会、商会、民众团体捐赠的面包、熟食、米、面、豆制品、肉、蛋、罐头，包括烧饭用的木柴和其他燃料，源源运来集中营；还有许多慰问袋，内装点心、糖果、咖啡等食品，里面夹一红纸，写有捐献者姓名、地址。

集中营当局也不得不为这种恐慌，做些燃眉之急的事：发放木板、毛毡、棉被御寒；发放些柴草作燃料。这样恐慌才算稍有缓解。

1939年4月12日，是中国支

队的喜庆日子，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赠送的锦旗刚刚传到他们手中。它是1937年夏天从中国延安托人带到上海，又由一名中国海员带到法国马赛，又几经辗转周折，1938年夏天才到了国际纵队总部。

这面珍贵的锦旗，确实来之不易。毛泽东那封信和这面锦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同志，时刻关怀着西班牙的战事和中国支队的同志。

在锦旗前，久久地注视锦旗上金光闪闪的大字：

国际纵队中国支队：

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

谢唯进、张谋、高百格比别人更为激动，周恩来是他们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算来已有十多年不见了。而朱德，对于谢唯进来说，更多一层亲切的感情，他是他的政治上的引路人啊！

中国支队同志都沉浸在幸福中，还在锦旗前照了相，谢唯进又回帐篷拿来一面绵旗。展现在大家面前说：“来，咱们再照一张相留个纪念！”这面锦旗是巴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办的法文版《救国时报》赠送的。锦旗上是一首激动人心的诗：

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与兴亡。/咱们所拚命的，/是对侵略的反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你们为西班牙，/伟大人民而受伤，/你们流的血，/是为自由种下的红光。/你们的勇敢消息，/充满我们心腔，/好比冬天的太阳。/请你们放心，/祖国的责任有我们担当。/向前创造吧！/直等到法西斯消灭，/民为

本，/有四万万同胞，/欢迎你们回故乡。/啊，何必回故乡？/看，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

大家泪眼朦朦地边读边思念祖国、亲人……这首诗传遍西班牙战场和西班牙人民中间——德国著名的工人诗人魏纳尔特曾译成德文，刊登在西班牙各报上。不仅中国战士喜欢这首诗，整个国际纵队的指战员也热爱这首诗，西班牙人民也喜欢这首诗，……

一天，谢唯进接到集中营管理处通知，说有人来访。

来访者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只把卡佩娜·安娜的信交给他。他是另一个集中营美国林肯支队的，他并不认识卡佩娜·安娜，只是别人托他捎封信而已。

卡佩娜·安娜在信中透露她要很快随医院转移到法国南部边界奥洛龙集中营，十分害怕再也见不到他，请求给她一短信。半年多不见了，很想念他，……

九

中国支队又转移了，同行的有数百人，分乘十几辆大卡车，到了一个叫乌内的车站上火车，直向法国南部驶去。

朦朦胧胧走了一天一夜，由地中海岸迁至大西洋岸之比斯开湾。

新的集中营地都是木板装成的房舍，大小均等，排列成“1”字形，横直留有隙地。各住区有铁丝网隔开，每房舍住72人，十分拥挤，屋内无电灯设备，屋外路灯是看守使用的，各房人员不能随便往来走动。中国支队驻十六号大棚。

谢唯进在这里秘密办了张《中国抗战消息报》，整日忙得不可开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9月

3日英法政府相继对德宣战。

这时，令人奇怪的是，集中营当局对各国战团、支队加紧了统治，禁令一个接一个。禁止一切政治性活动，禁止散发传单、宣传品，《中国抗战消息报》印好无法发行，只好埋在大棚地下等待时机；一天凌晨，谢唯进在沉睡中不由分说被拖下床，命令他穿好衣服，嘴里塞上手巾带出大棚。他回头一看，还有几个人和他一样被架出大棚带走。谢唯进猜定是《中国抗战消息报》出了问题。

谢唯进等人被带进一个大木板房内。

“你是《中国抗战消息报》的负责人吗？”法警用法语凶相毕露地问。

“……”谢唯进直视着。

“为什么不说话？法警暴跳如雷地吼叫道，“你说！”

“我是中国人、听不懂你的话！”

法警气得浑身抖动，两个彪大汉箭步冲到谢唯进跟前，一顿警棍劈头盖脑地打下来。谢唯进被打得昏倒在地，苏醒过来他们又朝腰、腿、臂部、头部猛踢猛打了一阵。

“说不说？你不仅会法语，还会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并且都很熟练，是不是？”法警狡诈地说，“你在国际炮兵纵队当政委，用各种语言给部队讲话，说得很流利，现在怎么不说了呀？过去对你们太宽容了！”

谢唯进被两个大汉架着，依然紧闭着嘴唇。

“那好，翻译，你把刚才的话用中文说给他听！”

翻译用中国话把法警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我是《中国抗战消息报》负责人。”谢唯进往上翘着嘴角略带一种傲气。

“还有什么人参加？一共多少人？”

“你们都抓来了，还问什么？”

“为什么在报上辱骂法国政府？”

“没有！讲的是事实，讲真话不能叫辱骂！并且我们是转载法国报纸的，你问那些报社好了！”

法警被谢唯进反问得尴尬无言，半晌才又问：“还有哪国人参加报刊领导工作？”

“集中营全体！”

“胡说！……”

“胡说的是你！”谢唯进打断法警的话，“今天这些人参加，明天哪些人参加，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记不住，算也算不清！”

“为什么诋毁集中营当局？”

“我们没有诋毁，我们说的是事实，倒是你们把虐待我们的事实隐瞒起来，在法国报纸上说你们讲人道主义，犯人吃得饱穿得暖，居住条件也好……真是这样吗？”

“你造谣！”法警暴跳如雷。

“造谣的是你们！苛扣粮款，打骂枪杀我们，你们违犯国际法尽人皆知了！”

法警张口结舌，谢唯进更加理直气壮地笑道：“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我倒要问问你们，现在法国政府已经宣布对德作战，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你们还关押着我们，对反对过德意法西斯的国际纵队持这种态度，你们站在什么立场？”

“快把他拉下去！”法警破着喉咙喊叫，“宣布对德作战并不等于赞成你们的共产主义！”

两个大汉把谢唯进架走。

为营救被捕同志，各国战团、支队每天都举行游行示威，向集中营当局抗议，还通过关系在欧洲主要国家报刊上揭露他们；动员英、法及欧洲各民众团体，社会名流出

面大造舆论；请求进步团体派员来集中营交涉释放被关押的同志。中国支队给巴黎华侨团体也去了信，请他们向法国政府抗议，并通过法国政府向集中营施加压力。张金印、张金堂兄弟也联名给古巴友人写信，请那里的进步团体和华侨设法配合营救活动。

正在这时，参加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各国代表，从巴黎来到集中营看望各国同志，并指名要见被关押的同志。中国参加世界学联的女代表龚普生，指名提出要见国际炮兵纵队政治委员谢唯进。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何肇绪也一起参加会见。何肇绪还把中国驻法使馆经法国政府批准的中国支队回国人员名单，同住在国名单交给集中营当局，请他们不要再刁难阻拦，迅速办理安排中国支队全体人员离营事宜。

卡佩娜·安娜这次也和学联代表、全欧抗联何肇绪一起来了。她这次将同谢唯进一起去马赛，永远离开苦难之地，和谢唯进再也不分开了。

中国驻法使馆如此迅速批准谢唯进等人回国，这不能不感谢卡佩娜·安娜。近一个月来她辛勤工作，没有她在巴黎东跑西颠亲自登门办理，不可能如此快的解决如此重大的、棘手的问题。中国支队许多同志都非常感谢卡佩娜·安娜，谢唯进比别人更多一层道不尽的情意……

谢唯进和中国支队的同志被宣布释放后，便着手准备去马赛回国了。

说不完的离别话，道不完嘱托词……送别时足有一千多人，哭声、喊声不断，中国支队同志在汽车上也泣不成声，只能挥手，抱拳致意。

是呀！两年多共同战斗过的战

友，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战友，一旦要分手怎能不难舍难分呢？战斗结下的友情将铭刻在心头，永久感念、长驻不忘啊！

到了奥洛龙车站谢唯进一眼就看到等候在这里的卡佩娜·安娜。她办理了离开医院的手续，和谢唯进同行；何肇绪同志要护送中国支队同志去马赛，办理完返国手续欢送他们回国后再回巴黎。

火车开动了，几天来没有好好睡一觉，这一天多的火车行程，正好是补觉补休的好时机。卡佩娜·安娜就坐在谢唯进身旁，爱抚地照看他，不让他多说一句话；谢唯进也就乖顺地闭目养神休息，他的伤还没有全愈，身体也很虚弱。好久没有同卡佩娜·安娜这样亲昵了，一种难以承受的女人的温馨向他袭来，他幸福地沉沉入睡了。

十

轮船上七位中国同志——刘景田、张长官、杨春荣、毕道义、李丰宁、张树声、张书——都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拂，他们异常高兴。这是几个单身汉和国内有妻子的人，炎黄子孙，落叶归根了。

20年前的岁末，谢唯进留法勤工俭学，来到了马赛港。1919年10月31日从上海登船出发，40多天行程三万多里，而今，从马赛登程，又一个遥遥3万里的回程啊！同行者除卡佩娜·安娜，其余的同志来欧也是这条航线。自己这半生——20年前，20年后，同一个人，同一条航路，但它又是多么不同啊！来法勤工俭学时，一颗沸腾火热的心向往欧洲，求索人生，如今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游子还乡啊！当年比现在狂热，感情更激荡奔放……

就在轮船从马赛开航的夜里，

出乎谢唯进和卡佩娜·安娜的意料，7个中国同志神不知鬼不觉地为他们举行了婚礼。那腾出的舱房作了一番布置，在墙上贴了大红“喜”字，对联挂床头：大海作床天作房；三万里蜜月旅行。横幅是：新奇婚礼。这幅对联是7人的集体创作，虽然没有什么新奇动人之处，却表达了共同浴血苦战的战友的一片心意。新房桌子上摆着买来的咖啡、糖果、点心等食品，婚礼虽说简而又简，单而又单，大家围坐在一起喝咖啡、吃糖果，说笑一会儿也就散去。

新房内只剩下新郎新娘二人倒无法平静了，友人如此为他们操办终身大事，使他们一生难忘，卡佩娜·安娜望新房的一切，耳听舱外海涛阵阵声响，感动地端起咖啡茶说：“来，为中国的上帝干一杯！”

喝完咖啡，两人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他双手扳过她的肩头凝视着，十多年相识相爱，到生死与共的战场，又苦尽甜来……谢唯进为有这样一位脱离世俗的医学博士、1932年的德共党员的妻子而骄傲！

新婚的第二天，谢唯进和卡佩娜·谢·安娜不忍心朋友们挤在一个舱房中，便把新房归还原主，他们仍旧住集体宿舍去了。

附录

谢唯进一家回国后简况：

谢唯进：1940年6月回国后，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担任对敌工作和对外联络工作。1946年5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南京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共和谈。同年被派往华中解放区作军事外交工作。1948年11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

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解放平津的战役后南下。1950年2月，任军委空军工程部政治委员等职。

由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重要贡献，1955年国家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谢唯进同志已离休安置在四川南充干休所，受到了不应有的批斗。他被戴上国际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坏分子等帽子。经常斗得死去活来。但他从不屈服，写了给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廖承志、胡耀邦等有关个人和单位呼救信28封。

1975年他身患癌症住院，1978年病逝。

谢唯进的夫人卡佩娜·谢·安娜，1940年6月随谢唯进一起，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做对敌和对外联络工作。1946年南京国共谈判时，她是中共代表团的医生；1946年在华中解放区，是医学顾问。她曾将15000元华中解放区的钱币捐献给医院，同年12月5日“新华日报”登了这一消息；同时刊登了陈毅的感谢信；1948年11月，在四野特种兵部队做医务工作；1950年任军委空军卫生部顾问，曾撰写《航空生理学》由军委卫生部出版；后调北京医院工作。1961年赴苏学习深造，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无法回中国。1987年回国参加谢唯进改正平反后的骨灰安放仪式，并办理在前苏联定居事宜。

谢唯进之子罕生，1940年6月赴延安，在延安中央子弟学校学习，建国初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后去前苏联留学，加入前苏联国籍，现在乌克兰共和国从事科研工作，1990年曾来中国探亲。

（责任编辑：刘家驹）

南昌起义前夜的 朱德

● 熊建华

派朱德去“剿匪”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动政变，大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江西各地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民团纷纷勾结当地土匪向农民协会进行疯狂反扑。并上书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要求当局派兵“剿匪”。

当时驻在江西地区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和南昌市市长王钧，两人原系滇军将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他们早有心投靠于蒋，但时下正值宁汉对抗，江西乃归武汉政府管辖，朱培德只是暗地和南京政府眉来眼去。

朱培德收到“请愿书”后，召来了王钧和他的参谋长郑天龙商议对策，由郑天龙出谋献策，制订了一个阴毒计划，决定派出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去赣东剿匪。

借刀杀人

原来，在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朱德接受中共中央军委的派遣，于1926年冬来到南昌，凭借他当年在滇护国军讨袁时的声威和众多的同僚关系，在南昌创办了军官学校，为中共培养武装工作干部。朱

培德原是朱德在滇军时的同僚。王钧则是朱德的间接下级，为了笼络朱德，朱培德批准了朱德创办军事学校的计划，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校址选在南昌城内一个旧时讲武堂里。

朱德走马上任，消息一传开，来自滇军旧部的青年军官及士兵和江西各地的进步青年，工农大众，纷纷报名入学。仅几天时间就招收学员1000余人。

朱培德很高兴，他曾经在同僚们面前得意地吹嘘说，一定要让军官教育团成为“黄埔第二”。让世人知道中国不仅有个黄埔的蒋校长，还有个军官教育团的朱校长。

朱培德的兴奋没几天，他就发现军官教育团明里虽是他的校长，实际上根本就不听他的指挥。更令他吃惊的是，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朱德率领的军官教育团在南昌闹得天翻地覆，一会儿支持农运打乡村土豪劣绅，一会儿与学生队伍在大街上宣传革命，一会儿又与工人纠察队围捕AB团分子。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军官教育团出动数百名武装和当地工农纠察队一道，在南昌“中车站”缴了蒋介石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麟征也被活捉。为此，蒋介石从南京火速发来急电，申斥朱培德。由于慑于武汉政府，加上他对朱德



抹不下去袍泽的情面。朱培德只得装聋作哑，暗地里却在想着找个什么岔、解除朱德的职务，然后解散那个惹祸不怕天大的军官教育团。

参谋长郑天龙的主意，正中朱培德下怀，派朱德去赣东剿匪，这是个绝妙的“借刀杀人”的办法，朱德若率兵前往赣东，他可以借军官团之手去镇压当地农民运动。倘若朱德违令拒绝前往，便可以违抗军令为由，解除朱德的职务。朱培德即下了道手令，派人给朱德送去。并对王钧、郑天龙说：“让他们自己去打自己人，我要看朱德怎么样去对付那些农会痞子。”

朱德说：去也去得

朱德接到手令后，一看内容，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派人去请党代表魏瑾钧、参谋长刘介眉（陈奇涵），教官李正一等人来商量此事。会议开了近两个来小时，争论的结果是：坚决不去。

参谋长刘介眉说“不去，我们决不能向农民兄弟开一枪！”

党代表魏瑾钧感到很为难，他说：“不去不好吧，这是违抗军令呀，我看让朱德同志向朱培德告个假，就说生病了，不能前去。”

有人说“躲避不是办法。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伙正感到为难时，朱德冷静地摆摆手，用他那浓重的川音吐出几个字：“吵啥子吗，我看到赣东去也得嘛。”

大伙一听全愣住了。

魏瑾钧听了忙说：“老朱，你可要考虑清楚哇。”

朱德不慌不忙地伸出巴掌晃了晃，悄悄对他们说了一番。大伙一听脸上绽开了笑容……

智斗郑敬中

军官教育团经过长途跋涉，顺利到达了赣东府地临川县。部队一进入镇中，就听见一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四起，只见在县衙门前，站着一堆前来欢迎的人群。

朱德抬头望去，见为首的是一个长满花白胡须的老者，穿一身崭

新的绸缎长马褂，躯体干瘦，他迎上来拱手道：“欢迎，鄙人郑敬中欢迎朱团长率仁义之师来穷乡僻壤为民剿匪、为民除害。”

“不客气。”朱德冷冷一摆手。

朱德听过他们介绍后才弄明白，这个郑敬中原来不是别人，他正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的老爹。对于郑敬中，朱德早有所闻，这老家伙是赣东大地上的一个土豪劣绅，此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别看他年事已高，但却是一个老色鬼，不知有多少黄花闺女遭到了他的糟塌。为此，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大革命风暴来临时，郑敬中连夜逃往南昌，躲进了他儿子郑天龙的保护伞下。数月后，他见时机已到，又迫不及待地赶回赣东，组织地主武装，向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

为了欢迎“剿匪大军的到来和炫耀自己的威风，郑敬中当即命令团丁从祠堂里押出十几名五花大绑、遍体鳞伤的农协会员：“你们想造反、翻身……翻吧，老子今天就给你们翻个够……”

这时，有几个农协会员破口大骂：“郑老棺材，你别得意，阴间路上，我们等着你……”

郑敬中气得连声地喊：“拖、拖下去、活……活埋……”

几十个团丁如狼似虎涌上，挥鞭抽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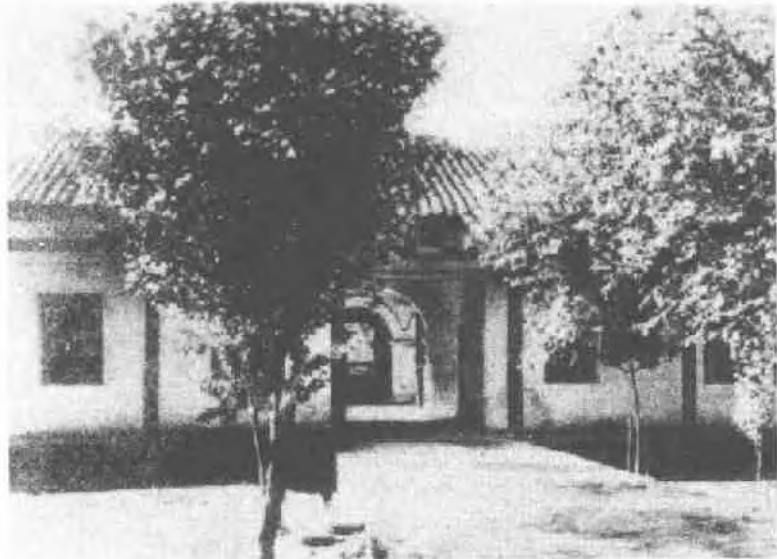
“且慢！”朱德站了出来，挥手制住了他们。

郑敬中怔了一下，谄媚地问：“朱团长，您有何吩咐？”

朱德压抑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老爷子，把这些人都交给我处理吧。”

“朱团长，你这是……”

朱德冷冷一笑：“上面有命令，凡抓住‘土匪’一概不许乱杀，全部押起来，报省府请功。”



南昌军官教导团

“啊，这、这……”

朱德朗声命令：“卫士班，把这些人押回团部关起来！”

赣东剿匪

当天晚上，朱德将被抓的农协会员召在一起，亲切地说道：“老表哥，你们自由了，你们放心，土匪我们是要打的，但我们打的是那些真正的土匪，打那些专门勾结土豪劣绅残害乡民的土匪和反动的地主武装。”

根据农友们提供的情况，朱德和刘介眉当即布置好“剿匪”方案，又派人找来了当地农民协会委员长董大贵，仔细地询问了当地农运情况和土匪及地方武装的实力后，朱德严肃地向全体官兵宣布：“这次下乡，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老百姓，谁是真土匪，谁是土豪劣绅，谁是反革命，老百姓自然会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反革命武装消灭掉。把土豪劣绅一串串儿串起来，农民就起来了。”

两天后，赣东偏僻的山乡到处响起了枪声。军官教育团在朱德的领导下，坚决执行援助农民斗争的方针，给地主方武装予以坚决打击。反动民团武装在军官教育团和农民自卫军的打击下，四散溃逃。

紧接着，军官教育团又在云山围歼了当地危害一方、令群众切齿痛恨的、以马老七为首的一支土匪武装，击毙了土匪头子马老七。仅以一月之余，赣东匪患，全部扫清。郑敬中这个在赣东山乡无恶不作的大土豪，万万没想到他自己请来的救星，竟成了他的克星。当愤怒的群众打进郑家大院时，他吓得屎尿拉了一裤裆，当即一命呜呼了。

剿匪胜利结束，军官教育团奉命回师。接着，他们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责任编辑：刘 文）



任护国军支队长（相当团长）时的朱德

《炎黄春秋》 1994年合订本征订启事

本刊1994年合订本（总第22期—33期）已装订完毕，欲购从速。

精装本每册定价44.00元，平装本每册定价：35.00元，一律免收邮费，挂号寄书。汇款时请务必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楚，以免影响投递。

本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联系人：杜 习 邮编：100802 电话：6076801



一支新奇的「特种兵」

● 陈淀国

在数十万担任我们国家内卫执勤的武警部队中，有支鲜为人知的“特种兵”，这支“特种兵”不担负看押、守桥、追捕、也不去打击车匪路霸、捣毁淫窝赌点，而是长年累月地把那些从四面八方流入北京的无业人员，帮助他们返回原籍坚持生产。

别小看这项执勤工作没有那种出生入死的惊险场面，它却关系到首都的祥和、安宁，关系到首都的形象、观瞻。它，政策性很强，涉及面很广，勤务量很重，时间性很紧、很长，……从冰天雪地的满州里，到四季飘香的海南岛，从繁华喧闹的黄浦江，到神奇奥秘的戈壁滩……处处都留下了他们日夜奔波的足迹。

前不久，我来到住在首都西南部的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八中队，

和他们聊起“遣送大军”的酸甜苦辣。

中队长胡小洪，1982年入伍，看过监狱，押过钞票，为中央机关站过“大站”……还曾为江泽民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表演过排打硬气功哩！

那天夜里11点多钟，他从牛街经过，只见一家饭店门前围了不少人。“职业神经”告诉他，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凑过去一看，果然是几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朝着经理、服务员，大打出手。这个砸玻璃，那个摔瓶子，杯盘狼藉，酒水四流。

他看清后，首都卫士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毫不迟疑地冲了上去。大吼一声“住手！不许胡来！”对方一见是孤身一人的“小武警”，哥们5个像恶狼般一齐扑过来。满

嘴脏话，手脚并用。就在这时，飞过一个破啤酒瓶，砸伤他右臂，鲜血直流……不料，那知这夥小霸王们却碰到了“茬口”上了，眼下这普普通通的“小武警”，手上功夫过人，早有“五指千斤”“下掌如刀”的美称。这次面对如此为非作歹的害人虫，岂能饶过？他不顾自己伤痛，朝着这帮嚣张一时的家伙，双臂一挥，两掌生风，“啪啪啪”雨点般击过去。这边“满脸花”，那边“嘴啃泥”，打得一个个屁滚尿流不到3分钟，5个小子全都瘫软下来，不住作揖求饶。

遣送回乡人员，看起来，没有硝烟，不动刀枪，平平常常，成不了“大气候”。其实，要真正干起“这一行”光有武功还不行，必须做到“文武双全”。既要“斗勇”，还得“善智”。这些被遣送的对象中，

有流落街头的乞丐，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多次告状的上访专业户，看相的，算命的，卖野药的，小偷小摸的扒手，不三不四的女人……他们想方设法、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北京。你硬是要把人家三下五除二遣返回乡，怎能不使出浑身招数，给你来个软硬兼施。甚至有的手段卑鄙得不堪入目……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不同于那些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犯罪分子。只能靠说服、教育、引导、感化。每次执行任务中，他们不得不常常忍受着种种“屈辱”。

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大潮的出现，盲目进城来京的无业游民激增。不仅给都市治安、交通、卫生、市容等方面带来影响，更给疏散、遣返增加了成倍的工作量。尤其是遇有全国性重大活动，诸如亚运会、全国人大召开及国庆、元旦、春节重大节日……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整个中队，除留下炊事员、自卫哨等不留不行的人员外，全都得上阵，而且是马不停蹄，一趟接一趟。路程近的，三天两天，距离远的，十天半月。离开北京时还好，列车对号入座，总可有个坐的地方。可返回时就“惨”啦，客流严重超员，能照顾你挤上车就谢天谢地了。站上十几、二十多小时，是家常便饭。有时到北京，两腿肿得像发面般，痛得钻心。长年奔波在铁道线上，不分昼夜执行任务的战士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寝无定榻，食无定灶”的游击生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安安全全送走一批，高高兴兴回到北京“大本营”。没有任何奢求，只要能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换换衣服，再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就算非常幸运了。事实却常常是，两腿刚刚踏进中队门，和“久别”战友的重逢话还没唠完，下批任务便压在头上。是北上，是南下，

又将马不停蹄地出征了。一“滚”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从春到冬，从满树新绿，到大雪纷飞……日子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又长了一岁。

这种勤务的突出特点，就是远离中队，远离领导，常常是小分队“独立作战”。有时二三人，有时五、六人，一个班出动，就算“大兵团”“大战役”了。而且点多线长，全国京哈、京沪、京广等5条铁路干线，42个遣送点，可说是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角落。一次次圆满完成，一回回凯旋而归，从未发生任何事故，靠的是什么？不是金钱，不是待遇，完全是靠战士强烈的责任心，高度的自觉性，尤其是那崇高无尚的奉献精神。

就凭这些，他们在这并不寻常的岗位上，用青春、热情，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撼动人心的生动故事：

其一：回延堂飞步追火车

春寒三月，刚刚从东北“遣送”回来的战士回延堂，又跨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次是去四川广元，由于晚点，走走停停，天快黑时，一个个饥肠咕咕，都觉得饿了。餐车，不敢进；盒饭，也吃不起，他们的“看家饭”，就是随身带的干粮、咸菜，馒头。路程远的，装上几袋方便面。

列车又缓缓停下，客流严重超员；车厢内很难通过，他提着几个行军水壶，快步朝车下走去。开水倒是打来了，可是不等他上车，车就开跑了。

这可咋办？全中队还从未发生地“漏乘”事故。当然，等下趟客车追上去，也不是说不过去。但他心里急的是：这任务，就像踢足球般，你打前锋，他打后卫，一个萝

卜一个坑，一个人一个位置，缺了少了，就必然要有“漏洞”，万一有返乡人员钻了空子，那可不是批评、检讨检讨的小事。

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他仔细看看周围环境，几乎全是“九曲十八弯”的盘山道，车子呼哧呼哧跑了半天，垂直距离却没多远。再问筑路工人，真乃“天助我也”，下个站只有7公里，又是坡道、弯道、隧道。听后，这个1991年入伍的回族战士，二话没说，沿着铁路，开始了“马拉松”。穿着棉衣，足足跑了半个小时，果然神奇般地赶上了“铁龙”。

其二：班长巧遇“老相识”

七月流火，奔驰在京广线上的列车，车厢内尽管电风扇不停地转着，人们还是大汗淋漓。这节加挂车厢，全是被遣送的人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汗酸味、烟辣味、泥腥味，呛得人难受。

“武警打人了！”

“武警违犯政策，动手了！”

“……”

顿时，一阵吼叫在后端响起。只见一个赤裸裸背的“小墨镜”站在座席上，挥舞着湿淋淋毛巾，竭力煽动着。

事情很简单，他以种种“理由”为借口，要打开车窗。坐在附近的战士小张，按勤务规定，前去劝阻、禁止，抓住他的手放下，“小墨镜”便不依不饶闹腾起来。

“你老实点，坐下！不能开车窗这是规定。你想搞什么名堂！”

八班长听到喊声赶了过来，几声训斥，对方才像霜打的茄子般“蔫”了，不声不响坐回原来的位置上。

作为“重点对象”，八班长开始对他反复打量起来，下巴上的那道

刀痕，使他马上回忆起半年前和他打过交道，是“老相识”。那次是因“抓蛤蟆”（倒车票）被罚款后，强行驱逐出京的。这次会不会是旧戏重演？

他被带到了列车治安室，经审讯，果然是老毛病未改，手头还有十几张卧铺票窝在这里，那是上千块钱啊，怎能不急于脱身而逃？

这小子“油”得很，一看自己意图败露，马上变换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苦苦哀求，点头鞠躬，什么老人要动手术啦，什么家里涨大水啦……最后，又在其他人暂时离开的空档，从手上撸下个金戒子，偷偷塞了过去。

结果更糟，不但换了一通训斥，还被当众曝光，落了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三：回心转意轻生女

这是由北京开往贵阳的 87 次特别快车，经过 30 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已经跨入湘黔交界地带。

车从怀化开出，下一站是玉屏，这个区间要在丛山峻岭中穿行三个来小时。半节车厢 54 名返乡

人员，一个个早都进入梦乡。但唯独坐在紧靠车门的那个姑娘，没有丝毫睡意。浓眉微锁，双目半睁，盯着黑黝黝的窗外，好象周围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战士燕祥、张泽民，和其他战友一样，长年累月的遣送生活，早已练就了几乎特殊本领。眼前这个姑娘，上车后，没讲一句话，没吃一餐饭。独自坐在那里发愣、发呆，尤其是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是逃脱不掉战士的警觉的，早在他们思想中，划了个大“？”。

她叫美翠，刚刚过完 18 岁生日，原本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少女，学习成绩也一直很突出。不料，考试临场发挥欠佳，几分之差，无情地把她拒之大学门外。从此，情绪一落千丈，父母的白眼，兄姊的冷落，同学的讥讽……一向被当作掌上明珠的美翠，哪经受得住这般寒枪冷箭的打击！

她带上平时积攒的 2000 多元钱，不辞而别，来到北京。准备看看天安门，游游颐和园，再爬爬八达岭后就结束自己这短暂的一生。结果，在昆明湖，在慕田峪，在鬼

见愁……不但没能如愿，反倒被送进了“收容站”。

“时间很长了，可她……”

战士燕祥，察觉到美翠上厕所长时间仍不见出来，心里有点犯嘀咕。向班长汇报后，“咚咚咚”用力敲了敲门，奇怪，没有任何反应。深感事情不妙，找来一起执行遣送任务的市公安局老张，将门撞开，大家不由自主地惊叫一声，原来她吊在了厕所管子上。

幸亏发现及时，经过人工呼吸，紧急抢救，美翠吃力地睁开了眼睛，泪水不住地淌出来……

每次遣送，战士从不满足于“短期目的”。他们十分清楚，在一大批盲目进京的无数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个人道路的坎坷、不幸，而走到了这一步。应该说，他们是善良的，从长远考虑，还应帮助他们医治心灵创伤，把他们拉上正确的“人生之路”。

顿时，车厢里充满春的希望，春的暖流。战士张泽民主动脱下大衣，给美翠轻轻披上。喜欢拍照的燕祥，把准备买胶卷的钱，买来点心、酸奶，送到她的跟前。还拿着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将感受最深、教育最大的“格言”，一字一句满怀深情地读给她听：

“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平静和愉快。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这样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不管一切如何。”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

不知不觉，窗外投进一束柔和的晨曦。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她那疲惫不堪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往常惯有的微笑。



训练

列车，依旧在山峦中疾驶着

.....

其四：中秋月饼寄深情

十五的月亮，
照在家乡，
照在边关；
宁静的夜晚，
你也思念，
我也思念

.....

行进的列车上，广播出一曲《十五的月亮》，勾起了多少人的思绪，拨动着多少人的心弦？

战士李向阳，听着听着，饱含深情的两眼，叮望着窗外那金盘似的圆月，那月光下成熟的庄稼，还有那庄稼掩映的幢幢农舍，和那透过窗口射出的一束束温馨的灯光.....

他，不知怎的，觉得特别想念家乡，想念满头白发的老奶奶。若是从前，在这“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中秋之夜，老人家定要叨念起她那远在首都的孙子，定会吧刚刚收获的花生、大枣，和老人家一颗滚烫的心，寄给她一手带大的孙子.....然而今年，以后，永远再也不会有那一天。最叫他感到内疚、痛心的是，奶奶病危拍来加急电报时，他正在执行遣送任务的征途中，等听到这个噩耗时，奶奶已经下葬三天.....

“小李，给，豆沙、五仁的。”善于“察颜观色”的副班长，知道小李的心情，想冲淡他那感伤情绪。

“不用，不用，我这也有，还是火腿的呢！”小李从沉思中猛地被“拉出”，抬起头来，从挎包拿出中队为在外执勤同志准备的节日“特餐”。

可是，李向阳自己却未吃，而是双手捧给了坐在对面的那位面



夜巡

容憔悴的老太太。这一突然举动，使她受宠若惊，迟迟不肯接下。末了小李硬是放在老人手里，那诚恳真挚的感情，把她深深打动，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连连道谢：

“我这个土埋半截的要饭花子，你们还待我这么好，叫我怎么谢呢！真是托上天的福啊！”

大娘还不到60岁，头发乱蓬蓬的，衣服脏兮兮的，看上去象是七老八十的人。其实，老人家本该有个美好、幸福的晚年，虽然老伴十年前被病魔夺去生命，她靠拣破烂、打短工、种菜养猪终于把四个儿子，全都养大成材，建家立业。如今，有的是乡镇企业经理，有的是中学历史老师，有的是砖瓦厂工人，有的是个体布摊老板.....然而却都把亲娘当做包袱，丢来甩去，吃的、穿的、用的，谁都不闻不问。老人哭红了眼，伤透了心，无可奈何，被迫走进乞丐行列，靠讨饭，维持活命。

今天，她万万没有料到，还有这样好的同志，把她当成“人”当成“亲人”。一路上，关照她，开导她，送茶送水，问寒问暖，特别是语重心长地给她讲，如何通过法律

保护自己，甩掉讨饭碗，堂堂正正活下去，理直气壮地去当“老娘”.....她那久旱的心田，好似落了一场春雨，枯萎的生命，重又露出生机的新绿。

“大娘，请放心，我们不但要把您送到老家，还要和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您一定要用法律这个最管用的‘护身符’，和那不孝的儿子去斗，政府给您做主。”

“好，听你们的，就这么办，到大堂上去告那四个小忤逆！”

大娘边说边点头，拿着月饼，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是那么轻松，那么开心，那么充满自信。

看到老人这欢快样子，李向阳和战友们也都由衷地笑了。

我思恋故乡的小河，
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小磨，
噢，妈妈，
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责任编辑：刘文）

改革名臣翁同龢晚年难度

● 俞小红

翁同龢(1830—1904)，历任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职。先后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在朝达40余年，以清廉爱国闻名于世，他对外主张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主张维新变法，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在向腐朽没落的保守派作抗争时失败了，他和他的同僚好友被杀的杀、贬的贬。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旧时代的殉道者和新时代的渴望者、探索者。

这年五月十六日午时三刻，光绪皇帝从颐和园返回宫中，乘舆穿过西华门。忽然，他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跪在御道旁，皇帝一怔，急命乘舆缓行，展开轿窗，终于认出是自己老师翁同龢。他像尊石雕一样跪着，见皇帝明黄色的乘舆停住，就稍稍抬起头，两眼温和而凄凉地望着光绪。他多么希望在年轻的皇帝前再一次剖白心迹，他知道今天可能是君臣之间最后一次晤面，然而，他只把温情的一瞥投向皇帝，又赶紧埋头叩拜，心里默默地祝福皇帝：大局初定，善自珍重。我今日归去了，借一把慧剑，斩断尘世情缘，持一柄利剪，铰除昔日恩怨……

光绪皇帝不觉打了个寒噤，翁同龢眼中刹那间迸溅的光芒，似有千般情愫倾吐，然而却未有一字一句相诉！太后这一招太狠毒了，借自己的名义逼走了师傅。昨日夜里，知师傅已被开缺回籍时，孤身一人哭了整半夜，紫绡灯下，那凄凄楚楚的呜咽，在寂静如死的深宫大殿里绵延不绝。一边哭，一边读着师傅的奏章，字字句句和着清泪残梦：“……臣已老迈体弱，每念时艰，感慨有愧，有生之日苦短，报国之心益坚。康有为辅国之才胜臣百倍，皇上英迈卓识自当信托之……”

眼见朝夕相处的师傅跪在泥水地里，光绪意摇神枯，百感交集，喉咙哽塞，未及开口，那车驾却已浩浩荡荡地过去了。

当天晚上，光绪命书房太监给翁同龢送来一匹葛



纱和一顶

围帽，作为端午节的礼物。正在屋中发怔的翁同龢不敢受领，那太监却说：“奉皇上旨意赏给，师傅不必推辞。有什么话，奴才可以转达。”

翁同龢老泪纵横，想想20余年的师生情谊一朝断绝，这也由不得自己，也由不得皇上。自己决意南归，也许反倒成全了皇帝的事业。想到这里，他心里平静了，慢慢地说：“请转呈皇上，臣已买舟不日南下。臣在一天，暗箭乱发，猜疑不绝；臣走了，皇帝自可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走自己的路！”说罢，翁同龢已泣不成声了。

太监离开后，翁同龢很快地作出了一个打算，把老仆李贵唤到面前，低声吩咐道：“你跟随我也有多年了。此番开缺，也是早晚的结局。皇帝保全老臣的一番心意，我心领了。我猜想，逼我走，定是西边的旨意，西边每每用皇帝之名降旨，先拟好旨意，再交皇帝亲笔朱书，掩盖指使的痕迹。这也是西边长袖善舞巧作伪人的惯用手法。这也提醒我，凡事也该有激流勇退的打算。如今变法刚刚开始，成败利钝尚未定局，我先期回常熟老家，有什么变动，我自会写信托京中同僚照应你们的……”当下吩咐停当，翁同龢决定早早离京，以免不测。

5月17日一大早，翁同龢带着夫人陆星芝，雇了一辆长档轿车，随身带了几箱紧要的物件，来到马家堡火车站。马家堡站是北京至天津的铁路起点站，由法国人和英国人联合开办。这天，得知翁同龢离开北京的消息，前来送行的有不少人。大臣开缺回籍，在一班宦海中浮沉过来的官僚来看，只是面子上的难堪，并非是多么重的处罚。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都开缺过，还不是醉吟田园清闲一阵子后，摇摇

摆摆又官复原职了。及至后来的袁世凯开缺了三年，反而官升三级更加飞黄腾达了。

站上，除了同乡亲戚簇拥着送行寒暄外，门生故旧也来了不少。康有为、梁启超、陈炽、文廷式，孙家鼐等都来了，红顶子万丝帽，官服便服，乘舆官轿，济济一堂。一列火车喘着气，轰隆隆地驶进站台，翁同龢正要上前，回头瞥见杨崇伊也在送行，脸色先有点不自在了。那杨崇伊是写弹劾翁同龢奏摺的执笔人，今天却也不知趣，竟毫无愧色地跟着众人走进了包厢，假惺惺地上前一揖，说：“老师，此番告老回家，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翁同龢立直身子，随手摇动白竹纸的洒金扇，也不答理他，只是转脸对康有为说：“先生，老夫此番离京归里，远城市而入山林，自是天赐福份。你在这里，可得近君子远小人啊！”话语尖峭坦直。

康有为心领神会，连连说：“翁师傅放心去吧，鱼龙混杂，不可不防！”

翁同龢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话音，把那冷凝如冰的目光，斜射在杨崇伊身上。任是杨崇伊枭雄般奸刁的人物，见了这目光也不禁一凉。

火车东去，当晚到了天津。翁同龢和夫人当夜住在重庆道北马路轮船招商局买办许楚卿的一所私宅内。入夜，门外一个军尉模样打扮的人在喊：“……天津新军统领袁老爷派我给翁大人送礼！”

“袁慰亭？”翁同龢听得来之人言，不觉沉吟：袁慰亭何故这么热忱有礼？这袁慰亭（袁世凯）是甲午状元张謇的门生，曾托张謇求取朝中大员的推荐，恰巧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建议，要在小站练兵，翁

同龢听说此人在朝鲜治军有方，就举荐了他。但从没见过他的模样。听张謇说，强学会开办时，捐银最多的是袁慰亭，故翁同龢与他虽无深交，但印象不错，认为是个人才。

那个军尉见到翁同龢，恭恭敬敬地递上一份信函。

展开一看，翁同龢有点失望，信函中只有一张上海汇丰银行3000两纹银的汇票，其它片纸皆无。他扫了来人一眼，问：“袁将军没有什么话吗？”

那军尉并不粗鲁，斯文地说：“回翁老爷，袁将军适才知道老爷下榻于此，今晚不便惊扰，明天他自当亲送老爷上船。”

翁同龢点点头，这袁慰亭办事倒也极有心机，识得官场进退奥妙，就试探着问：“袁将军常去北京吗？”这话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打听一下袁世凯在京中结交些什么人物，二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政治态度。

“袁将军有什么事总派亲信下官去办，非紧要大事，轻易不出门。再说，袁将军公务在身，忙于练兵，也无暇顾及其它琐事。”

“噢……”翁同龢隐隐明白了，袁世凯此人不能得罪，也许此人会忠心于皇帝，将来可备大用。

“请你转告袁将军，无功受禄，受之有愧，本来我不想收下他的厚礼，只是将军向来支持皇帝变法，权当这是支持皇上变法的一番盛意吧。”

送别来人，翁同龢高兴地对夫人说：“皇帝能得到执掌兵权者的支持，真是大幸了。可惜天津小站离开京师太远，不然的话，驻蹕京师，不怕荣禄猖狂了。”

陆星芝披着一件墨绿色的纱衫，走近说：“你也不要一厢情愿，如此圆滑周到的人，不可轻信。”

第二天上午过了辰时，“丰升号”轮船升火启碇，仍不见袁世凯的踪影，翁同龢偕夫人正要从甲板往二等舱去时，却见岸上一驾官车飞驰而来，跳出个武将打扮的人，这正是袁世凯。他手里拿着根手杖，高声朝甲板上停立的翁同龢大声喊道：“翁师傅，学生来迟了。”话音刚落，他弯腰长长一揖。

翁同龢带着笑容作揖回礼，身子俯出船栏，清健地说：“袁将军，后会有期……”

在当夜的日记上，翁同龢信笔写下几行：“……袁慰亭送银三千两。此人不即不离，不疏不亲，开展有余，欠诚信……”

海上行程八日，至上海耽搁一日，转乘官船二日，翁同龢于农历小暑之日回到了故乡常熟。第一个在常熟迎接翁同龢一行的是他的外甥翁金门。翁同龢位居一品，年俸虽高。大都用于购买书画和官场应酬，从未在常熟添置田地房产。回到故里，无屋可居，只好暂时借

住于之园内。二姐翁寿玉在之园内为翁同龢接风，望着满面风尘的弟弟，翁寿玉悲喜交集地说：“回来就好，叶落归根。住在姐姐这里，什么也不用操心……”

翁同龢心中不觉起了无限的惆怅，心头阵阵发颤，亲情暖语，熨贴着他枯井般冷漠的心。凄然说道：“我这次开缺回籍，本无颜面见诸位族人，幸蒙姐姐真心接待……”说着说着，竟掩面而泣。

以后的许多天，翁同龢的心情一直处在焦急惶惶之中。他希望聆听到京师皇帝的消息，但明知军机处的邸报要半个月才传送一次，所以忧愁的思绪一直纠缠于心底。

忽一日，一个门人从前园跑过来，告诉道：“南通张季直在花厅里等着老爷，说有要紧事请见。”

翁同龢听说是张謇到来，料想有什么重要的讯息带来了，自己也正想见见他，便连忙走向花厅。

师生相见，彼此寒暄一番。张謇今天很精神，一身茧绸白绉衫，

一顶天青色瓜皮小帽，一双麻筋双梁布鞋，手里摇着把杭州朱记的头号酒金黑骨折扇，潇潇洒洒，倒底比翁同龢年轻20多岁，风采依然当年状元公模样。

张謇说：“老师，刚才我来到府上投帖，抬头见到门楣上高贴一张白纸，吓了我一大跳，以为是官府贴的什么告示，再仔细瞧瞧，原来是老师自订的五不规约！”

“季直，没想到罢官归里，仍是应接不暇，门前送礼的，请托的，写荐信的，络绎不绝。所以我干脆自书规约挡驾，免得惹事生非，也落得个身子清静。”

张謇是个极聪明的人，明白老师内心的苦衷。他转过话锋：“前几天两江总督刘坤一给我看了几件宫廷邸报，皇上近来一月中，整饬朝纲，革除了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堂官的职位，并且任命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赏以四品卿衔。皇上还亲自召见了康有为，促膝密谈。”张謇很兴奋，声音急速。

“噢？看来局势倒有利于皇上。”翁同龢顷刻间一展愁眉。

“季直，我所担忧的是荣禄把握兵权，一旦他与太后联合，皇帝势单力薄，还是难以抗衡啊。董军，甘军和和袁世凯新军近来可有变动？”

张謇脸色深沉地说：“老师，这正是关键的一着棋，前半个月，皇帝秘密召见了袁慰亭，授予侍郎衔，这也算破格提携了，袁慰亭也拍胸表示要为皇帝尽忠，只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

“预感什么？”翁同龢瞪大眼睛问。

“此人贪色渔利，有奶便是娘，皇帝恐怕太轻信他了。”张謇说出自己的担忧。

“怎么，他的才干不是博得许



多人佩服吗？”翁同龢疑惑地说。

“人心隔肚皮，不经烈火，难识真金。你记得吗？袁世凯当初随吴长庆部驻扎朝鲜的十二年，吴长庆把他从一个文案提到营管带之职，而他过河拆桥，从朝鲜回国后吴长庆被贬到金州。吴抑郁困顿而死，他却不愿援手相助。我为此不平，写了一封信痛骂了他一顿，从此与他十年不通音讯。”

翁同龢朝张謇相视默然，然后说：“变法只能缓变，不能急变，急则容易生乱。目前变法诏书已下，好比摇撼将塌之旧墙，需要恒心毅力，莽撞行事反会被塌墙所压倒。皇上的权力慢慢地收回了，身边的人才逐渐聚拢了，总有一天，皇上登高一呼，天下臣民齐声响应，大业就成功了。当务之急，先要稳住阵脚，断不可有冒险的举动。”翁同龢这一番话，是他连月来焦虑积思的结果，一旦说了出来，心里反倒轻松了许多。

八月廿五夜里，从江宁府转道而来的一骑怒马，湿汗淋漓，冲进常熟南门。那坐骑上的黑衣侍卫手擎600里加急公文，策马直奔城中县衙公堂。公文递到崔知县手中，他急忙打开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地喃喃念道：“……查翁同龢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报恩人，已属罪无可道。其所陈奏要，大渎忤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拂然不悦，恫喝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命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儆大臣居心狡诈。钦此。”

半夜里，翁同龢跌跌撞撞来到县衙公堂听旨。回到之园，他坐听

更声苦思到天明。从开缺回籍到永不叙用，这对老人来说，不仅是个极大的污辱，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最后终结。他默默猜度着京中的消息，这突然催发的廷寄谕旨，一定显示着京中惨祸已经发生了。为了避免牵连姐姐一家，他决定搬往离城15里的瓶庐祠堂去居住。瓶庐祠堂还是翁同龢当年扶柩回乡时所修缮，离父翁心存墓约有半里地，外围似瓶形，内院四进三开间，有空敞的庭园。

翁同龢举家搬进了瓶庐，开始清静寂寞的生活。没多久，北京就传来了确切的消息：慈禧再度训政，光绪帝被困瀛台，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昔日的同僚好友张荫桓、徐致靖、陈宝箴等充军的充军、削职的削职，皇帝的变法计划在顽固的恶势力摧毁下夭折了。

伴着昏灯孤影，翁同龢闭目躺卧在床上，泪水在奔泻。床前堆着一摊纸灰，他烧毁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信件，其中有已经逃到上海租界隐姓埋名的陈炽和张元济写来的密信。

老人的精神支柱垮了。窗外，江南淫雨的黄梅雨冲洗着十里虞山，风声雨声在呐喊，在呼叫，如同一道道凶讯撕裂着老人的心。

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进食了。俞金门送来的新鲜的雪莲瓜和糯米方糕，也被冷落在桌上。翁同龢的眼内，充满了无望的恐惧。悲苦的面庞，呆望着祠堂供桌上忽跳不定的烛光，皇上那白晰聪慧的影子惨笑着向他走来……这虚幻的一闪，顿使翁同龢觉得万箭穿心般难受，身前身后已是一片空虚，惟剩这残破的瓶庐，将作为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心中的冷膜像结了霜一般，稍顷，他扶着床栏，赤着脚挣扎着下床，踩着潮湿的砖地走向庭



院。借着雨中一道道空灵的闪电，他看到了祖莹的墓碑，其中一块是新近请石匠镌刻的，上面是他自题的碑文“削籍大学士翁同龢之墓”……

“哈哈……”翁同龢这时忽然仰天狂笑，在嘶哑的笑声里，他慢慢地走到院后新挖的一口深井上，魁梧肥胖的身躯坐到青石井栏上，一任雨水泼洒了一身，嘴里喃喃不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莫将两行泪，轻向竖曹弹。”

1904年夏日的一天，翁同龢逝世于常熟。其墓立于父亲翁心存墓之侧。（责任编辑：刘家驹）

李立三和斯特朗

● 李思慎



李立三

1963年夏天，李立三全家在北戴河休假，住在东山宾馆。那里距专家疗养院很近。一天下午，我随李立三去专家疗养院看望美国朋友、北京积水潭医院性病和麻疯病专家马海德，德国朋友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医学专家米勒，并在一起玩了半天桥牌。当我们在院内与马海德、米勒告别时，巧遇路易斯·斯特朗。李立三与斯特朗一见面，如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相互热情问候，致意寒暄。李立三诚挚地邀请斯特朗去作客。斯特朗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当即约定了时间。

回到住处，李立三把邀请斯特朗来作客的事向妻子、孩子和工作人员作了交待，全体齐动员搞卫生，厨师拟出菜谱供李立三夫妇审定，我到食品专供站特殊交涉采购并与宾馆落实接送车辆，还专门为斯特朗准备了一束新花，真有接待

贵宾的气氛。整整忙活了两天，才作到让李立三夫妇基本满意。

那天上午10时，按约定时间，我到专家疗养院去迎接斯特朗。她在女秘书陪同下，来到李立三住处。李立三与斯特朗无限深情地回忆着过去的几次交往。78岁高龄的斯特朗，思维敏捷，谈吐清晰，记忆犹新，她在回忆1927年在武汉第一次采访李立三的情景时说道：“当时，我就发现你与众不同，很有特点和个性。我当时采访过好几位工会领导人，还为他们拍了照，他们所有的人都愿意以红旗和革命标语为背景，摆出雄赳赳的姿势。唯独你把我拉出会场之外，带到春意盎然、幽静的小花园，选择盛开的鲜花为背景，表情轻松，笑容可掬。事后，我跟别人说，李立三虽然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但他很有知识分子味道。”

原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继1925年第一次来华采访之后，1927年春又来到中国，当时，正值蒋介石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在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这血腥的一幕，悲痛不已，十分愤慨。

就在斯特朗第二次在华采访期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李立三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中央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并组成了以他为首的七人中央工人运

动委员会，同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五月中旬，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开幕，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加之在此前不久，1927年1月，李立三还成功地指挥汉口的工人群众收回了英租界，震动了国内外。因此，李立三在当时已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斯特朗的主要采访对象之一。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隆重召开，斯特朗在会上采访。她在书中写道：“参加中华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们，来自很多省份，他们各自的经历十分不同，我用了许多天时间和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工人们谈话，从而对劳动运动多方面的问题有了大致了解。”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四次劳动大会在一个宽大的礼堂举行，381名代表和二千名凭武汉三镇工会分发的入场券前来的列席者挤满了楼上楼下。……还有几千名想来，但不能来。可见，人民对于在国民革命高潮中举行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会议是多么关心。”

“主席台上坐着苏兆征，他是个海员，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也是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还有李立三，他过去是个学生，后来是总工会的书记，现为主席团最知名的成员之一。他们的下面是一张张仰起的脸，一张张生气勃勃、热情关注的脸，其表情充分显示出工人们生活的强烈关心。”

李立三是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代表大会主席致了开幕词。接着“有16个组织用了5个小时向会议表示祝贺，包括三个外国组织的代表——红色工会国际的洛佐夫斯基、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印度人罗易和两个爪哇工会的爪哇人。”

6月20日上午，李立三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宣布：“前三次大会的任务是组织和宣传，这次会议的任务是领导中国工人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这次会议不仅将决定如何保护它所代表的工人的直接利益，而且要决定如何领导国民革命……”

李立三的政治报告一结束，斯特朗立即找到李立三，李立三愉快地接待了斯特朗对他的采访。李立三的谈话，给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印象是那样的强烈和深刻。她在书中写道：“李立三与别人都不同。作为湖南农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儿子，他读了七年书。大战期间，他到了法国，在铁工厂里做工，了解到法国工人是有组织的，而且通过它获得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回国后，他以同样的方式组织中国工人，最先组织的是他家乡湖南的矿工。李立三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观点，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他对我说：‘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工会时，工会才可能在爪哇、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蓬勃发展。’”

就在这次接采访时，李立三还向斯特朗讲述了一个生动而可笑的故事：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反动当局，秘密雇佣了一些刺客，对他进行跟踪，发现他总跟贫穷的工人、市民在一起，认为他是好人，不愿对他下毒手。总是在侦察好他的行踪，趁他不在时，实行突然袭击他的住处或工作地点，放几枪就跑了。以此来应付反动当局。有的时候，反动当局追得紧了，他们便偷偷通知，某日某时将在某地采取行动，请你及时避开。这样一来，他们这种薪水很高的工作，便可以继续做下去了。

采访结束，斯特朗打开相机，准备为李立三拍照。李立三却避开到处是纠察队员、到处是红旗彩带的会议大厅，把斯特朗请到一个小花池边，以花木溪水为背景，拍了照。对此，斯特朗写道：“我记忆更深的并非李立三的世界性的观点，而是我给他照像时他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弱点。他催我离开那个到处是工人卫队和标语布告的大院，带我来到一个业已凋残不堪的中国式小花园。他以树木和一条小溪为背景，摆了个照像姿势。他想在我的记录中留下一个为恬静优美的环境所环绕的形象，而不是置身于胜利喧嚣之中的形象”。斯特朗预言道：“但是，他的一生将要经历最不平静的动乱、出现非法的组织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动和党的‘错误倾向’，然后他再通过公开认错和学习，在革命队伍中重新工作。”从李立三后来的发展经历充分证明，斯特朗当时对李立三的预言是多么准确啊！

当天下午，我送斯特朗回到专家疗养院。最后与她告别时，她通过女秘书对我说，她今天生活得很愉快，很有意义，感谢我给她带来了欢乐。（责任编辑：刘文）

郑板桥当官记

● 竟陵子

郑板桥，一代书画之圣，康熙秀才、雍正举子、乾隆进士，被委任为山东范县县长，干得不错；又调任潍县县长，也干得可以。一年山东大旱，潍县尤盛。有的农民因颗粒无收而抗租，缙绅们押着抗租赖税的农民，请郑县长严惩。按照官场常规，郑县长当然应与朝廷保持一致，但是，他不仅没有严惩那两个乡巴佬，还自行开仓放粮，命令大地主们一律按田产捐出粮食救济贫民。上级闻风大怒，下令潍县立即停止，可这郑县长就是不听。后果是：郑板桥被摘下了顶戴花翎。昨天的衙门知县，转眼间卖字街头。

当年国民党唯一的一点“民主”—— 重庆“国民参政会”的内幕

● 陆立之

1939年，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团结抗战为名，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所谓社会贤达、爱国人士，济济一堂煞有介事地开了几天会。当时笔者在参政会外交组任秘书，因此亲眼目睹了许多丑态与恶行。

会场先是设在乡壁街“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开幕前因遭敌机轰炸，礼堂被毁，会址乃迁到沙坪坝的重庆大学。

第一件趣事，说说外交组的动态，先从召集人罗文干说起：罗文干其人，早年曾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总检察厅厅长，因为反对拥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挂官而去。后来，1922年又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财务总长，曾引发府院之争的轩然大波，以致王宠惠内阁倒台。以后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司法行政部长，曾赴赴新疆去处理棘手的盛世才问题，可说是桀桀大才。但因一身傲骨鄙薄蒋介石，旋即失去权位，心怀愤懑，在参政会上就故肆戏谑，意在使蒋介石难堪，其表现实类东方朔的诙谐滑稽。笔者当时年方而立，是初次遇见如此显赫大人物，因此大感兴趣。

在外交组开会之前，罗文干对我说：“老弟，那玩意我要是背不上来，你给提个辞。你就坐在我身边。”他指的是开会时必须背诵孙中山《遗嘱》。我也信以为真，挨他身边坐下，准备真心为他提句。不

料此公竟是虚晃一枪，他其实是不愿念孙中山遗嘱。每次小组会一开头，他站起来先念几句：“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凡四十年……”我赶紧轻声提句：“积四十年之经验，”但他不听，仍是自己跳读几句，删节了几段，断续地重叠地改念：“唤起民众，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我民族……是所至嘱。”可以想见罗文干思想并不崇拜孙中山，流露了不屑一读之意。而这个参政会外交组的全体成员，不论男女，也都是射而不中的外交弓箭手，或多或少有些牢骚，所以竟无一人对这位“老前辈”召集人有异议。罗文干结束了开会式，立刻有一阵欢笑声，除了闲话今天天气和品评美食滋味，从未正规讨论过什么外交政策问题。罗文干从衣兜里摸出四川名烟金堂雪茄甩给邻近的人，就开始对外交组唯一的女参政员刘王立明谈笑，揶揄她胭脂搽得匀称，服式高雅。她，上海沪江大学刘湛恩校长的遗孀，在参政会中也是一枝名花，因此外交组的小会上她就经常成了中心人物。

每当蒋介石以议长资格亲自主持大会时，罗文干特别不耐烦，他频频起座外出，有时故意到会场外买一大堆小烧饼，用长衫前襟兜着，在会场内散发给熟识的人，烧饼飞掷，笑语轰鸣，蒋介石也只得视而不见，不断用手掌抹脸。如果是副议长张伯苓主持会场，罗文干就安坐装睡，旁若无人。当外交部

长王宠惠作口头报告时，罗文干更是充耳不闻。这个王宠惠，18年前与罗文干原是老伙伴，北洋政府黎元洪当总统时，王宠惠是内阁总理，就因为罗文干财政总长案引起府院之争而王内阁倒台。今天，王又是外交部长，罗却沦落为一空衔参政员，他心里自然有些辛酸。

据说，外交部原准备了书面报告，一捆“机密”印件放在部长汽车后厢中，不知怎么竟在途中遗失了。外交部在市内小梁子花园，距离沙坪坝重庆大学车程约一小时半，王宠惠赶到会场却无所依据，只得临时急就章胡诌一通。这又引起罗文干不满地说：“王亮畴又胡扯了！”

主席台上正面陈设长长的桌椅，铺了台布、摆了茶具花瓶，铃铛等等。左右侧各设一小桌，桌上光秃无物，这是秘书长雷震和副秘书长彭学沛的对座席位。这位副秘书长彭学沛是个风流倜傥人物，他久久枯坐觉得无聊，时常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圆镜子，不是仔细端详自己容颜，就是整理领带，左顾右盼，孤芳自赏。台下的人就嬉笑，罗文干又咕哝一句：“相公！”台下的人笑出声来，彭学沛却不脸红。

有一老人名叫褚辅成，浙江会稽，据说曾是蒋介石的塾师，因此有些昏庸卖老。每逢大会讨论任何问题，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议案，褚必抢先发言。但总是言不对题，冗长乏味，时常惹人讨

厌。以后，凡遇此场面，就有另一参政员，据说是南京诗人名叫卢前（冀野）就立刻奔到褚的座席前面，直伸双手在褚的鼻下作鼓掌状。会场一阵哄笑，主席台上摇铃制止，褚辅成只得中止发言，气愤地坐下，卢前回到自己座席，会场上留下一片轻松的嗡嗡声。

另有一戏剧性镜头：当会场间歇的短暂休息时，有一戴墨镜长袍马褂的老人，呵着腰急步地乱窜，他走到邹韬奋座席前，谦恭地递上一份提案草本和一张硕大的名片（履历表），深深地鞠躬，口中喃喃地说：“请指教！请附署尊讳！”原来，按参政会规定，提案必须三人以上签署方可列入议程。此公所提者是一些老问题，即“请疏浚黄淮开发水利资源案”。邹韬奋瞥了一眼标题，明知其内容是纸上谈兵永难实现，但面对这陌生老人，又觉得其情可悯，考虑此事既无风险不会有争议，也就随手签了名。老人

再度哈腰打躬，连声道谢，捧着原件踏着小碎步走了。此人姓甚名谁，那张大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写些什么官衔，邹韬奋也没有去鉴赏。

场外花絮更神秘，就在会期的第三天早晨，忽有一女参政员被暗杀，但会议中竟无人知晓，包括中共六位代表在内，都被隐瞒了。

这件事发生在一天清晨，女参政员某某（忘其名，四川人）按习惯早起，如厕，突然闯入一人假冒送电报，拔枪将她射杀在马桶上。凶手瞬即逃去。一个堂堂正正的参政代表，突然死于非命，会期中竟只字不提，毫无法制保障。

笔者听见重庆大学门卫警士在私议此事，好奇地搭乘警察局长徐中齐的汽车到现场观看。在一所院落里已空无一人，尸体已移走，现场已用水冲洗过，这似乎违反了一般凶杀案侦查措施。据邻人说：死者无亲属，她是与丈夫伉俪后独居此屋，其为人慷慨仗义，乐于助人，

经常为妇女姊妹们排忧解难，嫉恶如仇，秉性豪迈。这也许就是招来杀身之祸的个性。

案发前，死者对邻空屋忽来一伙劳工粉刷修葺房舍，旋即迁入一豪华贵妇人，珠光宝气，娇媚逼人，似为缙绅巨贾外室。但此姝深居简出，从不与邻里交谈，夤夜有一马脸男子来伴宿，晨兴即去。女参政员默默观察数日，发现此俏丽妇人似某下堂妾，马脸男子疑是色魔戴笠。女参政员秉性痛恨特务淫乱行径，因对邻人扬言，准备在参政会上提案弹劾特务丑行。不料翌日此贵妇人飘然逸去，家具已搬一空，又一日，就发生了暗杀案。

这疑案本有线路可查，但竟无人敢问。这就是重庆国民党参政会草菅人命的事例。以后，这类恶行肆无忌惮的发展，到1946年就公然在沧白堂和较场口施暴，对独裁者来说，民主参政的幌子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责任编辑：刘家驹）

举世罕见的大算盘

● 祁金华

明朝初年，算盘便在我国逐渐流传，因其简单易学、运算方便，很快通用于全国并流传于东亚各国。

由筹算演变而来的算盘，一般有9档、11档至15档，可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天津达仁堂（即今达仁堂制药厂）却有一架117档特大的木质算盘，堪称世界之最。

这架算盘是用优质红木和铜柱穿档制成，全长306厘米，819个算盘珠。从店堂柜台的一端到另一端，可供六七个店员同时使用。

这架大算盘，说起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一年冬天，天津卫闹起了流行感冒。到达仁堂抓药的人络绎不绝，六七个店员，只两把算盘，而且你拿过来，我拿过去的，既费事又不便。这时，达仁堂的东家，也就是创始人、经理乐达仁先生正巧

来到店堂，老东家丝毫没有架子，马上卷巴卷巴袖子就帮助伙计抓开了药。他不帮还好，越帮越忙。为什么呢？因为药抓的快了，算盘就更不够用了。

生意挺兴隆，可算账这么慢，不等于把顾客和票子拒之门外了吗？乐达仁苦思冥想，终于有了主意。他亲自设计、制图，并请天津估衣街算盘作坊给特制了一架固定在柜台上的大算盘。有了这架算盘，就方便多了，店员们可以随手在柜台的任何一个地方拨拉算盘珠子，又节省顾客等候的时间。此外，还多了一个好处，因为这架算盘大得出奇，几名店员同时算帐，算盘珠子“乒乒乓乓”一通响，为店堂平添了许多情趣。许多人好奇地慕名而来观看，增加了热闹气氛，买卖自然也就兴隆了。

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大算盘为达仁堂的兴旺发达立下了汗马功劳。



《本草纲目》 在日本

● 韩进林

宫下三郎教授给蕲春李时珍医史文献馆题词

被达尔文称之为“东方医药巨典”的《本草纲目》，1596年在南京问世后，先后被翻译成日、英、俄、德、法等多国文字，传遍五大洲，饮誉全世界。

世界上最早翻译《本草纲目》的是日本。公元1607年，日本皇都书肆首次刊行了《本草纲目》，书名叫《广大堂质问本草》，共55卷，仅限于幕府宫庭御医阅览。

将《本草纲目》传入日本民间的是日本幕府御医总库（相当于今天的卫生部长）曲直玄赖。他对《广大堂质问本草》删繁就简后，以其在京都开办书林的内兄野田弥次的名义出版了《质问本草野田弥次右卫门本》，轰动了日本民间医药界。京都新崛起的书林老板松下见林也精博医学，他目睹《本草纲目》的影响，决定抛开《久寿堂本》和《右卫门本》，另起炉灶重新刊行《本草纲目》。公元1663年，松下见林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时值清圣祖康熙即位，施行“活外域”“安内域”政策，亲自召见了松下见林。松下见林在中国一住3年，搜集积累了中国有关医药的大批资料。回

国后，于1669年（日本宽文9年）刊行出版了《本草纲目松下见林校正本》。松下见林亲莅中国，他的版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至1669年至1713年的44年间，《本草纲目松下见林校正本》成为日本的权威医药典籍。1711年，松下见林去世后，日本各家刊行堂又各自为政，纷纷抢出版本。1713年至1796年的83年间，日本先后刊行了18种版本的《本草纲目》。

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天皇督司督察刊行了《本草纲目大字正误本》，并由天皇下诏，废弃《本草纲目》的各种版本，通用正本清源的《本草纲目大字正误本》和《本草纲目半田屋本》。1929年，由胁水铁五郎、冈田信利、矢野宗干等著名的汉学家、医药学家牵头，以《本草纲目》金陵版本为底本，对《本草纲目》首次进行了校注全译后，由东京春阳堂刊行，书名为《头注国译本草纲目》。从此，这部“春阳本”被奉为最完善的《本草纲目》外文译本。七十年代初，东京日本学园大学药学部长，著名医药学博士木村康一，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

名理学博士薮内清，关中大学教授、日本著名李时珍研究专家宫下三郎等，对《头注国译本草纲目》重新进行了修订、增补和校正后，更名为《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这部附有包括日文、汉名、拉丁学名和病名索引、术语索引、药方名索引、地方名索引以及《李时珍传》的《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共15册，是《本草纲目》传入日本372年来，最完善的一种日文译本，也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外文全译本。

几百年来，《本草纲目》不仅被日本刊行堂社视为刊行之荣耀，也以它史无前例的浩蕴，举纲振目的分类，博采通俗的医秘，而成为日本“王侯之秘录，医民之重宝”。1639年，主宰日本兵权的江户幕府颁布了“焚销国外流进的一切物品，禁止与海外一切文化贸易、商业贸易，清除驱逐在日本的全部外国人和传教士”的锁国令，掀起了一股扫荡海外物品的狂澜，千百万吨西洋药品、商品被推进深坑，堆积如山的洋布、外书化作灰烬。可是，《本草纲目》却安然无恙。

山县有朋和大隈重信是日本明治维新初年的两任首相。他二人都把《本草纲目》作为开化治国的教科书之一。山县有朋在1889年第一次组阁任首相兼义务大臣的第二年，发布了“教育敕语”。“敕语”称《本草纲目》为“东土文化的开化典章”。大隈重信首相在他的《开国五十年》和《大隈侯昔日潭》两本书中分别记述了《本草纲目》对藩医东化的巨大影响：“泽被生民之术，大和藩医远不及东土……东土《本草》博雅精详，对藩医强族兴邦影响深旷。”

数百年中，日本的科学界、教育界、医学界更是把《本草纲目》奉为圭臬，视如珍宝。传抄、改编、翻刻、研究《本草纲目》的狂热经久不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称《本草纲目》是“汇揽百学”，以至他熟读成癖，“置之座右”，“片刻不离”。《本草纲目》中丰富的异国百科知识激起了他向往中国的强烈欲念。1897年，藤田丰八冲破重重阻力，远渡重洋到中国研究汉学。先后担任过上海东文学社教习，两广总督顾问，并在广州创办过《岭南日报》。尽管他对《本草纲目》的研究没有写过专著，但是，在他的《东西交涉史研究》中声称：“《本草纲目》是他研究中国史地和先秦文学的激素。”

“未读本草愧为医”。这是日本江户后期著名的医师、兰学家大规玄泽，创设主讲兰学教育启蒙学塾——芝兰堂时，对门生的开堂训诫语。大规玄泽得意门生百余人，都先后担任过藩医医台，他们都效法先师，把研读《本草》作为收授门徒弟子的扛鼎试题。以至江户末期，《本草纲目》已被日本医学界奉为至高无上的医药圣经。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医药界，特别是民间

乡医，对《本草纲目》的迷信崇拜登峰造极。日本医史专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的《兰医国药概述》介绍，日本民间乡医收徒，其弟子必携《本草纲目》拜师；医徒出师，其师必以《本草纲目》作检验弟子学业的尺牍：赠给弟子一册《本草》，喻意此徒学业一般；赠送三到五册者，喻意此徒学业上乘；赠送全套《本草纲目》的则喻意此徒学业非凡，青出于蓝胜于蓝；若无《本草》赠送的医徒，则喻意学徒学业无成。医寓开业，《本草纲目》被视为镇寓之宝；其主人要将《本草》高悬于案，晨暮必参，顶礼膜拜。

医学界对《本草纲目》的狂热也刺激了日本书画界、收藏界商贾巨头的发财欲。江户中期至维新后期，《本草纲目》的书贴、启蒙图谱、中药标本画册，在长崎，东京等地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而且价格昂贵。据《梦之代》记载，日本江户中期画家尾形光琳的一套12幅《本草启蒙图谱》，开价万金。从江户中期开始，收藏家们以收齐各种翻刻改编的《本草纲目》版本为荣耀。明治维新时期权威的报纸《国民新闻》刊载过这样一则社会新闻：1892年1月，长崎一位叫西玄哲白的收藏迷，因收藏的18种版本的《本草纲目》在住宅失火时化为灰烬，精神失常，浑身涂满牛油，在长崎街头引火自焚。随着日本医史界人士对《本草纲目》的研究不断深入，收藏迷们已不满足于日文《本草纲目》的收藏，掀起一股收藏《本草纲目》原始版本——金陵版的狂澜。明治维新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山路爱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汉学家藤田丰八等，都先后悬巨金收藏《本草纲目》金陵版本。如今被称为稀世珍本的金陵版

本《本草纲目》，全世界仅存的4部，除了1部现存藏于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外，其它3部都在日本收藏。

社会发展虽说已经跨入运用卫星检测、电脑计算的高科技时代，也尽管日本的现代医学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是，今天的日本医药学界，对《本草纲目》的景仰仍有增无减。1973年，日本《医药汇贤》杂志第14期上，一篇题为《日本医药新趋向》的文章介绍，曾风靡一时的激光、电子理疗等日本现代医术出现冷落，源于中国的针灸、草灸十分盛行，大碗药（中草药——笔者注）特别走俏。东京长崎的现代化建筑群中，民间乡医、盲医的《本草》帜幡高悬，为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大都市增添了新奇和神秘。研究《本草纲目》又成了日本医科学院师生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日本建立的李时珍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47个；拥有官办民办的《本草纲目》研究会、李时珍研究会近百个；新出版的研究《本草纲目》和李时珍学术思想、医药学成就的专著已达190多种。自称是李时珍末裔的日本关东大学教授、著名的李时珍研究专家宫下三部，除了参加《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的翻译、编纂外，还单独出版了《李时珍传》、《李时珍研究》、《本草纲目新探》、《本草纲目药名索引》等6部专著。

1986年9月12日，宫下三部教授，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专门到李时珍的故里湖北蕲春县拜谒了李时珍的陵墓，并向李时珍药物馆馈赠了一套《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收藏的唯一的一套《本草纲目》日文全译本。（责任编辑 王 恂）

《炎黄春秋》问卷调查综述

本刊主要就“读者对象”、“阅读情况”、“改进意见”三个方面作了问卷调查。现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前 300 名读者的答卷,汇总如下:

本刊读者主要是中老年干部和知识分子,青年读者占 19%

被调查的读者情况是:

一、年龄:35 岁以下者为 19%;36 岁至 65 岁者为 56%;65 岁以上者为 25%

二、性别:男性 95%;女性 5%

三、文化程度:初中占 14.6%;高中占 35.1%;大专以上占 48.9%;其他占 34.6%

四、职业:党政干部占 27.1%,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医务工作者占 38.3%,其他占 34.6%。

读者认为本刊是严肃的、有保存价值的、受大家欢迎的

读者阅读本刊的情况是:

一、得知本刊的渠道:从报刊上知道的(包括转载本刊文章)占 28.1%;从电视上知道的占

22.3%;从邮局发行广告知道的占 18.2%;由亲朋好友介绍的占 13.1%;从图书馆阅览室看到的占 7%;其他的渠道 11.3%。

二、获得本刊的途径:从邮局订阅的占 74.4%;市场上零散购买的占 11.7%;从杂志社订阅和零购的占 10.6%。

三、阅读情况:自己阅读的占 20.1%;全家阅读的占 53.6%;自家阅读后传给亲朋好友看的占 26.3%。

四、读者开始阅读本刊时间:两年以前的占 27.4%;一年以前的占 26.6%;本年度开始的占 46%。

五、本刊在读者心目中的性质(可作数种选择):认为是史料性的占 93.4%;严肃性的占 60.6%;知识性的占 56.9%;文献性的占 53.6%。

六、读者最喜欢的栏目(可作数种选择):依次是:“春秋笔”(90.1%)、“求实篇”(81%)、“英杰谱”(74.8%)、“殒星篇”(47.4%)、“古镜台”(43.4%)、文萃园(33.2%)、“人海浪”(26.3%)、时代风(23%)。

七、读者认为最好的文章:读

者列出 92 篇之多,前 5 篇是:《我随邓小平访美》、《徐水,梦幻的天堂》、《开国反腐第一案全景写真》、《女诗人关露的苦难人生》、《当代女包公——刘丽英》、《民谣“要吃米找万里”的来龙去脉》。本刊早期发表的《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胡开明并非“胡”开明》、《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也在读者推崇之列。

八、读者对本刊在其所阅读刊物中读刊物中的印象:认为最好的占 42.7%,比较好的占 50%,一般的占 7.3%。

读者希望增加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介绍,对本刊校对质量差、照片印刷不清提出批评

读者提出的改进意见:

一、希望增加“中共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占 70%;希望增加“国民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占 65%;希望增加“历史人物”的占 62.8%;希望增加“历史题材”的占 44.2%。

二、最希望改进的工作项目,校对对被读者列为第一位,有 41%的读者批评本刊校对质量差;17%的读者批评照片印刷不清;9%的读者希望提高排版质量。

邮购《汉语速查词典》

本词典首创“部件、笔序查字法”进行编排,是对词典检索的一次重大革新和突破,它简便易学,查起字来既快捷又准确。书中共收字头 5835 个,带动词条 4 万余条,内容全面、实用,解释准确、详细。本书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32 开,90 万字,576 页,平装定价:17.80 元,精装定价 21 元,将在 95 年 3 月出版。

汇款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机械工业学院分部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

邮政编码:100026

开户银行:北京工商银行百万庄分理处甘家口营业室 帐号:050122—29

户 名: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

炎黄春秋



沈钧儒和他的女婿范长江

天地有正气——一群“推磨鬼”曝光记

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

说真话难 还是应该说真话

国际主义战士

谢唯进的悲壮历程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